

目录

大同丛刊总序	1
--------------	---

大陆

自愿的联合还是强迫的一统:左翼看西藏	许由	3
西藏的僵局和出路	向青	42
回忆扎喜旺徐同志	平措汪杰	52
书介:一代西藏革命领袖的命运—— 平措汪杰传略	顾明诚	80
奥运·西藏	朱进佳	105
《劳动合同法》风波面面谈	零下	112
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算算帐	陈东	139

台湾

资产阶级统治权的轮回	袁重山	151
------------------	-----------	-----

思潮

生态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经济计划	迈克尔·洛威	165
产权制度、人性、与经济发展之互动	李俊奔	188
试比较切瓦格拉与雷锋	黔进派	212
十月革命对于我们的意义	17 位俄罗斯学者	226

大同丛刊总序

当今（最近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是非常急速变化的时代，也是非常保守停滞的时代。科学技术及其产品真正是日新月异，连带地使得微观上的人类日常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也都急速改变。其中最突出的「伟大成就」，自然是在人类自相残杀的技术方面，以及人们对此现象非常高度的「理解」和「宽容」的能力方面。但是，反过来，自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没有一个时代，全世界的「主流」思想（其实只是暂时霸占了支配地位的思想）像今天这么保守，这么冥顽不灵，硬说现存的这种千疮百孔、腐臭无比、而且日益明显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继续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亦即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就是最合理的制度，人类不可能创造出更好的制度了。六百多年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保守思想的势力是这么强大，又这么彻底跪拜在当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面前。

现在世界上并非没有强烈反对现状的思想和实际行动。不过，稍有正确历史观的人一眼就看出，现在最流行的激烈反对思想的内容和反抗行动的方式，都不是最现代化，反而是比较古老的。所以，可以说，当今最流行的激烈的反对现状派其实是保守派，或复古派。现在最流行的反对思想，是各派宗教（包括毛派）的原教旨主义；最流行的斗争方式，是滥杀无辜平民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比十九世纪流行的那种还要古老，而且更恐怖。以前的那种专门针对统治者，而且不要求行动者同死。至于曾在二十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最现代化、最科学化那种革命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反而

被当作过时而抛弃了，或者被毛思想之类的冒牌货取而代之了。我们并非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宗教，不是教条，所以谈不到原教旨主义。马克思的学说当然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修改和补充，事实上也在不断修改和发展。但我们确实相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完全正确，而且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加迫切需要用来指导实际行动的。所以，我们这套旨在探讨中国以及全人类的真实出路的丛刊更具体的方针，就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可以对于人类寻求出路的奋斗有哪些贡献。

虽然早已有人宣布意识形态的时代过去了，但我们完全不信他们那一套。我们看得出：不管你对意识形态这名词怎么了解，其实作如此宣布的人，客观上正是受一种最坏的意识形态支配而且为它作宣传的。

我们明白：为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和发展它，不能只考虑基本上支持它的意见，也要考虑反对的意见。所以这套丛书也可以容纳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不过，因为我们的园地很小，而非马和反马的作品另有广阔的园地欢迎它们，所以我们采纳它们的标准会严格许多。

虽然我们的编辑委员会有明确的立场，但这并不是机关出版物，所有刊出的作品都只代表作者个人的意见，而且我们欢迎外稿。不过，我们很穷，目前没有稿费。如果作者特别要求，我们也可以作为例外而加以个别的考虑。

2008年6月15日

自愿的联合还是强迫的一统 ——左翼看西藏¹

许由

藏汉矛盾，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根源的问题，当中，中共自己也做了很多错事，这是近年来藏人民族主义高涨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中共应该检讨它的西藏政策，而不是只知镇压。继续这种政策只是扬汤止沸，长远而言藏人民族主义只会越打压越高涨。

中共对达赖的定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指责达赖喇嘛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的总代表」。这个指责只有前半对。西藏流亡藏人宪章第三条明白说「未来西藏政治是…政教结合、民主联合的民众国家」。十九条规定，流亡政府的最高权力属于达赖喇嘛，所有法律要经他同意才能生效，他也可以随时解散议会²。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到今天仍然政教不分，而达赖绝对不只是宗教

¹ 本文原题是〈谈谈西藏〉，最初发表时分为上篇及下篇，现在合为一篇，删除了小部份重复的文字和做了微小的修改。

² 〈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与社会(1959-2004)〉，苏嘉宏著，水牛出版社，2005年，台北，附录三。

领袖，而且是政治领袖。欧美政府说只把他看成宗教领袖，不止骗人，而且虚伪。政教分离是现代民主国家的起码条件，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接受天主教的教宗既享有天国的权威又来做世俗国家的统治者。法国政府连穆斯林妇女戴上面纱上课都认为是违政教分离原则呢³。可是欧美对于达赖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政教合一却不加批评，明显是双重标准。那是己所不欲，施之于人。反过来，中共批评达赖喇嘛是政教合一的代表，本身是事实。达赖多少自知理亏，所以多次表示自己如果回藏就只担任宗教领袖，不做政治领袖。但是，如果达赖真的相信民主，真心抛弃政教合一，他应该现在就做，现在就废除流亡政府宪章这一条，不必等那个不知何年何月的回藏之日。达赖虽然很有公关手段，因此很得西方政客的赞赏，但是到现在他还没有根本放弃政教合一，无论如何是错的。

不过，中共说达赖是农奴制的总代表，这就有失公允了。从流亡藏人宪章以及达赖喇嘛的言论来看，虽然他们的政治蓝图还有严重背离民主原则的地方（例如政教合一），但是其它方面可说已经经历了现代化，不再代表农奴制。从前的十三世达赖至为顽固排外，而现在的十四世达赖简直就是世界级政治和宗教明星。客观上，西藏农奴主阶级也已经彻底消灭，昔日的农奴已经变成个体农牧民。达赖要开历史倒车，复辟

³ 我们提醒读者这一点，只是为了揭露西方霸权主义的伪善，并不等于我们支持法国政府这个政策。

农奴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达赖已经作出了历史性的跃进了，虽然这个跃进是中共的「革命输出」所迫成的。中共最有资格看到这点，那就更不应该继续骂达赖为农奴制总代表。它继续骂，反而让人觉得是纯粹谩骂。按中共的惯例，这叫「搞臭敌人」。但它想都不去想，这种做法最后往往适得其反。这样，我们就看到一种历史讽刺剧：一方面，达赖被中共革过命，进步了；另一方面，中共因为太害怕被人革命，所以拼命消灭一切言论自由和党内反对派；而它成功之日，就是它开始历史大倒退之时，因为它整天所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声，整天以为自己真的是「光荣、伟大、正确」。

中共又指责达赖进行藏独分裂活动。达赖照例否认，并且强调他多年来都已经改为中道政策，就是追求一国两制，不再追求藏独。当然不能简单相信他。事实上他或者流亡政府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仍然同所谓中道政策有不一致的地方。流亡政府有可能是在玩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只追求一国两制，暗地里则鼓励或至少默许西藏青年大会的藏独运动。但是，如果中共聪明一点，它可以同达赖展开谈判，表明如果达赖彻底同藏独划清界限，公开约束流亡政府成员不得涉及藏独，显示出他的中道政策的诚意，那么，他同中共之间就有谈判基础。如果达赖本来就没有任何诚意，他就会在谈判中自我暴露。如果他多少有诚意，那就至少值得谈判，然后通过一定的让步来使达赖约束住藏独运动。中共过去对藏人干了那么多坏事，理应作出政治上的补偿，那就是至少恢

复藏人本应享有的自治权。可是，中共不去尝试以合理让步把达赖从藏独运动中争取过去，反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骂「达赖集团」，实际是推动对方阵营的两派抱成一团来反对自己。要知道，达赖已经是流亡政府中最温和的一个，而流亡政府又比较西藏青年大会温和，如果中共不以合理让步去拉住达赖，客观上是鼓励更激进的藏独运动的壮大。中共这种只知强权不讲道理的立场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在重犯江泽民时代对台的错误而已。

中共对西藏有无民族压迫？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中共有无落实西藏人民的自治权。既然是不同的民族，又是少数民族，那么，西藏人享有真正的自治权就是最起码的权利，否则无法实现民族平等，也无法防止汉人强凌弱，众暴寡。中共矢口否认对西藏是民族压迫，理由是西藏已经实行民族自治，藏人自己管理自己。它的主要根据之一是大部份党政干部都是藏人。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这最多只叫公务员的本土化，不能当作是藏人享有自治权的证据。以前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在后过渡期一直有推行官员本土化，但这不等于它让香港华人享有自治权。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共的确逐渐把西藏的汉人干部减少到只占小部份，治藏干部以藏人为主。但是这顶多可以说，中共成功地培植了西藏土生的、且听命于北京的官吏统治集团。如果向藏人示威者开枪的，是藏人警察而非汉人警察，这个事

实不能证明藏人有真正的自治，只说明藏官是北京的傀儡。

如果我们看看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再同香港的基本法比较一下，就不难知道，无论是中国宪法还是法律，根本没有赋予少数民族任何有意义的自治权。宪法第四条禁止民族分裂，但是对于自治权，除了规定「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享有自由外，无一字规定自治区政府享有政治意义上的自治权力。再来看〈自治法〉，第三章讲自治权，但你来看去看去，也同样看不出民族自治区有多少象样的自治权。第十九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但接着又说，自治地方的人大要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换言之，条文的前半部规定自治权，后半部又取消掉。第二十条也基本如此：「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如果什么都要问准北京，那算什么自治？再者，众所周知，大陆所有人大选举都是假的，都是受共产党操纵，西藏也不例外。所以，虽然〈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区域的行政首长要由当地民族担任，但享有实权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党委。而到今天为止，西藏党委还是汉人。综合上述条件，说西藏自治区政府是中共中央的傀儡，实不为过。这就是汉族政权对藏民族的压迫。所以〈自治法〉应该叫〈反自治法〉才对。

〈自治法〉提到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上，自治区享有自治权，但是没有提到教育。这是故意的遗漏，为的是继续强迫藏族中学生使用中文教学⁴。尽管教育试验证明藏族学生用母语念中学，成绩会比用中文好，但是中共毫无迹象要在藏族中学教学中使用母语。⁵这不能不说是民族压迫。⁶

讲自治，应该至少像香港那样。中共说香港实行的是高度自治，自然是夸大其词。理由是：大陆各省的行政首长一经人大选出，即已生效，不用再经中央批准。但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首长却在本地选举产生后，连同所有司级官员，统统都要由中央批准方能生效。这不是高度自治，最多是中度偏低的自治。但是中度偏低的自治也是自治，不能因为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就盲目否认事实。至少香港的行政首长头上没有党委指手划脚。香港人不是另外一个民族，都可以实行这种程度的自治，那么，西藏人更应该至少享有同等的权利。达赖喇嘛要求西藏实行像香港一样的一国两制，实在是有点道理的。即使你认为他是「佛门败类」，也不能因人废言。

⁴ 藏族学生只在小学时候使用母语接受教育。

⁵ 〈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梅尔文·戈尔斯顿 (Melvyn C. Goldstein)，明镜出版社，2005年，162页。他是有名的美国西藏专家，懂藏文，为学比较客观严谨。

⁶ 徐明旭在他的〈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一书中说这是因为藏文无法表达现代科学的概念。这个判断够大胆，问题是徐本人承认他根本不懂藏文，如何有说服力？

又有人举出一大堆中央在经济、教育、文化、计生等等方面如何优待少数民族——包括藏族——的措施，来证明中央没有亏待西藏人。但是所有这些优待都不是政治性质，都同民族自治权沾不上边。中共事实上没有落实民族自治权。没有就是没有，你不能拿别的东西来代替它。奴隶主人即使把奴隶养得白白胖胖，奴隶还是奴隶。你不能说，奴隶既然养得白白胖胖，那么有无自由都无所谓。不，自由是有所谓的！奴隶有了自由，就没有奴隶主的位置了。正因如此，所以中共可以对人民作经济性的让步，但死不允许人民享有政治自由。同样道理，中共可以为工人增加工资，但死不准工人有权组织自主工会，有权罢工。在少数民族看来，纵然中央养得他们白白胖胖，但是一天他们没有自治权，一天他们仍然处于一种众暴寡的恐惧中。中央可以随时单方面给你好处，也随时可以给你地狱。过去 50 年的西藏与中央关系史就是不断在赐福与赐祸之间循环，而且是赐祸的时候多。前车可鉴，所以藏人如果要求独立，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汉族政权应该首先反求诸己。如果藏人只要求享有真正的自治权，就更加理所当然。中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亏在中共。而任何不属于统治阶级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中共始终剥夺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始终剥夺 13 亿公民的政治权利，不置一词，另一方面却只知单方面痛骂达赖喇嘛，其实是为虎作伥，至为可悲。

中共的〈自治法〉制定于 1984 年，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

产物。文革期间，许多无辜藏人受到政治镇压，藏人的文化与宗教几被破坏殆尽。但〈自治法〉并没有真正「拨乱反正」，顶多不过是把民族压迫进行得比较温和而已。今天西藏民族主义高涨，正是藏人对于民族压迫的反弹。

有些民主派同情藏人，反对中共压迫藏人。但是他们不承认那是民族压迫，而是专制主义对公民的压迫。他们说，不论汉人还是藏人，都同是专制主义的受害者。连王力雄那样比较客观和同情藏人的作家，在〈天葬〉一书都这样看⁷。一位西藏人有很好的回答：「汉人的苦难跟藏人无关，但藏人的苦难跟汉人有关」。汉人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汉族和藏族（或任何其它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问题是，藏族在这个家里受够了歧视和欺负，现在更不觉得同你们是一家人。你硬要对方承认跟你是一家人，就是无视少数民族的权利。这些民主派用「汉藏同为专制主义下的臣民」的概念来抹杀中国存在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抹杀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少数民族要自由的感情，是因为他们也戴上了大汉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毫不奇怪，一谈到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他们几乎纯粹从解决专制主义入手，不肯涉及少数民族的权利；不要说不谈民族自决权，连比较充份的自治权也不多涉

⁷ 「中共的迫害是针对人的，而不是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所受的压迫，不应该定性为民族压迫，而应将其看作是专制政权对全体人民共同的政治压迫。」见该书 241-2 页，明镜出版社，1998 年第一版，2006 年第二版。他现在有无改变意见则不得而知。

及，仿佛议会民主实行了，西藏的民族问题就顺带解决了。这是看不到议会民主照样可以对少数民族继续实行多数民族暴政的普遍情况。

又有些所谓左翼，他们同文革前后的中共一样，把民族问题纯粹看成是阶级问题的一部分，客观上只是取消民族问题。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和货真价实的大汉族主义作祟。关于这点，下面再谈。

中共有无压迫藏传佛教

在 1980 年代初，中共曾经对西藏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但是由于发觉这些政策无法消除藏人对于达赖的信仰，再加上 1987-89 年的西藏骚乱，初期比较温和路线很快被抛弃，改为越趋强硬。这导致中共拼命控制 1995 年十世班禅圆寂后转世灵童的认定与坐床，把达赖所选的灵童秘密禁闭并另定人选。这事件也标志着中共从此与达赖闹翻。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更严厉地封杀达赖，禁止僧人和寺院展示达赖照片，强迫僧人签署否定达赖、支持中央的声明。僧人则用各种办法抵制。

共产党自称无神论者，却去插手转世灵童，谈什么政教分离、宗教自由？佛祖的归佛祖，凯撒的归凯撒。你凯撒要管佛祖，那就是越俎代庖了。当然，清朝皇帝和民国政府都一样介入转世灵童的认定与坐床。但是，这不等于以后的中国政府也

非要继承这个传统不可。事实上从前的许许多多传统都已经打翻在地了。就中国政府干预转世灵童的认定与坐床这个传统而论，更已经到了非中断不可的地步。因为它根本同政教分离原则违背。至于禁止僧人礼拜达赖，强迫他们否定达赖，同样有违宗教自由。所以，所谓中共容许藏传佛教的宗教自由，准确点说，只是容许没有十四世达赖的藏传佛教的宗教自由而已。但没有十四世达赖的藏传佛教，就不是藏传佛教，就像没有教宗的罗马天主教，就不是天主教一样。总之，中共这种「宗教自由」政策依然是宗教压迫。但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具有深远历史的宗教，统治者想通过暴力和强迫思想改造来压制它，是注定失败的。总之，中共继续打压达赖，客观上是为他宣传。本来，藏传佛教分为四大派，其它三派同达赖一向是有矛盾的。但是，由于中共倾力打击达赖，反而使他成为西藏人团结御辱的象征，不要说普通藏人，连其它三派的僧人，也变得比过去崇敬达赖。⁸这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总之，任何比较理智的中国人应该承认，中共的西藏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必须改弦易辙！

接受一国两制，但要政教分离

⁸ 「拉萨事件一爆发，马上在整个西藏引起回响，达赖超过其它的根本上师，变成最高的精神领袖，到达兰莎拉来见达赖变成最高的荣誉，甚至萨迦派的僧人，也是先见达赖喇嘛再见萨迦法王。」见〈最后的达赖喇嘛〉，林照真，2000年，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台北，147页。

无论中共还是达赖，双方都实际上坚持政教不分，都在一个本来就错误的原则上对抗。其实，只要双方都放弃政教不分，彼此之间也并非没有谈判的空间。中共是强大的一方，也是压迫的一方，所以它更有责任率先提出和解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一方面尊重达赖的宗教领袖地位，奉行真正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奉行政教分离，不再干涉灵童转世；在政治上则接受西藏实行一国两制，让西藏人民高度自治，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但是规定西藏自治区也实行政教分离。佛祖的归佛祖，凯撒的归凯撒。这本身是正当要求，达赖难以拒绝。只要实行政教分离和藏人民主自治，那么，即使达赖保持其宗教领袖的权威，他的原有的政治权威也会逐渐减弱。因为世俗化的民主选举的逻辑必然造成多元利益和多元政治，而不会让达赖支持者一党独大。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西藏社会的历史性改变，对此应该更有信心。60年前，西藏农奴虽是被压迫者，但精神上完全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所以西藏虽有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分化，但是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上的阶级分化。中共是直接用军事力量输出革命来消灭农奴制，而后遗症也不少。但是，农奴制的消灭，毕竟为日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醒觉奠定部份基础。差不多60年后的今天，西藏已经变成近现代多种阶级并存的、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除了数量最多的个体农、牧民之外，还有富裕农、牧民，工商小资本家，官吏集团，企业工人等等。而彼此之间的利益不仅不同，有时甚至相反。如果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贫富与阶级利益的不同和冲突必然表现为政治上的多元性。大部份个体

农、牧民虽然还有一条腿留在古老小生产方式中，还缺少现代知识，但是比较以前已经多了对切身利益的醒觉。他们可以礼拜达赖，但是大多数人不会赞成恢复农奴制。⁹在文化上，文盲也比较 50 年前也减少了一半。再配合其它条件，如果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和民主选举，必然分化出至少好几个政党，也必然会产生亲中共的西藏政党，而不会让达赖的支持者一党独大。何况，达赖的宗派也不是藏传佛教的唯一宗派¹⁰，藏人也不是人人都那么虔诚¹¹。其次，现有的藏官集团虽然不少人暗地里供奉达赖像，但是，一旦回到政权问题，藏官集团一定不会甘心情愿地、不经斗争就向流亡政府拱手相让权力。说不定在这个自由环境中，一个立足劳动人民的世俗化左翼党也能够慢慢发展，逐渐帮助工农摆脱达赖的精神支配。如果在 1940 年代的西藏，都可以有像平措汪杰那样的共产主义者，成功地把几百个西藏同志组织起来，那么，没有理由说今天完全不可能做到这点。

⁹ 「一个名叫次仁卓玛的女人给我讲完她在旧西藏受的苦，然后回答我问她的是否希望西藏独立：『旧社会的西藏不就是独立的吗？如果西藏再独立，我们不是就要第二次痛苦吗？』」〈天葬〉，338 页。

¹⁰ 「流亡人士的内部团结近几年来并不稳定，那就是因为达赖喇嘛宁愿放弃完全独立的结果，而且也是由于他禁止大家去敬拜那个成为雄登的黄教护法神的结果。威胁达赖喇嘛生命的事情也发生过。」〈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梅尔文·戈尔斯坦，明镜出版社，2005，191 页。

¹¹ 「旧社会有那么多的寺庙，我们藏民对寺庙那么恭敬，难道我们过上了好生活吗？」，〈天葬〉，338 页。

香港也提供一个很好的参考。中共从未统治过香港，大多数香港人从来内心对中共有戒心，但是亲北京的民建联还是能够成为直选中的第二大党。以为西藏一旦实行一国两制和民主选举，西藏就一定完全落在达赖手中，那是对于自己太没有信心。若成真，那是因为中共自己太顽固，把对方阵营的中间派都往激进派那边赶。

以一国两制来解决西藏问题，是很值得考虑的方向，中共应该积极响应达赖。1979年邓小平不是跟达赖的代表说过，除了藏独，什么都可以谈吗？既然达赖已经表示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放弃藏独立场，那中共为什么不愿意跟达赖认真谈判呢？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于达赖的中道政策，一句否定：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然后像过去一样指责达赖希望中共从西藏撤军，以及主张西藏将来享有外交权，都是否定中国的主权，所以达赖所谓中间道路就是藏独。

首先，姑且假定达赖的确坚持藏独。那么中共可以拒绝他，但是，它也应该提出自己的正面而积极的方案，就是至少要去恢复藏人最起码的自治权。但是什么也没有。这能够令人信服吗？

其次，指责达赖的主张是藏独，根本就很牵强。驻军根本不是体现主权的必要条件。中共为了向台湾招手，不是提出一个中共不驻军、让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的一国两制方案吗？

而达赖在 20 年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只是希望把西藏变为非军事化的和平圣地，即将来中央既不驻军，西藏自治区也不会有军队。他还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中国有权保持以防御为目的的、有限量的军事设施的存在」¹²。这怎么看也不能说是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罢？至于说到外交，达赖根本没有主张要拥有外交权。他的说法是：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发展在宗教及文化上面的国际关系。达赖这个自治方案，比较中共对台方案，其自治程度还要低。所以中共长期骂达赖的方案就是「变相独立」，根本是无限上纲，强词夺理。¹³如果中共的指骂成立，那么，中共对台方案也是「变相独立」，也是否定中国的主权了。如果不是，如果连「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立场中共也可以接受，那么，达赖的西藏立场就同样不是否定中国的主权。所以，中共一口拒绝达赖，根本同捍卫主权无关。它的强硬，原因只有一个：台湾还没到手，硬来只会徒然为台独助选；而西藏已经吃进肚子，中共可以为所欲为。

¹² 〈最后的达赖喇嘛〉，林照真，2000 年，时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台北，附录。

¹³ 见 2007 年《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有关段落如下：「1988 年 6 月，达赖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个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这原是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中国玩弄过的阴谋，当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民族自决权与藏独

现在的中共把藏独运动等同背叛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中共这样做，不多不少，也背叛了自己的原有纲领。八十多年前，中共成立不久，就追随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立场：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直至分离权（独立）。1931 年底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共提案的〈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居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的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¹⁴这个立场，到了抗日战争后期，才慢慢淡化，然后抗战胜利后，当中共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时候，才悄悄收起这个立场，改为主张民族自治。同时，国家形式也从以前主张的联邦制改为单一制。从此，谁讲讲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都几乎上纲上线为离经叛道甚至叛国。而在民族自治上，中共更挑选了一种最低度的「行政自治」，连政治自治也不允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不过是恢复一种极度中央集权的官僚大一统国家制度而已。这种制度只有利于它的统治集团。

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不同民族联合为国家，必须以自愿为

¹⁴中国民族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66 页。

前提，而不是出于任何强迫，才能够达到民族平等和民族和谐。而自愿的联合首先要以各民族享有自决权直至分离权为条件。社会主义也应该继承这个原则，因为社会主义原本不过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已。

承认民族自决权与分离权，是否必然导致分离及独立？徐明旭在他的〈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正儿八经地说：「世界上共有三千个民族，却只有 170 多个国家，如果每一个民族都要求自决、独立建国，那么绝大多数国家都将陷入种族战争」¹⁵。真是幼稚无知！这种见解就像当年的天主教或大男人主义者反对离婚自由一样，以为只要承认离婚自由，就会使多数夫妇离婚，家庭制度就会完全崩溃。恰恰相反，承认离婚自由才能够有自由而比较幸福的婚姻。同样，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是鼓励分离，恰恰相反，而是确保各民族真正自由和平等地联合，这样的联合才是持久而又互利的。中共不是自称马列主义者吗？我们就看看列宁怎么说。列宁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越接近充份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越少越弱。」¹⁶他在另一篇文章又说：「指责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正像指责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维持的特权的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

¹⁵ 373 页。

¹⁶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1995 年版，564 页。

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的治国方式，而损害民主的治国方式。」¹⁷

列宁这里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又如何呢？任何稍微涉猎过俄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 1917 年 2 月冒头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拒绝承认和落实民族自决权直至分离权，反而是 10 月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才认真贯彻。十月革命一胜利，革命政府就通过〈俄罗斯人民权利宣言〉，其中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是：

- 一． 俄罗斯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主权；
- 二． 俄罗斯各民族有自决、以至于分离和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
- 三． 取消所有民族和信仰方面的任何特权和限制；
- 四． 各少数民族和种族在俄国境内有自由发展的权利。

苏维埃政府这个宣言不是空言，而是身体力行。那么，是不是所有原本被归并到沙俄的各个少数民族，现在都趁这个机会永远分离呢？不是的。有些的确从此永远分离独立，最明显的例子是芬兰。但是乌克兰则是实行民族自决权而没有根本分离独立的典范。1917 年 11 月 20 日，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很快就正式承认它，并没有因为它独立了而拒绝承认，也没有因为它是在资产阶

¹⁷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1995 年版，396 页。

级政府领导下而拒绝承认。但是，它很快激起自己的工农群众的反抗，因为它实行反共，勾结德国和波兰的入侵军队¹⁸。直到 1920 年夏天，乌克兰革命群众才在苏维埃红军帮助下建立起乌克兰的苏维埃政府。到了 1922 年底，俄罗斯、乌克兰连同白俄罗斯、亚塞拜疆、阿美尼亚及格鲁吉亚共六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这是建基于承认自决权之上的民族平等联合的典范。

另一个近年的例子是加拿大魁北克两次投票（1980 和 1995 年）决定是否分离，但两次独立派都输掉，结果魁北克继续留在加拿大。

大男人主义同民族沙文主义一样，都只懂得强迫的、在暴力威胁下的联合。他们整天预言，如果不这样做就必然导致对方分离。其实，他们越是这样做，恰恰越是在证实自己的预言：当被强迫的一方受够了他们的歧视和压迫之后，就会不顾一切去反抗压迫者。反过来，承认分离自由，即使双方真的暂时分离，也不代表将来不可以复合。又再退一步说，即使从此分离，也能够保持睦邻关系，而非兵戎相见。最经典的例子是 1905 年挪威从瑞典分离，瑞典并没有大动干戈，反而表示尊重挪威全民公决支持独立。挪威独立之后，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关系。

¹⁸ 前后共有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入侵过苏俄，支持内战中的白军去攻打红军

根据一般原则和历史经验，不论是民主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对于西藏都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

- 一． 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自由，让人民自由辩论民族问题和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重新检视单一制和联邦制的优劣；任何人有权提出任何一种意见或方案，不能以言入罪；
- 二． 承认西藏人民及一切少数民族享有自决权直至分离权；越早承认西藏人民的自决权，越能够争取他们继续留在中国。反之则否。
- 三． 支持西藏人民享有自决权直至分离权，不等于支持藏独。相反，我们主张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的各民族继续联合为一个国家，而联合形式可以考虑联邦制。联合派完全可以一方面支持藏人举行全民投票决定去留，另一方面，在实际投票时进行鼓动反对藏独，支持西藏与中国继续联合为一个国家。
- 四． 万一西藏人民多数选择独立，中国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并且继续用政治的方法去争取他们的友谊。关于这点下面再详谈。

当代西藏民族主义

1959 年之前的藏独运动只是农奴主和上层经师的运动，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的基础。如果当时有农奴追随上层僧侣与贵族武装对抗中共，那是出于中世纪式的人身依附和忠诚，还有宗教上对僧侣的顺服（毕竟后者掌管着一切人的「来世」），而不是出于什么政治立场（藏人民族主义）。但是今天的西藏民族主义，恰恰由于中共自己六十年来所奉行的民族压迫，以及由于它为西藏所包办的现代化，而使得西藏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比过去扩大了许多。这是中共想不到的。

中共对藏政策的错误的起点，是出于大汉族主义的偏见，要对藏实行汉人的直接统治，不肯信任为数虽少但比较正直的藏族干部，反而百般排斥，甚至在 1959 年之后把他们悉数抓进牢房。这方面以平措汪杰的故事最有代表性。¹⁹从此只有最听话的藏干能够比较得到中央的信任，而且也仅限于中层以下和没有实权的高层职位。对藏族干部这种汰好存坏的结果，是培植了一个恶质藏官集团，因而为藏人所普遍仇恨。

其次，中共的阶级政策，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最终使它得罪了西藏所有阶级和阶层，只有藏官集团例外。

¹⁹请参考书介〈一代西藏革命领袖的命运——平措汪杰传略〉，顾明诚。

1951 年中央与达赖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生效前后，中共的对藏政策是拉拢其上层统治阶级，承诺不进行土地革命。这个时候，连有人想宣传一下农奴应该翻身的思想，也被禁止和谴责。但对西藏统治者进行统战，根本是两面不讨好，既不能真正拉拢达赖和葛厦政权（后者不可能真心相信共产党会无限期容忍西藏的神权政权），同时又进一步阻碍下层群众的阶级启蒙。然后，到了藏东出现领主僧侣的武装反抗并蔓延到西藏的时候，到了要同达赖摊牌的时候，中共忽然之间被迫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但是这个时候，西藏群众并不像中共期待的那样热心，因为

「西藏群众与现状紧紧地拴在一起，一点也不知道或一点也没有经历过其它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汉人提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对汉人也很害怕，因为汉人一方面促使农奴从封建主那里『解放』出来，但同时又与他们的主人建立了联盟，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

20

为了克服农奴的消极，中共往往不得不借助流氓无赖来斗争领主，而这些人也往往成为藏干。不管怎样，在「民主改革」初期，农、牧民分得土地，又确实得到了益处。不过，翻身农奴的好日子很快又过去了。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日日讲」

²⁰ 〈现代西藏的诞生〉，谭·戈伦夫，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 年，220 页。
转引自〈天葬〉，170 页。

的六十年代，中共的民族政策也变得极左，主张「民族问题其实就是阶级问题」，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为荒唐的地步。就这样，农、牧民的土地很快被疯狂的人民公社化充公。结果是在 1960-1980 的二十年，农、牧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同时中共也近乎消灭藏传佛教，进一步从精神上伤害藏民。

以上谈的是下层阶级。在早已归顺中共的那部份上层阶级，这个时候也都受到迫害。就这样，中共得罪了西藏所有阶级。几十年间，归顺的被斗，不归顺的也被斗；上层的受中共的苦，下层的也受中共的苦；那么，在藏人眼中，藏人的一切苦难都是中共这个汉人政权带来的，难道不是顺理成章吗？又既然毛主席被证明不是神灵而是肉身，而且还会犯大错，那么，在藏人眼中，崇拜中共的假神还不如崇拜自己的真神，难道不是同样顺理成章吗？这种共同经验，自然使许多藏人得出共同结论：赶走汉人，藏独万岁！其实，所谓「共同经验」，须要打个折扣。藏人不是一个均一体，相反，它里面还是划分为贫与富，而两者的经验不仅有所不同，而且往往对立。比方，在土地革命的时候，旧领主失去土地，农奴得到土地，就是一种彼此相反的经验。问题是，西藏的社会变革并没有停止在那个阶段，而是继续发展，一直到翻身农奴又变回中共的臣民，再发展到文革的荒诞剧。所以，藏人觉得，他们都是中共汉人政权的受害者，这个共性要远大于藏人之间的矛盾。何况，民族主义本身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想象成份可以很大。既然中共始终不肯尊重藏人的民族权利，那

么，上层的藏人就很容易把西藏所有问题都解释成汉人的压迫的问题。

但是，1980年「拨乱反正」之后，一切又再回到起点。这时中共又重新拉拢西藏的旧贵族和上层经师。但是第二次统战成效却有限，因为后两者完全知道中共也不过是把他们当花瓶而已。²¹另一方面，中共对昔日的基层干部、积极份子，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重用。结果这批人因为在改革开放之中蒙受地位和生活水平下降之苦而滋生怨言。1989年骚乱之后，人民日报上有篇报导反映这些人的愤怒：「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²²

就这样，中共丧失了它在西藏的最后一点群众基础，只剩下自己培养的那个藏官集团，包括新一代的基层干部，来支撑

²¹ 移居德国多年的关愚谦非常支持中共，但是他在信报的专栏说：「记得一位有文化的很受我尊敬的藏人阿扎多吉多年前在瑞士见到笔者说：『西藏的地方领导干部，表面上给一些藏人贵族安排政府职位，如副省长、副委员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过去的农奴并不满意，他们也不满意。因为他们只起到象征性的作用，一切政策和大事还是掌握在汉人干部手里，语言也是用汉语，你不懂是你自己的事。有时，还对你存有戒心，怕你里通外国，这些都很刺激藏人。说破坏人权，并不是没道理。文化大革命的余音，在中国很多地方、很多领域，还在缭绕，宁左勿右。』」信报，2008年3月28日。

²² 〈天葬〉，503页。

着对西藏的统治。

拔苗助长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1979 年，中共在碰破脑袋之后不得不丢弃所谓「阶级斗争」，又重新抬起了发展生产力为纲的政策。它以为，西藏的现代化能够培养藏民的归顺。可是，它又一次错了。

由于西藏太贫穷，因此现代化的资金几乎都由中央资助。²³同样的原因也注定了，西藏的现代化不是由藏人自己度身订做，而是中共从外以蛮干的方式来包办。

1987 年，邓小平说道：「西藏人口少，两百万藏族不足以完成这么大一个地区的发展任务。派汉族援藏没有害处。如果你仅根据西藏有多少汉族来评价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你不能得到正确结论。关键在于什么对藏族最好和西藏怎样才能得到快速发展，提前迈向中国的四个现代化。」²⁴邓小平不去想想，这样把「现代化」强加于藏人，为此不惜继续增派汉人干部，这究竟是促进民族团结还是相反。他也不去重温一下当年负责民族政策的李维汉的告诫：即使要帮助别人，也要看对方是否愿意啊。（难怪李维汉要被斗垮斗臭）

²³ 平措汪杰就讽刺：西藏不叫要钱也给钱，新疆要钱才给钱，内蒙要钱也不给钱。

²⁴ 西藏日报，1993 年 11 月 22 日，转引自〈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梅尔文·戈尔斯顿，明镜出版社，2005 年，158 页。

而且中共总是高估自己的包办能力。西藏现代化的项目，像全国一样，往往效益极差。「过去 30 年，西藏工农业产值增长 4 倍，而国家补助增长 65 倍。每一元人民币的产出，须要 1. 21 元的投资。也就是说，投资的乘数效益是负数。西藏的全要素生产率，在 1986-1990 期间只有 0. 3%，比全国水平低 1. 4%；到了 1991-1995 期间，更下跌到 0. 1%，比全国水平低 4. 2%。」²⁵这种低效的现代化，实在很难叫藏人尊敬。

不管怎样，60 年来中共对西藏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建设，多少促进了西藏发展。1950 年代的西藏几乎没有现代工业，而今天西藏已经有四大现代产业：电力、纺织兼手工艺、矿产品及旅游。这个新的经济结构也创造了新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特别是 1980 年之后的资本主义化，更使到阶级结构同 1959-1979 年间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藏官集团跟全国一样，慢慢演变成官僚资本集团，藏人及汉、回资本家只要勾结它就能够发大财。²⁶藏官集团就是西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过程的主要得益者。王力雄说：「就

²⁵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Und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June Teufel Dreyer. *Contemporary Tibet -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Edited by Barry Sautman and June Teufel Dreyer, M.E. Sharpe, New York, 2006.

²⁶可参看〈天葬〉第 12 及 13 章。

是这样一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着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一个固有的存在成份。」²⁷

其次，是**小资本家**的大量冒头。1980 至 2000 年，西藏的私人小企业从 489 户增加到 43,000 户，增长差不多 100 倍。²⁸有人看到拉萨满街都是汉、回小资本家，就以为藏人很少经营小企业。这似乎不正确。在全西藏，藏人经商与其它民族的经商的比例是 7: 3，即藏人居多数。只是拉萨才恰好倒过来，是 3: 7。²⁹

1950 年代的西藏几乎谈不上产业工人阶级，要等到中共展开现代化项目的时候才有。到 2005 年农、牧民在比例上下降到占劳动人口的六成。其余四成已经变成现代**工人阶级**或者小商贩，他们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而当中以工人数目较多。³⁰1981 年西藏有 17 万职工，主要是国企或集体企业

²⁷ 〈天葬〉，235 页。

²⁸ Market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 Private Business in Lhasa, by Hu Xiaojiang and Miguel A. Salazar. *Contemporary Tibet -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Edited by Barry Sautman and June Teufel Dreyer, M.E. Sharpe, New York, 2006.

²⁹ 同上。

³⁰ 但是 2005 年制造业只雇用 9% 的劳动力，而第三产业高达三成，反映了

的工人³¹。当中国全面走资之后，西藏的工人阶级也发生结构性改变。一方面，职工几乎没有增长，反而稍微减少：1995年是和2005年都是16万。另一方面，私人小企业的工人，从数目很少发展到2000年63,198人。³²

总之，同全国一样，西藏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出现两极分化。西藏的资产阶级现在主要分为两个部份，一个是官僚资本，一个是私人资本。工人阶级也分为两个部份，一个是国企职工，一个是私人企业的工人。在两个阶级之间的，是大量小资本家和城乡个体户。

西藏各个阶层，似乎没有因为经济生活的改善而归顺中共，反而出于相同或不同理由而继续怀恨在心。首先，普通藏人小商贩很容易感受到藏官集团及其权贵资本的压迫。中国的杂志〈经济师〉有一篇文章指出：「一些执法机构对个体户、小企业滥施罚扣的现象时常发生。」³³这导致商贩很大的反感。在汉人地区，对官府的反感不会往仇视汉人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西藏就容易得多。

西藏的现代化，除了中央拨款的项目之外，主要靠商业及旅游业，而不是制造业。

³¹ 当时中国统计的「职工」，包括5、6万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

³² 同上。

³³ 〈西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尼玛拉姆，潘明清，〈经济师〉2006年第9期。

有人认为，大量藏人变成小资本家，说明他们也从商业化中得益，所以藏人不应该说商业化只有利于汉人和回人，不应该仇恨汉、回人。事实是，即使藏人小资本家得益，仍然有人不满意：为什么西藏政府容许汉、回的流动人口跟本地户口一样自由注册工商登记，而不去保护本地原已非常落后的经济？这在藏人商贩眼中，这是不公平竞争。再从虔诚的藏人看来，自己的圣城不仅被商业占领，而且是让外族人的商业占领，色情事业兴旺，这是亵渎。而且，问题很快也回到一个根本原则：为什么全体藏人对圣城的商业发展没有决定权？难怪即使藏人能从经商中获利，他们对中共还是仇恨，甚至相当多人连汉人也一概仇恨。

资本主义的兴起必然产生大量的劳资纠纷。上述同一篇文章指出：「许多私营企业无视甚至损害工人的最基本的合法权利，导致劳资关系矛盾日益加大，劳资冲突案件也呈日益上升的趋势，这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³⁴这里当然包括同属藏族的劳资纠纷，但是，就像全中国的工人一样，藏族工人事实上没有从一般的劳资经济纠纷发展出任何自主政治意识。但是分离意识就有一些。有报导说，在历次西藏骚乱中，除了僧人，最主要的参加者就是城市普通藏人职工和青年人，他们也往往高喊藏独。这部份工人有多大普遍性，现在不知道。而农村的农、

³⁴ 同上。

牧民的看法未必与城市的工人相同。究竟在藏族劳动人民之中，民族主义情绪有多普遍，这个还须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但是，无疑，中共继续压迫藏民，恰恰在阻碍着藏族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发展，恰恰在促进他们的民族意识。

最叫中共始料不及的，是连自己努力培养的藏族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也染上分离主义情绪。这其实不难解释。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对人权、尊严、本族文化等等比较普通人敏感。他们文化水平越高，越是瞧不起中共那种野蛮落后，当然也对它那种大汉沙文主义深恶痛绝。

如果以为只有一般藏人才仇恨中共，而藏官们就不仇恨，就没有一点西藏民族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西藏宗教和民族感情的复兴，对至少部份藏官也发生影响，越来越多人暗地里信教和把孩子送到印度接受达赖的流亡政府的教育。当然高官和中下级官员的分别会很大。高层藏官集团始终要狐假虎威，继续担任中央的土著打手才能混下去。平措汪杰说他们「吃的是反分裂的饭，升的是反分裂的官，发的是反分裂的财」。但即使是高级藏官，不论表现多么忠诚，他们也知道很难拿到实权。所以他们永远同高级汉官有矛盾。说不定始终有个别高级藏官过着双重生活：白天敬奉中央，晚上礼拜达赖。至于中下层藏官这种双重性格，更是广为人知了。有一

个流行于藏族干部的黑色笑话能够说明这些人的民族感情³⁵：

1950-60 年，我们失去了土地。（中共军队入藏）

1960-70 年，我们失去了政治权力。（传统的西藏政府垮台、流亡）

1970-80 年，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文革毁灭了寺庙）

1980-90 年，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经济。（改革开放让非藏人控制拉萨等城市经济）

中央对此当然是清楚的。它越是清楚，就越难委藏官以实权。反过来，高级藏官集团也心中有数，所以，他们固然害怕达赖回来，但是他们也不见得个个全心全意侍奉中央。难怪中共的决策，在西藏特别难保密，许多时候很快就传到达赖那里。此所以中央对于西藏的政策，越来越难找到有效的着力点。

怎样看藏独

在 1949-1959 年，中国是强烈反帝反资的国家，而西藏的达赖政权则是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并且不惜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而联合美国霸权主义去反对中国。那个时候的藏独运动即使成功，其实也不过是美帝围堵中国的马前卒而已。它不可能真正独立。所以，当时的藏独运动同中共相比，一个反动

³⁵ 〈达赖喇嘛与中国——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梅尔文·戈尔斯顿，明镜出版社，2005 年，160 页。

倒退，一个比较进步。不管中共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多大错误，当两者事实上发生武装冲突时，劳动人民应该暂时赞助前者反对后者。可是，在 1960-1980 年，中共的专制主义日益使到它的倒退性压倒进步性。从 1980 年代中开始，中共更是全面恢复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全面倒退。另一方面，西藏在经历过土地革命和接受中央的援助项目之后，旧的阶级和阶层灭亡了，或者其特权已经大大废除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却产生了。连达赖喇嘛也被中共革过命了，变得反动性减少了。新时代的西藏分离情绪，就是在这些新的社会条件和新的阶层生根的。它已经同 1950 年代的分离主义有很大不同。流亡政府现在即使复辟回朝，也不可能恢复农奴制，而是多份维持着由资本主义占主导、而农牧区以小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万一西藏脱离中国，它不再是一个农奴制加神权统治的西藏，去脱离一个反帝反资的中国；不，那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西藏脱离另一个强大一百倍、又欺压藏人的官僚腐败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已。所以，新时代的藏独运动不再必然是反动的，反而由专制统治者以暴力继续维持一统，才是必然反动的。

统治者当然会说，西藏属于中国，而中国领土是神圣的、不可分割的，所以暴力禁止西藏独立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推论错了。要使西藏留在中国，可以有别的好得多的政策，而维持暴力压迫只会适得其反，把藏人往分离主义的方

向推。中共把自己打扮成国家利益的天然代表，其实它自己往往最自私自利。它的西藏政策根本不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只是为了自己那个官僚资本集团的狭隘利益而已。第二，西藏留在中国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不能说这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只有一个原则才是压倒一切，那就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废除一党专政，实现劳动解放；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西藏问题或任何重大问题才有真正的解决。所以劳动人民不应该支持统治者的西藏政策，只应该暴露它的错误，促使大众起来撤换它。

又有些号称激进的左派（一些自由派也是这样），往往根据「西藏独立了，也只是藏人的上层阶级得益」来证明藏独运动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意义，进而根本否定藏人有权分离。这个推论既不合逻辑，也非常有害。没有历史进步意义不等于历史退步。藏族工农在中共统治下固然是受剥削阶级，万一西藏在现在的有产阶级或僧侣领导下独立，也只能继续受剥削；所以，西藏在这个情况下独立，固然不是历史进步，但同样不算是历史退步。左翼对于既不是历史进步也不是历史退步的东西，是可以容忍的——不承诺在任何环境下都容忍，但是一般情况下可以容忍。容忍是因为分离权本来就是民族权利；其次，从劳动人民的利害关系看，西藏万一分离，中国宁愿接受这个事实，都比较暴力维持一统好些，因为这会比较容易促进藏汉两个民族的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友谊。这些左派整天称许列宁，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向列宁学习。

列宁谈到挪威脱离瑞典的经验的时候，就强调：对，这次脱离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历史进步，但同样也并非明显的历史退步，所以没有理由反对。同时，因为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支持挪威独立，所以两国分离之后，两国的工人阶级的友谊反而有所促进。这对于促进国际主义就是一个明显的积极因素。

还有些左派终日唠叨，达赖代表有产阶级，中共也代表有产阶级，两个都一样坏，所以左翼要两个都反对。这在社会主义最高纲领的映照下，当然是对的。可是，谁若再推论，所以左翼对于目前中共的民族压迫政策应该袖手旁观，那就大错特错。这种思想方法的错误根源，是以为祭出最高纲领就能代替对具体形势的分析，就可以不去区分不同的敌人——主与次，缓与急，轻与重。这其实是最糟糕的左派幼稚病。他们也恰恰完全忘记列宁的忠告：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首先谴责前者，并有限度地赞助后者的反抗。只有左翼在现实的反抗压迫中站对立场（哪怕是临时性的立场），才能恢复社会主义的信誉，才能有资格代表各种不同的被压迫者的共同反抗。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当官方宣传完全蒙蔽群众的时候，左翼更应该首先揭露官方宣传，而不是对达赖和中共各打五十大板。后一种精神，不仅是小宗派精神，而且可能感染了大汉族主义而不自知。事实上，这种立场恰好重复中共的一贯立场：〈自治法〉在序言部份说，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把占统治地位的汉族的民族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

主义等量齐观，这不是体现民族平等，而是体现民族压迫。

社会主义者虽然赞助被压迫藏人反抗压迫，但要强调，这种赞助只像在马路上见到一群黑帮殴打一个人，而立即施予援手（报警或者挥拳相助）一样。这不代表我们认为那个被打的人一定是好人。同样，我们赞助藏人反抗压迫，但这不代表我们在纲领上支持达赖或其盟友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者始终坚持的是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更要保持自己在纲领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民族主义者的通病是把所有「同胞」当作是内部一致的「命运共同体」。藏独主义者也好，大汉民族主义者也好，都是这样。其实，在这个「命运共同体」里面，仍旧划分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彼此的命运其实大不相同！西藏下层阶级一方面受着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也受着同族的资本家和富农的压迫。而同族的资本家和富农，他们在剥削劳动者上面，往往同汉族的资本家和富农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所以，即使今天西藏不同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分离情绪，但是，彼此的社会内涵，一旦发展起来，可以南辕北辙。大家从台湾民进党上台后的全部可耻可鄙的表现，从南非黑人政权成立后、南非国民大会的政权如何贪污腐化和大搞私有化，就可以知道，上层阶级拥护独立首先是为了自己能够垄断权力，以便他们更有效剥削同胞。至于下层阶级，他们的独立梦想往往是同希望摆脱经济剥削联系起来的。万一西藏独立后，

这个「命运共同体」很快就会分裂为两个内部民族：有产统治者和无产的被统治者。所以，我们必须善于区别统治者的分离情绪和被统治者的分离情绪³⁶。前者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其实际发展更可以变成很反动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达赖的阶级本质，要时时根据其实际表现来加以揭露，特别要揭露：他依靠的那些帝国主义「盟友」，恰恰就是西藏劳动人民的死对头。社会主义者只会在西藏上层阶级实际反抗着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压迫、这个狭窄的点上赞助它，一旦超越这个点，一旦它表现出哪怕是小小的反动倾向，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揭露它，谴责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对于藏族劳动人民的分离情绪，应该同情它，赞助它，同时把劳动人民的朴素民族感情引导到劳动解放的远大事业上。民族解放同劳动解放的事业是可以兼容而非必然相斥的。所以，理论上并不是只有一种藏独，即上层阶级的藏独；也可以有劳动人民的藏独，虽然目前看不到兆头。

民族主义者把民族看作百分之百的「命运共同体」，当然是欺骗。另一方面，有些所谓左翼，借口「民族问题只是阶级问题的一部份」，又把民族问题一笔勾销。这是伪马克思主义，也可能是大汉族主义而不自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简单化成为「民族问题只是阶级问题的一部份」那样一句话。

³⁶也要善于区分几个概念：民族感情、民族主义、民族解放、分离运动；它们不是一个东西。混为一谈是危险的。

关于这点，以后再详谈。

西藏问题国际化

现代西藏民族主义的壮大，固然有欧美霸权主义国家在推波助澜。一位藏人说：「谁没有自尊心，现在的西藏人有很多年轻人有文化了，再给西方的民主和独立一挑动，他们当然不愿做二等公民，就起来反抗。」³⁷但藏人分离情绪的主要原因应该在中国国内寻找，在中共的专制主义、大汉沙文主义和中共复辟资本主义之中去寻找³⁸。如果「西方的民主思想」对藏人有吸引力，那不是因为欧美国家的代议民主真的完全符合劳动人民利益，而是因为中共太专制，太野蛮，相比之下，才令到西方的代议制具有名过其实的吸引力。香港的经验可以提供不少参考。中共是怎样丧失掉它在广大香港劳动人民和年轻一代的声誉的呢？后者又为什么倾向西方代议制呢？那主要就是中共太专制太愚蠢：在 1989 年之后的后过渡期，当英国人开始搞局部代议制的时候，中共叫香港工人「宁要饭票，不要选票！」换言之，中共不是和西方比赛谁来真民主，不是承诺一个包含真正民主的基本法，而是用它的专制铁甲来抵御对方的「民主」攻势，对香港实行普选定下一个又一个关卡。此所以它失掉民心。同样，如果欧美国家可以在西

³⁷ 关愚谦，信报，2008 年 3 月 28 日。

³⁸ 就像台独运动的发展，应该首先从中共专制和它复辟资本主义中寻找一样。

藏问题上稍为牵制中共，或者将来它们把「颜色革命」搞成功，那主要是中共自己太专横，太僵硬所致而已。

强国派整天大喊「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了！」，「中国要步苏联、南斯拉夫后尘了！」，只是无限夸大之词。他们无视国际基本形势：帝国主义怎么强大，都无复 60 年前的旧观；同时，中国今天却比以前强大许多。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敢真的把分裂中国列入议程。不要把潜在的可能与现实混为一谈。中国现在比诸苏联与南斯拉夫都更有条件维持一统。首先，中国走资本主义走得比后两个国家都成功得多，可以用她的巨大市场拉住欧美日国家，与后者达成全球性的资本合作关系。在厚利面前，帝国主义根本不会为了西藏而牺牲同中共的经济结盟。其次，中国的民族特点是民族构成上高度均一（因为汉族占压倒多数），完全由外力施加而导致分裂的可能性不高。如果中国真的分裂，那同样主要不是来自帝国主义的力量，而是由于中共的统治太腐败。

总之，万一西藏人民选择分离，劳动人民的立场应该是尊重他们的决定，没有理由因为害怕「西方介入」而去支持中共对藏实行武装镇压。只有在一个情形下才能采取另一种态度：倘若藏独运动联合美国霸权主义武装直接干涉西藏，那么，这个时候的藏独运动就已经改变了性质，变成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份了。在这个情况下，藏人的民族自决权就要从属于中国劳动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需要之下

了。社会主义者要强调，民族自决权毕竟只是他们的最低纲领而已。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是国际主义，是各族劳动人民建立自由而平等的社会主义联邦。不证自明，最低纲领要服从最高纲领。在更多时候，两者并不冲突。但是，万一在某个特定环境，某个民族的权利同社会主义事业冲突，那就难免要选择后者而暂时牺牲前者。不过，必须看到，美国霸权主义武装直接干涉西藏这种可能性，在可见将来都很小。而对于欧美国家目前的「民主」宣传攻势，中国政府如果是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政府，其对策绝对不是用专制来反攻，而是和他们比赛真正民主。

当然中共不是这样的政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中共本身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它自己就是问题所在。谁还像强国派那样幻想依靠中共来解决中国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抱薪救火。恰恰相反，要解决西藏问题，或者中国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须要从发展劳动人民的民主奋斗入手，从废除中共一党专政和建设劳动民主着手。

结语

但是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非常欠缺觉悟，身上也有太多大汉沙文主义而不自知。零星的左翼的任务，就是逆流而上，向群众耐心解释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一个民族去压迫另一个民族，他们自己也不会自由的。

自愿的联合还是强迫的一统——左翼看西藏

2008 年 5 月 20 日 2008 年 5 月 28 日最后修订

西藏的僵局和出路

向青

2008 年 3 月 14 日前后在拉萨和藏人聚居的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由于信息不足（既因为藏地与外间的隔离，更因为中共长期严厉压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目前还很难对整个事件的性质和责任作出精确的判断。但是，从政治斗争的大局而非技术细节的角度看起来，可以初步判断：这大概是达赖集团中的藏独激烈派（例如西藏青年大会分子）有计划发动起来的、但并未获得广大藏族群众支持的行动，其目的既是破坏中共政府的威信，特别是打破中国「和谐社会」的假象以及迎接北京奥运的喜庆气氛，也是促进全世界对藏独运动的关注。虽然归根结底，这是中共政府对藏族的长期压迫和种种不良政策所引起的反抗，但它的实际斗争对象并不限于中共政府和汉藏统治阶级，还把一切汉人和那些与汉人友好相处的普通藏人都包括在内了。它对当地汉、藏、回各族平民造成的直接损害，比对中共及其藏族代理人的损害更大。它甚至没有达到为藏独运动取得世界人民更大的同情的目的。它初期取得的较大的同情，随后被中共官方有系统的反宣传（暴露藏独分子对无辜平民的「打砸抢」甚至烧杀的行为）大大抵销了。因此，这事件既不是一次正确的反

抗民族压迫的行动，也不表示藏人的独立运动正在高涨起来。

政治上觉悟的劳动人民和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当然要反对一切民族压迫，而支持反抗压迫和争取平等的运动。因此我们的基本立场当然也是反对中共对藏族的压迫。但是我们知道：民族压迫的真正罪人，只是压迫民族里面的统治者和剥削阶级，而不是全体人民，尤其不是其中的劳动人民（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全世界的剥削阶级和代表剥削者的统治者。所以我们现在向采取行动反抗民族压迫的藏人呼吁：要认清真正的敌人，不要把全体汉人当作敌人；同时要选择正当的斗争手段，不要滥用暴力。树敌太多和滥用暴力只会使反抗民族压迫的正当事业失败。

中共对西藏的基本立场

中共政府一向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中不可分离的一部份，达赖流亡集团和藏独分子则拒绝承认西藏的主权属于中国。根据历史事实，即使承认自从清朝康熙年间以来西藏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在 1951 年中共进军西藏之前，完全谈不到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直接统治，中国实际上只是享有微弱的宗主权而已。中共比过去任何统治集团更注重对西藏的实际统治。它在 1951 年「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立即派遣数万大军进驻藏区一切军事要地，实现了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前所未有的实际控制。到了 1959 年喇嘛政府叛变之后，中共更实

施了对西藏直接的行政统治。即使在 1965 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之后，所谓自治也不过是虚名而已。

至少自从 1949 年以来，中共是比国民党更强烈也更有实力的民族主义者。它实现了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束缚，又以维护清朝所开拓的大中国的领土（外蒙古除外）完整和重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强国地位为自己神圣的任务。它认为在中国版图以内的五十几个民族，都是不可分离的兄弟民族，构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全中国每一部份的主权，都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这就是中共对西藏（以及对中国境内一切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最高原则。它在任何时期任何方面所采取的对西藏的任何具体的政策，都要服从这条基本原则。这可以叫做大中华民族的统一原则。中共同时又是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在它看来，工农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枪杆子出政权」，而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机关（官僚、警察、军队、法院、监狱等等）应该比资产阶级政权更强大，决不是一成立就开始逐渐消解于社会（普通人民）之中。至于中共自己，则更是必须永远紧紧掌握住政治的最高实权，担任专业的（也就是享有专政特权的）统治者。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对于它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在如此的实际情况，它坚持大中华民族统一的原则，等于是要求中国一切少数民族不但像汉族人民一样绝对不许反对中共一党专政，而且绝对不许脱离中国，也就是不许享有民族自决权。因此，中国少数民族受到中共的专制压迫比汉族人民多了一重，就是民族压迫。

在过去五十多年里，中共并没有从西藏掠夺什么经济利益，反而投入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去进行物质和文化上的建设，促进西藏的现代化。在人才方面，中共也培养出不少藏人干部，包括政府的行政干部。同新疆、蒙古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居住区比较起来，西藏确实享受了特别的优惠。但是由于中共始终坚持着大中华民族统一的原则，而为了防止藏人的离心倾向，它对藏人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的自由常常要加以比汉人更大的限制，连宗教信仰（尤其是崇拜达赖喇嘛），传习藏人自己的历史观，以及使用藏文的自由，都有时明显加以压制。所以，即使中共拿出最大的善意在西藏进行一些进步事业时，还是免不了令藏人感觉到受压迫，不平等，不自由，甚至越来越倾向独立。自从中共努力推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以来，尽管中共对西藏的投资继续大大增长，那些新近急速滋生起来的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腐败现象反而使藏族劳动人民的不满更加深，连从中获利的上层藏人（包括藏族官僚）也因为对于特权的眼界和胃口大增，所以更加希望把所受中共的控制减少甚至摆脱掉，而直接与美国等西方列强挂钩了。

达赖集团的性质

西藏的喇嘛政权一直都是最明显、最彻底的神权统治。达赖喇嘛既是教主，又是掌握无限权力的世俗统治者。据说，他根本不是凡人，而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当今第十四世的达赖喇嘛如此的身份，在西藏「和平解放」时得到中共政府承认。

他所代表的封建农奴制度，起初也维持不变。一直到达赖集团叛变逃亡之后，中共才发动群众起来把西藏的农奴制度推翻。之后又过了许多年，中共才把达赖本人也称为过去农奴制度的代表了（之前中共公开的说法是：达赖被叛乱分子挟持出国）。但是恰在这个过程中，达赖流亡集团（尤其是达赖本人）的政治面貌逐渐改变了。起初他们简单地自称为被中共暴力驱逐出来的代表西藏国家主权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准备随时回去继续执政，并且恢复原先那可爱的制度。但不久他们就明白了：再回西藏执政只是很渺茫的希望；即使有一天能够回去，也不可能恢复旧制度了；现在他们只能首先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来维持生存，等待有利时机到来才能够回到西藏。为了适应保护人的需要和口味，这个流亡政府不得不设立议会并且拟定宪法草案等等，藉以显示民主的新面貌。达赖本人更极力在世人眼前表现为博学多闻、平易近人、慈悲为怀、思想开放的宗教兼政治的国际大明星，与中共首脑那种狭窄专横的形象成为鲜明的对比。他宣布不再争取西藏独立，只要求类似香港澳门那样的高度自治。连藏传佛教的制度和教义，他也表示可以根据时代潮流和科学知识加以变更，甚至说可以改变达赖喇嘛的制度。但是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至今仍然保持着神权统治的原则，它的宪法草案仍旧规定政教合一和达赖享有无限大权。众所周知，即使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神权统治也是最反动、最不合时代的一种制度。况且达赖逃亡集团的政治活动一直都是与美帝的全球战略密切配合的。达赖一切最进步的言行，也

没有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限度，而这种主义决不代表藏族或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任何民族真正的出路。对于自由主义性质的个别具体要求和实际奋斗，如果有进步的意义，我们可以支持，但决不支持整条自由主义路线或它的代表人物。这两方面必须分辨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决不可说「今天达赖处处显得比中共进步、开明」。无论从事实方面还是从原则方面看，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要避免不自觉地助长群众对达赖的幻想。我们决不可以把达赖本人或达赖集团美化，更不可以支持（或者消极地容忍）达赖担任藏人争取民族自由平等运动的领袖。我们只能支持代表藏族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人物（尤其是组织）担任藏族的领袖，而且应该积极努力用各种方法帮助这种领导力量的形成，而不是仅仅努力使藏族的自决权受到充分的尊重就够了。

藏独运动和西藏现代化的前景

西藏真是世界上很特别的地方。它不但是全世界最高（高到区外的一般居民很难在这里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而且对外交通最不方便的地区，它还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神秘又相当稳固（难以发生重大改变）的文明制度，其中包括一种非常强有力地紧紧抓住全体居民的宗教（藏传佛教）。藏人有许多独特的风俗习惯，用一般现代人（区外人）的眼光看来，似乎可以简单地用落后、愚昧甚至懒惰这类的字眼去形容，其实那是藏人非常聪明地发明出来适应当地那

种特殊艰苦的自然环境的妙法。因此，讨论到西藏的政治前途和现代化前景的时候，必须非常充分地考虑到各方面具体的具体条件，对问题进行周到、全面的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比较有价值的结论。如果仅仅简单地把全世界适用的一般原则套上去，那是不会对于实际解决问题有什么帮助的。本身不属于藏族的人，更不可以用高高在上的眼光去看西藏问题，以为今天的藏人只要重复我们以前走过的发展道路就对了。这种态度其实只是自我暴露了极端的傲慢和无知。至于那些认为西藏必须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的人，其实不过是庸俗经济学的传教士而已，倘若不是自觉地为剥削者谋取卑鄙的私利的话。

目前世人所关注的西藏问题，主要是中共政府与达赖流亡集团之间的争执。达赖集团自称代表藏族争取正当的权利：原先争取独立，现在据达赖自己说，已经改为只争取真正的自治。但中共说，其实仍是要独立，并且采取了暴力破坏手段。还说这一切都不能允许，镇压有理。实际的争执比上述更为复杂。达赖集团内部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在流亡政府和普通流亡藏人里都有许多人坚决要求西藏独立，而且主张采取恐怖手段。达赖未必能控制他们。境内的各阶层藏人以及藏族政府干部又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甚至许多人还有表里不一的意见。所以，即使达赖与中共妥协成功，整个问题的未来发展也还是很复杂的。关于前景和出路，我们现在只能很粗略地谈谈。

群众性的民族运动（也就是真正的民族运动）的兴起，需要现代化经济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使该民族里面相应的新兴阶级和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都发展到相当强大。这种条件现在西藏还很不够，而且这方面不会有很快的进展。光是西藏高原的自然条件，已经足够成为发展现代经济的特大障碍。想在那里投资发财，比外地不知困难多少倍。中共政府在西藏的整体投资，一直是长期大大亏损的。自然条件之外，还有不利的社会条件。基本自给自足的个体小经济，至今仍是绝大多数藏人的生活方式。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使本已贫穷的一般藏民还要节衣缩食去供奉寺庙的香灯等等。这不但妨碍资本的积累，而且使市场狭小。造成这样特强的宗教信仰的主要原因，又是自然环境。这一切因素使得西藏现有不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之中，藏族自己所占的比例更少，而且对中共政府的依赖性很深。至于外来的企业家和其它工作人员，连居住在西藏都有生理上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估计，只要中共的统治在中原地区还没有根本动摇，大概不会很快出现强有力的西藏民族运动。因此极少可能迫使中共承认藏族的自决权，也极少可能由藏族自己作出令人信服的居民公意的表现。在这期间，中共与达赖互相妥协并且合作起来，同样很难实现。这就是说，目前这种达赖集团和中共政府互相对抗、各自宣称得到藏族民心拥护的局面还要维持下去。除此之外，西藏自治区政府里面的藏族干部与中共以及达赖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微妙。藏族干部明里当然要站在中共这边，但暗中又与达赖交通。他们不会欢迎达赖回来当权，

但又要「养寇自重」，让藏独分子能够有时出来闹一下。总而言之，西藏问题不但难以根本解决，而且很不容易有明朗化的重大发展。这样，藏人不论以什么方式来行使民族自决权的日子，也不知何年何月才会来到。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讨论藏族自决权的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应否支持自决权，是首要的原则性问题。无论根据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还是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承认民族自决权都是正当的原则。如果反对被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必然在客观上助长民族压迫。有少数自认左派的人以为，只应支持藏族劳动人民行使自决权，不可支持藏族剥削阶级行使。他们没有想到：当事实上藏族自决权由达赖等人行使的时候，一定是藏族劳动人民还未摆脱达赖集团的思想支配，还相信达赖的主张就是符合藏族共同利益的主张。这时你不尊重它，只会令人觉得你不尊重整个藏族，不知道你是想维护藏族劳动人民的利益，只反对达赖等剥削者。结果一定不能使藏族尚未有充分阶级觉悟的劳动人民与你接近，反而使他们觉得达赖比你值得亲近。所以这实在是很不智的做法。只有一面表示完全尊重藏族自己的决策，同时耐心解释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何在，才是帮助藏族劳动人民提高阶级觉悟的有效方法。

藏族向中国闹独立，向来都要倚靠另一外国势力支持。1950年代以来，它所倚靠的主要是美国。起初美国不但希望真正

把西藏分割出去，而且希望使中共政府整个倒台。现在的美中关系根本不一样了。美国现只需要利用西藏给中国制造一点麻烦，既不需要、也更没有力量支持西藏独立了。因此，可以说，藏独其实是个空想，而且是并不美妙的空想。首先应该想到：藏独大概必须经过与中国激烈的斗争，成功之后还要继续与中国对抗；这样大的代价，对于劳动人民值得吗？当然，造成如此结果的主要责任在于中国方面。如果中国肯放弃民族压迫政策就没事了。可是，如果中国放弃民族压迫政策，就是已经彻底民主化了，那时西藏也不必独立了。所以，藏族劳动人民不如选择另一条更实际的奋斗路线，就是：尽力与全中国各族劳动人民密切合作，争取全面的民主自由和建立工农政权，把民族平等问题连带一起解决。

2008年6月14日定稿

回忆扎喜旺徐同志¹

平措汪杰

1935 年，由于外有几十万国民党强大军力的围攻，内因「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不得不做战略性退却，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 年在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后。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

中国革命是在「第三共产国际」的纲领及其影响下进行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有关规定，各国共产党都必须实行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中国革命在民族问题上也基本上遵循这一政策。1931 年 11 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颁布的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宣言中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决权，直到各民族脱离中国建立自己的独立自由国家。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属住在中国境内者他们加入中国苏维埃联邦，或者脱离苏维埃联邦，或者建立自己的区域，均由各民族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见《中国现代史资料》第 286-289 页）

红军长征途中，在 1935 年 8 月 5 日的毛儿盖会议上，中央政

¹ 本文转载自岗坚霸资料库（<http://gangjianba.middle-way.net/>）引用地址：
http://gangjianba.middle-way.net/article/2007/0206/article_60.html

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并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方面的理论，必须执行党的有关民族方面的政策。（见《中国共产党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批第5页）

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藏区时，贺龙部队经德荣、巴塘、白玉、德格地区也先后抵达甘孜。为了避免与国民党各地驻军直接交战，便经常从崎岖的山路、小路绕道而行，到巴塘时，也未进城，从「东龙山」经过。1950年，在刚获解放的重庆，我见到西南局的几位领导时，贺龙将军谈起当年经过巴塘时说：「从地图上看，你们的巴塘像个大县城，不料从东边的山头往下望时，两河之间的巴塘县城和喇嘛寺却像个小米粒那么大。」据说，胡耀邦同志当时是贺龙部队里的「红小鬼」，负责在民间搜集粮食，因群众逃离躲藏，常留下一点现金或借条，写上待革命胜利后还账。

红军抵达康北重镇甘孜，在此期间，根据党的有关决议，在朱总司令的倡导下，建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巴政府」，即「藏人政府」，惊动了国民党当局，这是他们万料不到的事件。根据史料所载，「博巴（藏人）依得瓦（中央政府）」革命党党纲共有十条：

- 一、 打倒汉官、军阀和英、日帝国主义，没收其金厂、矿山、土地、财产，给与博巴依得瓦；
- 二、 番人（藏人）独立，建立博巴依得瓦独立政府，博巴坐自己的江山；
- 三、 建立博巴独立军，保卫博巴独立；
- 四、 土地分给博巴依得瓦，分给谁种的就归谁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出租典当，奖励用大地修水道；
- 五、 废除等级制度，博巴依得瓦人人平等自由，特别要保护妇女和青年；
- 六、 信教自由，还俗自由，喇嘛庙的土地财产不没收；
- 七、 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差役，取消苛捐杂税；
- 八、 发展牧畜，保护牧场牧地，改善牧民生活；
- 九、 减轻粮税，奖励商业，保护工人；
- 十、 联合红军和赞助博巴独立的一切团体和个人。

（这是一份简要而朴实的极其珍贵的史料，见《国民日报》十三卷四十一期）

经与各方面酝酿协商，甘孜寺第五世格桑登增·格达活佛任「博巴政府」主席，另有其它上层著名人士担任政府各部领导。康北的夏格刀登负责外交，康南的邦达多吉被委任负责财政，恭布泽仁（海正涛）以及扎喜旺徐等负责军务。

由于「博巴政府」是红军路过康北甘孜一带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虽经历短暂，但在中国民族关系、在藏族间

题上，对当地群众尤其是之后对藏族知识青年，在思想政治上撒下了极其宝贵的民族革命种子。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问题，便叫历史唯物主义观。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而具体真理又都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及其条件为转移或决定，离开这点，一切便无从谈起，也不能正确地加以评论。「博巴政府」及其纲领就是如此。它既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遵循了共产国际所规定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并结合中国民族问题和当地藏族的具体情况，成立了以格达活佛为首、康南、康北开明的上层人士为主体的「博巴政府」。金沙江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之间的临时边界线。红军只经过金沙江以东的一些东藏地区，而当时的金沙江以西，是拉萨的西藏噶厦政府统治的地区。这里的「博巴政府」虽有广泛的含义，但它首先指的是被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的东部藏区而言。

其次，有必要对当时党章规定的有关民族自决权作些说明。有些不懂、不理解这一原则的人，往往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任意曲解，或者画蛇添足，对历史真相制造了模糊和混乱，包括「博巴政府」在内。

伟大的思想家列宁曾经深刻地阐述过：「谁要是不承认民族自决权，那他不但不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连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并说：「民族自决权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是其最高

纲领，而对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则是不在话下的最低纲领。」故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而建立的「博巴政府」，是当时当地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对它的疑虑、非议和曲解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再说，民族自决权的实质是彻底反对民族压迫而不是无条件地主张民族分离。正像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而主张有婚姻自主权时，并不是要人人离婚。因此，民族自决权是指民族压迫时期有权分离或独立和民族平等时期主张民族联合或团结，是分离权与联合权二者的统一所构成。正像婚姻关系中有离婚权和结婚权二者统一的婚姻自主权一样。可见，把民族自决权简单地等同于分离权，便索性不提或不敢提，乃是当今所谓理论家们的重大政治理论上的误区。换言之，怕民族分离，关键在于必须名副其实地实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民族平等原则（例如，不能违宪、违法地以汉语文代替民族语文等等），正如怕妻子离婚就要彻底克服大男子主义一样。在此谈论历史上短暂的「博巴政府」时，作出如上说明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今天，以民族平等为建国基石的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民族联合、强调民族团结，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说明和证明在民族压迫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民族分离、自由和独立是错误的。遗憾的是，当今一些所谓的民族问题的理论家和领导者在评论这个问题时，离开了问题的不同前提，不顾起码的逻辑，把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主张混为一谈或相提并论。

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也不应该忘记。在谈论红军长征和「博巴政府」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东藏的甘孜、阿坝地区，分别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的，有一批有为的青少年。他们当中，有扎喜旺徐、桑吉悦西（天宝）、萨拉、孟泰、罗德干、郭锐、杨东生、王寿才、胡宗林等，他们是我们雪域藏人中首批参加革命事业的康巴小伙子，我们引以为荣。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所限，他们几乎都没有上过学，跟随红军后，在革命队伍中一边做革命工作，一边补习文化。经过多方补课，逐渐成为有觉悟、有思想、有才干的民族干部。

1939 年，我和根曲扎西（甘南）、昂旺格桑（康南）、喜饶（青海）、马甲顿珠（拉萨）等，在重庆蒙藏学校，首次建立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及其有 20 多位同学参加的外围组织「各地藏民青年旅渝同学会」。我们曾以党小组的名义，给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写了致敬信。之后，在重庆期间，秘密与苏共、中共，后来也与印共取得了联系。继之参加的党组成员还有扎堆（德格人，跟随红四方面军，后留在藏区未能北上）、刀登（康南）、曾曲扎（康南）、恭布泽仁（滇西）等，之后还有一批参加党和盟的青少年，他们基本上都是知识青年，是从书本上学习马列主义后，自觉自愿地建立了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在藏区，从事民族民主的革命活动。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后，根据国内外局势的

转变，我们结束了在藏区近十年独当一面的革命活动。1949年8月，我等经与中共滇西地委协商，决定将「藏共组织」改组为「中共康藏边地工委会」，即「巴塘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从此，数以百计的藏族知识青年的党员和盟员分批参军参政，成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以及西康建政工作的民族干部的骨干力量。

解放初期，我们才听说还有一批比我们更早参加革命的上述跟随红军北上抗日的扎喜、天宝等藏族同志，我们知道后，对他们十分尊敬和爱戴。

他们当中，我第一个见到的是天宝同志。那是1950年3月，巴塘地下党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到苏联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我奉朱总司令电令由尚待解放的巴塘，抵达刚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康定军分区司令樊执中、政委苗逢澍指挥下获得解放十多天的东藏重镇康定时，正逢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先遣部队52师也抵康定，次日拟继续西行，前往甘孜和德格一带驻防。当晚，52师师长吴忠同志等来看望我，后来才知道同来的还有天宝同志。吴忠问了我很多西藏的情况和问题，我未能与天宝等同志多交谈。我到重庆后，见到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领导同志后，担任主管西南五省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经西南局研究决定，天宝和我对调，让我随十八军进藏，天宝留在康

定主持康区（地专级自治区）的建政工作。这样一来，此后，我和天宝、萨拉等同志有机会多次接触。天宝和萨拉虽自小离开家乡已十多年，但他俩交谈时仍用流利、地道的家乡话，一般藏人几乎听不懂。

1951年西藏和谈时，我担任中共昌都分工委副书记（十八军副政委、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王其梅兼任昌都分工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奉西南局指示，负责陪同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中央民委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彭哲作翻译工作，后因口音问题，只担任代表团的生活翻译。彭哲是喜饶嘉措大师的弟子，曾在大师处学过藏文，他向我介绍了扎喜旺徐在青海的一些情况。彭哲说：「青海省委统战部让扎喜做争取在青海的原担任过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的工作。一天，他到大师家后，便高声问：『喜饶嘉措在哪里？』里面的大师闻后便问：『是谁？』我们说是扎喜，这时他推门而进。大师怒气腾腾地指着扎喜说：『确扎喜！扎麻喜！（扎喜是吉祥的意思！你这个扎喜不吉祥！）』这段对话当时流传了一阵。在内地久呆的扎喜同志，虽然开始说了一句按我们藏人规矩稍欠恭敬的话，但大师和他相交后，逐渐成了莫逆之交。」从彭哲的谈话里，我才首次知道扎喜旺徐同志和他的一些情况。

后来，我又得知扎喜旺徐被派到果洛工作。他曾带领果洛的

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解放前，整个安多地区都是在马步芳军阀的残酷统治之下，青海藏区各地藏族上层首领，先后都被马家的军队一一征服，惟独果洛地区，无论马步芳（回族）怎样征讨，始终打不进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果洛是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1949年9月初，马步芳父子（马继援）逃离西宁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青海。不久，以扎喜旺徐为首的工作团到果洛地区，果洛获得和平解放。当时流传着一句有名的笑话，果洛的一位主要上层首领严肃地问扎喜旺徐：「到底是你们共产党的中国大？还是我们果洛大？」扎喜后来担任了果洛的第一任州长，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当地的各项工作，打开了整个地区长期的封闭局面。

1954年，达赖、班禅两位大师到首都北京，具有历史意义地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亲切会见了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陈云及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后来到全国各地参观，达赖喇嘛方面，中央指定由全国人大民委主任刘格平和我陪同；班禅大师方面，由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及西藏的梁先贤等陪同。两位大师一起先后到整个藏区东部两大黄教的中心，即甘南的拉卜楞和青海西宁的塔尔寺，安多藏区各地成千上万的藏族群众纷纷前来朝拜，摸顶祝福，盛况空前。争先恐后前来朝拜的群众拥挤不堪，甚至有多人被压死压伤的现象。

两位大师在青海期间的接待工作由扎喜旺徐等同志负责，任

务重，工作量大。由于两位大师都出生在青海，而西宁塔尔寺又是整个藏族社会最具世俗权威的教派，即格鲁巴（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的故乡。因此，两位大师有机会回到故土做佛事活动，在各方面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情感。在此期间，我便多次与扎喜旺徐同志相见和交谈。彼此之间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在青海的干部中，他是惟一外地来的藏族领导干部，而且参加过红军，到延安学习过，这样的藏族干部凤毛麟角，且他又是个敢说敢做敢于批评和提意见的人，所以在当地干群中知名度高，很有威信。尽管他不识藏文，汉文程度也较低，但因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尤其是资历摆在那里，大家又爱他又怕他。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中央派出以陈毅元帅为首的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包括中央和各地来的中央民族歌舞团、武汉京剧团、重庆杂技团及其它随行人员约800人，成员中有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及各省、市、区的代表人士，其中也有康巴、安多的著名人士，如扎喜、天宝等。我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仅有的党员委员，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由国家民委党组书记汪锋推荐、担任陈毅元帅的特别顾问。代表团从北京出发，到西宁后休整了几天，然后坐汽车，沿青藏公路，经格尔木、黑河，到拉萨。陈毅元帅在途中写的一首诗里有这样两句：「明日拉萨会亲友，汉藏一家叙别情。」扎喜旺徐和我同行，我们早晚相见，一起参加了各项庆祝活动。扎喜虽然和达赖喇嘛及其噶厦官员有所接触，但彼此没

有多交谈过。和班禅大师及其堪布会议厅的官员就有所不同，他们是老熟人、老朋友，扎喜到日喀则或在拉萨，常与班禅大师等畅谈。

藏族自古以来流传着这样一句带有共同文化及共同心理素质的说法，即藏族是由「上阿里三纲、中卫藏（前后藏）四若、下多（安多）康（西康）岗（六岗）」的区域所构成。

深谋远虑的陈毅元帅到西藏，对各方面的基本情况都有所了解后，显然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有所思考。他在一次党内的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时说：应该向中央建议，将拉萨作为首府，以西藏自治区为主，并把分割在邻省的川、康、滇、甘、青的所有东部藏区，建立一个统一的大西藏自治区，这既照顾了藏人的普遍愿望，又对汉、藏的亲密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有极大好处。陈毅元帅边说还边指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这是令人难忘的极其重要的一席谈话。当时在场的除汉族领导同志外，藏族的有扎喜、天宝、杨东生和我。陈毅元帅的这一高瞻远瞩的重大设想，不仅对在场的汉族干部有启发和教益，我们这些藏族干部听后更加兴奋，深受鼓舞。从北京到拉萨，我们经常有机会与陈毅元帅相见。扎喜、天宝和我交谈时，都感到陈毅元帅的性格像我们康巴人，坦率、耿直，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很高，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元帅。

1951年，中央与西藏和谈时，根据周总理和李维汉部长的指示，我临时担任整个和谈过程中的政治翻译。中央和西藏在

许多方面有分歧甚至有过严重的争执。但是，最后终于取得了共识，签订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当时，毛主席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今天，在新中国，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这句话不只是当年，而且对今后我国的民族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陈毅元帅的上述有关大藏族自治区的讲话精神，中央有关部门成立了以天宝同志为首的西藏及青、甘、川、滇五省、区协调工作团，并由四川省委统战部的张成武同志担任秘书长。但后来，由于国家整个政治气候的「左倾」，并且愈来愈严重，这件五省协调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1957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经中央同意，由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领导主持，在青岛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还未去青岛之前，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动员会议，出席的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参会的所有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由国家民委书记、副主任汪锋作了报告，号召大家在会议上要畅所欲言，对民族工作、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大胆提出各种批评或建议，一再宣称并庄严保证，对提意见的人决不抓辫子、打棍子、入档案，总之，保证「秋后不算帐」。

在青岛会议上，根据民委领导的号召，许多代表和委员便纷纷在各自的小组会上发言，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建议，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在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存在的「少数民族

当家、汉人作主」的局面。其次，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不信任，即使任用也不重用。在这方面举了很多很多实例。比较大的问题是新疆的同志提出，要求中央实行苏式的体制，即建立自治共和国。在大会上，许多代表和委员发了言，但藏族的天宝、杨东生和我都没有发言，阿沛和格桑旺堆等代表人物也没有讲话，惟独扎喜旺徐用他一贯响亮的、带着口音的汉话作了简短发言，引起众人的注意，他谈了一些工作中值得注意和需要改进的问题。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总结式的报告，对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作了激动人心的重要讲话，也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必要的解释，对于新疆同志的意见，未作任何批评，只是从正面谈了我国不宜实行苏式体制的理由。周总理说：中国的民族结构和苏联有所不同，是「大分散，小聚居」等情况。大会期间，毛主席也到青岛与大家亲切相见、合影留念。

大会结束后，代表们便返回各自省、区。阿沛秘书长和他的女儿龙锐，我和我的妻子、儿子平康、女儿平妮共 6 人从北京到西宁，当时，西藏自治区筹备会的主任是达赖喇嘛，副主任是班禅大师和张国华，主任会议每三个月才举行一次办公会，平时，日常的领导工作由秘书长会议负责并决定事项。噶厦方面由阿沛作为代表任秘书长，班禅堪厅方面由扎萨拉米·益西次村作为代表任筹委会副秘书长，我是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作为昌都地区代表，担任自治区筹委会副秘书长兼筹委会办公厅及各处室统一的党组书记。因此，

阿沛和我便急着赶回拉萨，以便主持筹委会的日常领导工作。

青海省委领导非常关心我们，为了安全稳妥，由西北军区特派一位老练的空军团长驾驶一驾军用专机，拟将我们送到拉萨当雄机场，因天气恶劣，飞机起飞多次，又不得不返回西宁等候。从西宁坐汽车回拉萨的人，也陆续先期抵达拉萨，但我们还在西宁等候了约 20 多天。在此期间，我们的参观、娱乐等活动，都由扎喜旺徐同志负责并陪同。在一次省委的小型宴会上，扎喜旺徐望着省委书记，轻轻用藏话对我说：

「我们的这位头头很厉害！」后来才知悉，他是一个有名的「极左派」书记，他的名言是「把『叛乱』消灭在预谋中」。这便是在改革前，先让人家来开会，而将参会的代表当作人质扣留后，强令他们和其下属上交历来民间所有自备的枪枝。一向酷爱骏马和刀枪的藏人，怎会轻易上交呢？因此，在尚未着手改革前，便先后纷纷打了起来。

在西宁等候了 20 多天后，终于勉强飞抵拉萨当雄机场，那天差点出了事，机身不见阳光的一侧翅膀上积雪过重，失去平衡，几次猛上猛下，大风把舱门吹得呼呼直响，机上随带的瓜果、行李等滚来滚去。飞抵机场时，驾驶员全身已经汗透，说：「多年驾机，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险情。」

政治气候的突变是惊人的。前面提过，那位国家民委的负责人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前，在动员大会上赌咒发誓，对提意见的人，决不秋后算账。但刚过几个月，局势一变，他又来

了个 180 度的急转弯，在全国政协礼堂慷慨激昂地作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之后，全国便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在占全国总人口 90% 多的主体民族的汉族没有一个大汉族主义的情况下，而从仅占全国总人口不到 10% 的 55 个少数民族中，却揪出了数以十万计的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而这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中，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的知识分子，甚至有许多老干部，也有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当时，人们这样议论：「以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所反映的各种各样的实际情况为据，要整民族主义的话，首先应该整大汉族主义。却偏偏相反，整了少数民族，这是民族问题上严重的一个是非颠倒。再说，如果要整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情绪的话，应该是少数民族被改造的上层人士，可是千千万万个挨整的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中，却几乎没有一个上层人士，这又是阶级问题上最明显的又一个是非颠倒。」这次运动的实质，便是在民族问题上的是非颠倒，还加上阶级问题上的是非颠倒。在藏人中，参加过红军北上抗日的屈指可数，而我们的扎喜旺徐同志在这场运动中也被挨整，「三撤三留」，即撤除中共八大代表、青海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保留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委委员、副省长。

1958 年，我参加完全国人代会后，回到成都，去看望了在西藏军区八一幼儿园的两个孩子后，正准备飞回拉萨，突然接到中央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同志的电话，有

事要我速回北京。回京后，张对我说：「你的工作可能有变动，等中央书记处定后再通知你…」我和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西藏领导，从五零年起相识并共事多年，相互关系融洽，暇时一起散步、下棋、打牌等，可谓亲密无间。由于我是惟一的西藏工委藏族委员，他们对我便格外关照。但这次回京后，我感到其态度有点不自然。这时，全国正在掀起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高潮，少数民族干部挨批挨整的消息到处流传、比比皆是。而事后我才知悉，西藏工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范明（我是副部长）和国家民委党组书记兼副主任汪锋正在紧密磋商，他俩私下决定着我的政治命运。十多天后，张经武让我到他家去开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场的有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国家民委党组书记汪锋借故未参加，让副主任兼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春出席。张经武说：「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你调离西藏，由国家民委安排工作。一边工作，一边自我检查思想。」我当即问：「我检查什么？我应该检查什么？」他们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什么话。在我的催问下，张经武说：「噢！去年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你主张把德格县划给昌都地区，趁此次运动你应该好好检查这个问题吗！」于是，我当即解释：「这是个大误会，这个问题是小组里德格的格桑旺堆副主任提的。在小组会上，我还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和说明，全组便同意我的观点，未予通过。而阿沛提出，甘孜地区改革时，希望中央多关照藏区噶举（白教）的中心寺庙，即德格巴邦寺，此事全组同意了。但当时的记录员，统战部的任仁在整理上报材料时，把

上述小组未通过或通过的两件事弄混了。周总理到青岛的第二天，召见阿沛和我汇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时，首先问的就是德格这个问题，我将实际情况向总理作了简要汇报后，总理便说：『呵！这是记录上的误差，就不提了。』然后谈了一些其它问题，并让阿沛和我下午陪总理上军舰检阅海军舰队。因此，关于德格划昌都的问题，问阿沛、杨东生和格桑旺堆，就可以了解事实真相。」

听了我的解释后，张经武只是说：「噢！噢！」，接着，在我一再问还有什么问题后，张国华说：「1950年进军西藏时，你托运的书箱中听说有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一书。你也趁这次机会检查一下思想嘛！」我回答说：「看革命领袖的书也要检查吗？」再问刘春时，他也说不出什么。这样，决定我的政治命运的，能搬出来的就是德格问题和这本书的问题了。既然事情有关领导已如此定了，中央也同意了，我就未再多言，也感到言而无用了。显然，在全国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浩大声势下，西藏的这两位正、副书记，在国家民委党组书记的授意和策动下，报批中央后，干脆把我调出了西藏。从此，我便告别了整个青春年华为之奔波、奋斗近二十年的雪域康藏高原。

第二天，我去看望相当熟识并常有往来的汪锋副主任，因为中央同意我的工作由民委安排。虽然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由乌兰夫兼任，但他平时在内蒙古自治区，是那里的书记和主

席，国家民委的工作事实上都由汪锋负责和主持。汪锋一见面就强调此次反地方民族主义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等等。他以惋惜的口气说：「虽然许多同志都出了问题了，但该保的还是要保嘛！这是党的利益所要求的。你们藏族的高级干部，主要的是西康的天宝、青海的扎喜旺徐和在西藏的你三个人。要天宝一边工作，一边自我检查。你也一样，安排在原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为所长的民族语言研究所任副所长并作自我检查。扎喜旺徐的问题最严重，由我多次给青海省委电话交涉，最后才商定，便『三撤三留』。中央对你们三个人实际上是爱护你们的，是保护过关的…」言外之意，我们应该因此感到幸运和知足。

是年夏，扎喜旺徐因事到北京出差，记得住在同仁医院背后的新侨饭店，见面后，他以沉痛的心情，跟我谈了他被多次批判的经过，并提及自己被「三撤三留」的结局。然后，十分关切地询问我怎样？我便对同病相怜的知心好友扎喜同志说：「我的遭遇是五三年开始的。解放初期，进军西藏的主力部队是以张国华为首的十八军的西南方面的人，其所属的分支，是以范明为首的独立支队的西北方面的人。我是中共西藏工委 7 名委员中惟一的藏族委员，在范明眼里，是西南方面的人。范明便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因我曾以藏共身份与苏共、中共、印共等有过关系，故以『党籍不明，需要审查』为借口作文章，53 年，当我负责带队以功德林为首的佛教代表团到北京时，范明便乘机将我留在北京，在中央民委工作。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上，达赖、班禅两位大师宴请中央领导的宴会上，毛主席自己当面问了两位大师、得到赞同后，便通知民委党组汪锋，让我仍回西藏工作。毛主席的话谁也不敢违背，我被调离西藏一年后又回西藏。但整我的人『一不做，二不休』，又趁这次全国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再次调虎离山。』虽然西藏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噶厦地区，我谈不上是这里的『虎』，但个别别有用心、违背党纪国法的人，借机消除其心腹之患。便采用不打草惊蛇的办法，巧妙地算计了我。将中央『保护过关』的处理办法通知了达赖喇嘛和阿沛及其它藏族干部。我没有受过任何批判，表面看来温和、平静，但实际上我在西藏党内外的职务都被一一去掉了，连全国人大代表也没留下。现在仅仅是一名要自我检查的普通共产党员和民研所副所长，由政界到了学术机构。」扎喜旺徐听后，非常惋惜地说：「糟糕！糟糕！你是我们藏族高级干部中有名的知识分子，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是我进秦城被单身囚禁18年的冤狱之前与扎喜旺徐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有时超过党外甚至敌对势力的斗争。那些整我的个别领导同志，把我打入「冷宫」后还是不放心，以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情，最后以「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即怀疑搞藏族独立），需要隔离审查」为借口，向中央报告后，居然把我送进了世间罕有的漫长的秦城单身牢房里。

在此，有必要谈谈关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在民族主

义问题上，究竟是要反大汉族主义还是要反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区别这两点，乃是民族问题上的大是大非问题。

首先，革命导师列宁在其《论民族自决权》等著作中说过：「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民族主义必须区分为大民族的民族主义与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进攻性的，奴役性的，因而它是非正义性的。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防御性的、自卫性的，因而它是具有正义性的。因此，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必须站在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方面，而不是相反地站在大民族的民族主义方面。区分这点，乃是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的立场上正确与否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指出：「今天，大汉族主义思想与地方民族主义思想都是旧社会留下的残余思想，两者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两种思想都必须加以克服，否则，会损害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但关键在于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

刘少奇同志在 1954 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由于过去反动统治阶级的影响，在汉族人民中，以致在汉族干部中，还存在一种大汉族主义思想。例如，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承认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承认少数民族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而不尊重少数民族

干部，不同他们商量办事，不相信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己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等等。毫无疑问，这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必然会起破坏民族团结的作用，也完全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所不允许的。汉族人民和汉族工作干部必须随时注意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当然，在各少数民族中也存在着一种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思想，也要注意克服，否则，对自己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周恩来总理等也曾一再指出：汉族统治者在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做了许多对不起的事，欠了债，把他们赶到高山上和边远的地区，今天，我们应该以还债的态度来对待少数民族…

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时，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只要我们真正按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由于大民族主义而来的，就是大民族主义的直接反应。今天，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在地取消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一取消，很自然地便换得了他们取消狭隘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列宁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话，尤其是列宁这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乃是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区别以及对民族主义本身的两种区别，是马克思主义民

族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因而，也是在民族问题上，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真假共产党人立场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评价任何重大言行的是非问题，更不要说政治运动，必须有根有据。由此可见，五十年代中期，狂热的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从理论到事实，究竟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根据上述革命导师和领袖的谆谆教言，就不言自明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下的各种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包括反右、反地方民族主义，除个别事件外，几乎都一一平反昭雪了。

光阴似箭，1980年5月，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冯文彬等同志的关怀下，我的冤案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不但我个人重获光明，而且以我为主要负责人的各组织及其数百藏族党员、盟员的冤案也得到平反昭雪。在此之前，有些老同志都直接、间接地为我的问题说过话。据说，扎喜旺徐和牙含章同志为我的冤案，也曾经给有关部门写过信。当时，扎喜是国家民委政法司司长，将要回青海工作。我在秦城冤狱期间，听说他也在「文革」期间挨整，被下放劳动，放羊多年。在北京期间，扎喜夫妇对我的子女给予关照，两家孩子来往密切，十分友好。

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

我，第一句话便是：「活着能见面就是伟大的胜利！…」记得1950年在重庆，宋任穷、胡耀邦、陈庚等同志和我都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在一次开会时相识。当时，耀邦同志是川西北行署主任，后调北京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是第一届团中央仅有的藏族委员，便与耀邦同志多次相见和交谈。

二十多年后，这次在中央书记处耀邦同志接见我时，他和万里副总理不久前从西藏视察回来。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制定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西藏31号文件」，继之，又颁布了「新疆46号文件」。尽管因党内的一些阻力和障碍，这两个光辉文件未能得到落实，但它在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上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少数民族干群中，尤其是在有思想的民族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得到了极其广泛的称赞。这两个文件体现了汉族老大哥对各兄弟民族真正以平等相待，在国家统一的民族大家庭里，让他们逐步实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真实体现

耀邦同志和我先后多次交谈了许多有关西藏和民族工作中的问题，我也提了不少意见，从方针政策到实际工作中需要纠正的各种严重失误以及需要改进的意见。记得耀邦同志谈到民族干部的问题时，以他一贯的直率语言说：「作为民族干部，必须为本民族的正当权利而说话，不应在汉族干部面前百依百顺，否则便失去了身为民族干部的意义和作用。」刚从西藏

回来的耀邦同志，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西藏的藏族领导干部在汉族领导面前惟命是从的情况。于是，我说：「藏族干部中也有耿直的人，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对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因而被批判和挨整，但群众的眼睛是明亮的、心中是公正的，对这些为民族利益而受迫害的干部和人士是非常尊敬的，今天青海的扎喜旺徐同志就是如此。听说许多牧民家里，除了悬挂毛主席像外，还挂上中央领导华主席、青海领导扎主席的像，有时群众见到扎喜时，往往像见活佛一样顶礼膜拜。」耀邦同志听后非常高兴地称赞说：「这样的民族干部才是名副其实的好干部！」的确，知情者都知道，扎喜旺徐同志不论在果洛，还是在青海的其它各地，都受到藏族和其它民族干群的尊敬和爱戴。

扎喜旺徐同志也是十世班禅大师的亲密朋友。八十年代，班禅大师虽然住在北京，扎喜在青海工作，但他只要到北京，就常到大师家拜望，促膝相谈。后来，他从青海调到北京，担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委员。当时全国人大有两个藏族副委员长，即班禅大师和阿沛，两个藏族委员，即扎喜和我，我是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从此，我们有很多接触的机会。人大民委有两个老同志，一位是满族的关山复，一位是藏族的扎喜，两人的性格都非常耿直。在讨论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时，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

扎喜旺徐同志在有关会议上经常强调的是：「让少数民族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在家里让他们真正当家作主，有了自己的家，无论家的大小、人数多寡，都会大不一样。就像一个人一样，有了自己的家，他就安心了。」扎喜旺徐和我们大家所说的「让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要有一个家，而且在自己家里让他们当家作主」的问题，言简意赅、词浅意深。作为老大哥的许多汉族同志对这句话往往是不易理解的，甚至是反感的。但作为相对弱小的少数民族来说，对那些还没有家，或有了家但不能作多少主的人来说，对这句话的体会就和汉族同志大大不一样，因为汉族同志对此往往不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工作时，有关民族工作讲过许多重要的话，但后来在中央主持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后，在民族方面讲的话不多了。但「不多言，言必中」。在千头万绪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中，他说了一句中肯的、关键性的话，这便是：「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此话非常非常重要。凡是稍有点头脑，尤其是有理论思维的人，便能领会这句话的实质含义，即「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尚未或有待实行而言，如果已经实行了，就不必这样说了。那么，为何说这是一句关键性的话呢？为什么说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呢？只要客观、冷静地思考，本着先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言和马列主义民族平等观的大护小、强扶弱、多顾少的精神，根据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和今天党中央所倡导的要大家求真务

实的精神，这便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基本的局面是「少数民族当家、汉人作主」的老问题尚未得到真正解决，某些方面甚至更严重，而这个问题便是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之所在，原因之所在。只要认真按照小平同志这句非常正确的话去做，汉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就大不一样了，才能得到妥善解决，也才真正有利于今天中央所强调的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大家庭。毛主席常说：「看问题要学会看实质，而不是看现象。」今天，民族方面尚待解决的问题的实质便在这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谁要是真正对国家、民族的利益负责，上述的话便是逆耳的真理。

众所周知，扎喜旺徐同志在青海的工作卓有成效。其中最突出的，上面提过，是他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信后，中央为纠正青海平叛问题作出了决定，为此，他的贡献是最大的。他有时含泪忆起往事，对亲朋好友谈起五十年代末期，在所谓「把叛乱消灭在预谋中」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下，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各种改造，尤其是对所谓的叛乱由本来的「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围剿为辅」的路线，后来，在拉卜楞视察的中央民委领导，提出了更左的「以军事围剿为主、政治争取为辅」的极其错误的方针，造成的严重的冤假错案十分惊人。最令青海藏人痛心的是，个别『极左』的汉族领导，居然别有用心地从内蒙调来了蒙族骑兵，进行

所谓平叛，造成蒙、藏之间以及藏、汉之间的仇恨。班禅大师在其著名的世人知晓的「七万言」中所说的各种乱斗、乱抓、乱关、乱杀的现象，处处司空见惯、耳闻目睹。扎喜旺徐经常深深地惋惜和叹息说：「从玉树、从果洛押送的那么多的军车上，无数男女老幼藏族群众被捆绑起来，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到西宁，在监狱门口卸车时，很多囚徒已经昏迷不堪，站立不起来，个别已经死在路途中了。」这些历历在目的往事使老红军扎喜旺徐无法坐视、无法容忍，导致他由京回青海后，再三要求省委平反。多次在会上痛哭流涕地为冤民诉苦诉难。后来，他便给小平同志写了信，终于得到了平反。但当时，很多人已死在狱中。政府给放出来的藏人发了一些砖茶和哈达后，信佛的他们便心满意足，还高呼「嘎真切！嘎真切！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而汉族的「右派」摘了帽以后，他们本人，尤其是家属，常常在省委、省府机关和院里大吵大闹，要求补发多少多少万元，弄得省领导十分难堪和被动。

扎喜旺徐同志离休后，我和其它一些同志常到他家去看望，相互谈心时，对过去的峥嵘岁月不禁感慨万端，忆起当年在「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不只是用「棍子」，而且用「枪杆子」想把人们赶进「天堂」的那个难忘的时代，特别是天下大乱、无法无天的十年浩劫，我们干了多少伤天害理、倒行逆施的蠢事啊！

对青海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尤其是对平叛问题的纠正，扎喜旺徐同志立了大功，应大书特书，十世班禅大师也常提起他的这一不朽的功劳。

年轻的扎喜旺徐同志，光荣地参加过短暂的「博巴政府」的建立，并勇敢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虽是中国革命史上战略性的撤退，但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对这一伟大的长征，藏族人民也有所贡献，毛主席、刘伯承参谋长等说过：藏人的牦牛和糌巴支援和挽救过红军，为中国革命也立过大功。

抗战期间，扎喜旺徐在内蒙古工作也是有贡献的。而在建国后，在果洛和青海的各项建设中做出了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重大贡献。

扎喜旺徐同志 1913 年 7 月 1 日出生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2003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去世。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整个雪域藏族的好儿子！是一个硬骨头的康巴汉子！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2005 年 8 月

一代西藏革命领袖的命运 ——平措汪杰传略¹

顾明诚

平措汪杰（Phüntso Wangye，简称平汪），一个中国人不太熟悉的名字，在中国现代史上却有着独特的位置。如果我们把西藏从民国时期的封闭自治到纳入共产党政权之下的转变，视为西藏从政教合一的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转型，那么称平汪在这个转型中功不可没，是毫不过分的。这位在四川康区土生土长的藏人，却在国民党军阀的暴政之下立志争取藏人的自治，竟又在国民党学校的「培养」之下成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平汪历时十载创建并壮大了西藏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而西藏被纳入共产主义政权却最终由中共「毕其功于一役」；平汪在中共建立对西藏主权的过程中屡建奇功，却时刻不忘为藏族人民争取民族的自由；平汪期待中共政权为西藏百姓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社会，却无力避免藏民为反对仓促改革而掀起暴动的悲剧…一直以来，我们对西藏的认知来源，总难以逃脱非中共即达赖的两极困局，然而平汪的经历却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一个处于这两极之间的中间人

¹ Goldstein, Sherap, and Siebenschuh,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所见证的西藏命运。

志当存高远（1922-1939）

平汪出生的时间和地点，都带有很不寻常的历史含义。经过了 1888 年和 1904 年英军两次对西藏动武，垂危的满清政府开始对西藏进行有史以来最强势的主权实施。其中，铁血将军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1906 年）兼驻藏大臣（1908 年），在藏族的康区（即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及云南西北角）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试图把康区纳入中国的州县政制之中。至民国初年，由于先后有四川督军尹昌衡、川军统领彭日升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事存在，虽然西藏因十三世达赖喇嘛得到英方援助享有了较高度度的自治，而处于汉藏缓冲地带的康区则很大程度上仍在民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于是，1922 年 1 月在康区巴塘县出生的平汪，从小就生活在民国汉军对康巴人强权统治的环境中。

少年时代的平汪，亲眼目睹了 1932 年由格桑次仁率领，以及 1935 年由洛桑顿珠（平汪的舅舅）率领的藏人起义，这让年少的他第一次体会到独立、自治、与反抗的概念。平汪于是立志，学成之后献身于藏族人民争取自由和摆脱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此后不久，他便跟随舅舅到了南京，在国民党中央专设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蒙藏学校上学。这一去，也拉开了平汪长达 13 年独立却无甚成果的革命斗争的帷幕。

平汪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人才，至少就其从入学到因发动藏族学生运动被逐出校之间的四年来说是如此。然而，血气方刚的他却在一位老师的引导之下迷上了马列的共产主义理论。康巴人骁勇好斗的血统，加上康区长期处于汉军铁蹄之下的历史，使平汪初读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和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便深受感染。平汪强烈地认同列宁的主张：各民族的身份和自由应该得到尊重，强势的民族不应欺压弱势的民族，等等。他在蒙藏学校所领导的争取藏族学生平等地位的示威运动，就是他对自己信仰的民族平等思想的第一次实践。

当然，争取民族的自由和平等地位，并不是平汪革命思想的唯一动力。当时无论是民国还是藏区，在国难当头之余，社会的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亦是随处可见。面对这样的内忧，马列思想里所展现的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与人之间彻底平等的蓝图，对平汪这种一身正气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当时的平汪认为，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与为他所属的藏族人民争取与汉人平等相处，在逻辑上是同一回事。当然，多年之后的历史将会告诉他，这只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命题。

十载革命途（1939-1949）

1939年，平汪和他的同志正式成立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1940年被开除出校之后，平汪更是「全职」投入

了革命运动。平汪先是和他的「战友」昂旺格桑一起走访了位于重庆的苏联大使馆，并得到了时任第一书记的汉学家费德林多次接见。他们请求赴莫斯科学习，并计划将来回到康区开展武装斗争，希望能够得到苏共的支持。赴莫斯科的愿望本有机会实现，最后却因 1941 年初德国入侵苏联而未能成行。平汪转而向中共寻求帮助，并在同样位于重庆的八路军驻地见到了叶剑英。平汪提出希望去中共的根据地延安学习，虽然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却也因战乱的关系被迫半途折返。无奈之下平汪等人回到康区的康定和德格，希望在那里站稳脚跟之后自行开展革命。不料，当地的国民党政权不久之后便以进行共产主义活动为由准备抓拿他们。最终，平汪在 1943 年不得不越过汉藏边界金沙江，逃到了当时在拉萨治下的藏区。

平汪一行于是计划通过说服拉萨政府来获得对他们在康区革命的支持。平汪和昂旺格桑先后拜访了昌都总督宇妥·扎西顿珠和拉萨噶厦政府的噶伦大臣索康，并面陈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改革拉萨政府、在康区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心。虽然他们的主张得到了这些少壮派的认同，但是由于拉萨政府的保守力量过于强大，平汪等人的努力最终也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康区不能回，留在拉萨又没有结果，他们于是想到了印度。1944 年，平汪和昂旺格桑秘密到了印度，会见了印共噶伦堡市负责人觉低士和加尔各答市负责人乔底巴苏。但是，他们的请求——通过印度赴莫斯科，及印共提供武器援助

——却都无法得到满足。1945年回到西藏的平汪，四处求援无门之下，最终决定单干。他们联合了当时掌握了云南藏区德钦军权的恭布次任（汉名海正涛），准备在巴塘开展游击战。谁知就在他们从德钦出发的前夜，恭布次任的政敌知道该计划后突袭了他们的驻地，没收了所有的枪支，并杀害了恭布次任。平汪等人虽然死里逃生、幸免于难，但是国民党的通缉却逼使他们再次逃往拉萨，并被拉萨当局以从事共产主义运动为由，在1949年7月将他们驱逐出拉萨，并责令其经印度绕道返回康区。

从1939年在蒙藏学校开展学生运动直到如今，整整10年过去了。期间对外求援既不可得、自行革命又事遭败露，当初要为西藏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理想仍无眉目。然而，二战胜利、蒋军遁逃、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大半个中国，自己一直崇尚的马列主义有望在华夏大地得到施行。历史关了他的这扇门，却似乎为整个西藏民族开了一扇窗。这个时候，平汪做出了他人生中转折性的一个决定——再次联系中共。

不可或缺的中间人（1949-1956）

1949年9月，平汪一行经过印度的噶伦堡和加尔各答，绕道缅甸，最后回到云南。然后途经昆明和大理，最后到达剑川，与中国滇西北地下党的负责人欧根取得了联系。双方最终建立了合作，平汪和他所创建的西藏共产党所有党员一起加入中共，欧根提供武器支持平汪解放康区南部，而位于剑川的

欧根则继续在云南的西北战斗，以互相呼应。平汪刚回到巴塘不久，正准备发动武装斗争建立西藏人民政府，却收到了中共的电报，称当时的西康省主席、军阀刘文辉宣布起义并接受中共领导，八路军也已朝巴塘推进。此时的胜利竟如此地不费吹灰之力！平汪在巴塘的工作于是就只剩下向当地藏民宣传未来的共产主义政权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平汪就展开了他为时 9 年的汉藏关系中间人的角色。这似乎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形势比人强。」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除了台湾未能收复、港澳仍在租期，在领土方面最重要的目标自然就是重新对西藏实施完整的主权（此时的西藏仍在达赖喇嘛及其拉萨噶厦政府的管辖之下）。1950 年 3 月，平汪在重庆向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等中共领导人汇报其多年以来的工作。其后，平汪便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委员及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解放西藏的工作。此时的平汪是意气风发、斗志昂然的。他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虽然如今无法靠他独力进行革命，但是他仍很乐意参与到中共解放西藏的工作中，毕竟他的理想是西藏人民得到自由。至于成此大业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西藏共产党，倒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

从解放军入藏时始，平汪就在中共对藏工作中多次起到关键作用。1950 年 10 月，昌都战役中解放军大败藏军，并俘虏了守军领袖阿沛·阿旺晋美，当时的前线第一司令吴忠甚至视

阿沛等人为战俘。在平汪到达昌都后，正是他对阿沛的礼让、献「哈达」、长谈，为中共方面争取到了阿沛的合作，通过其与拉萨的达赖政府沟通，并最终得以展开和谈。次年4月，以阿沛为首的藏方代表团抵达北京，与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展开谈判。平汪受命列席始终，并做了大量的翻译和帮助双方沟通的工作。

谈判的全过程并非始终顺利，双方在好几个关键问题上都曾经争论不休，其中有一个细节可以很好地凸现平汪的关键作用。和谈的其中一个关键议题，是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军政委员会，以监督「十七条协议」的实施。由于事前双方没有经过沟通，李维汉在会议中提出此条款时引起了藏方的强烈反对。藏方认为此举削弱了西藏传统政府的权威，并与中共给予西藏自治的诺言不相符。双方争论升级，会场气氛趋紧，一名藏方代表愤怒地说：「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了？中央政府每天都有新的要求，现在当我们以为事情都基本完结的时候，你又提出这个新东西来！」李维汉也被惹怒了，回应道：「如果这是你们的感受的话，那就请你们卷铺盖回家吧。」此时平汪心里很清楚，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中共军队将武力解放西藏。于是平汪想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缓和双方情绪，他对藏方代表团翻译道：「今天大家都动火气了。李维汉说让大家先回到住地北京饭店，改日再冷静地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回到藏方住处，平汪又努力斡旋西藏代表，向他们解释中央政府方面曾经试图事先就这一问题与藏方沟通，并且军政委员会是新

中国所有大地区都设立的临时机关，负责解放初期的地方行政事务。在平汪一番解释之下，双方的误会得以消除，和谈也于其后恢复。最终，双方签订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

和谈结束后，解放军在 1951 年开入西藏。当时西藏工委（由当时的西南军和西北军整合而成）11 位委员中，平汪是唯一的一个藏人。作为一个既懂汉藏双语、谙熟西藏文化，又深知中共中央稳定为先的西藏政策的领导者，平汪在解放军入藏头两年里可谓劳苦功高。驻藏部队所需要的办公场所的购置、部队供给问题上与西藏政府的协调、兴办西藏小学、组织拉萨进步青年协会以及出版藏文报纸《新闻简介》等事务中，平汪在达赖政府和西藏工委之间的协调使合作得以顺利地推进。

1954 年 9 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受中央邀请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其数月间，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会见两位喇嘛的场合，几乎都有平汪参与并翻译。1956 年 3 月，陈毅率领中央代表团赴拉萨，指导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平汪担任筹委会的副秘书长，并作为陈毅的特别顾问全程陪同，为陈毅的多次公开活动担任藏语翻译。

直至今时，平汪这个中间人的角色无论对于中央政府还是拉萨政府，都是十分重要。然而，不久之后，同样是形势的力量，使平汪的角色变得尴尬起来。

拉萨暴乱之根源（1957-1959）

「十七条协议」的蜜月期过后，西藏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西藏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实质就是合作化运动）。虽然达赖喇嘛在北京参加一届人大期间没有和毛泽东正式讨论过这个问题，然而他在回程逗留成都期间，却和参加完雅加达会议经成都回京的周恩来见面并谈及此议题。周恩来表态建议达赖回西藏后不宜马上开始改革，并向平汪解释道：「关于西藏的改革，你必须慎重考虑。中央政府的政策是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相比之下西藏的确是落后了。但是，西藏实施改革的条件仍然不充分。如果领导者的想法和群众的意见有很大分歧的话，贸然改革将不会成功。」虽然周恩来用的词是「群众的意见」，但是平汪心里很清楚那是指西藏传统贵族，而普罗大众是会很乐意看到废除西藏苛刻的赋税和繁重的「乌拉」役的。1956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赴印度参加佛祖涅槃2,500年庆典，周恩来又两次经过新德里与达赖见面，并代表毛泽东承诺西藏未来起码六年之内不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同年9月，中央电示西藏工委，称西藏的民主改革应该是第二个甚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议程，指示停止做改革的准备。

既然中央政府如此诚意地施行「一国两制」，为何几年之后拉萨却会有暴动呢？问题恰恰出在「西藏」二字上。上面提到的西藏，均指行政区划上的西藏。若按藏人聚居的传统藏区

计，则还包括现在的青海省、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部和云南省西北部。自 1955 年毛泽东的政策左转之后，上面提到的这些处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和中国大陆其它地区一样，开始了民主改革。而作为汉藏中间人的平汪，正好从一个中立的角度，见证了这个从「一族两制」演变到藏区大规模暴动的过程。

在毛泽东的号召之下，1955 年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发动的四川民主改革开始波及省内的藏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高峰任省委书记的青海。在这些藏区的民主改革引起了藏民的强烈反对。1956 年 6 月，陈毅离开拉萨返回北京之后，平汪绕道四川境内的康定，回京参加当年 9 月的人大会议。在康定，平汪听取了各方的意见，证实了这些藏区仓促改革带来了很大破坏，并马上把情况报告了中央。但是，除了西藏自治区之外，中央并没有让其它藏区停止（哪怕放缓）改革的意思。在此之后的两年多里，用平汪的话说，「中华大地上有一个民族——藏族——却被施以两个不同的民族政策…正是这导致了 1958-1959 年间的藏民起义。」

理论上说，一国两制或一族两制要得以维持，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两制下的人口无法自由流动。而藏族的一族两制恰恰是违背了这个前提。1956 年之后，藏区的紧张局势开始升温。1957 年到 1958 年间就有大量的康区藏人不满当地的改革而越过金沙江逃往毛泽东承诺六年内不改革的西藏。试想

这些逃亡者来到西藏，向他们的亲戚、朋友、或同胞诉说改革的失败和他们所受之苦，西藏本地的人民自然会对自身的命运产生忧虑了。当越来越多的康巴人涌入拉萨，谣言四起，此时即便西藏工委多么坚定地暂不改革西藏，达赖政府又多么坚信这一点，互相的猜疑都必然会越演越烈。

有两件小事可以很好地展现当时的形势。某日，拉萨解放军的司令陈明义向西藏工委汇报，西藏政府正在拉萨周边地区集结武装，已发现有五六百的骑兵到达了甘丹寺下的拉莫区。平汪由于对拉莫十分熟悉，知道那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遂向西藏工委主席张经武当面指出这一情报可能不准确，并称这种误导性的信息会恶化解放军和西藏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加剧目前的紧张局势。张经武于是在平汪的建议之下派了几个官员实地查看虚实。回报的情况表明，在拉莫根本没有发现骑兵，当地居民饲养的大群牲口倒是有。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更离奇的事情。有一个准备从拉萨调返内地的汉族解放军士兵想临走之前去布达拉宫看看，两个藏族守卫在门口拦住了他，说没有西藏政府方面的许可不得进入。那个士兵说他马上就要离开拉萨了没有时间申领这样的许可。双方争持升级，士兵后来被对方逮捕了，而在这个士兵身上竟发现了两颗手榴弹！藏方认为该士兵是企图杀害达赖喇嘛，于是便监禁并施以鞭刑。西藏工委方面得知这一事件之后非常惊讶，后经平汪向达赖喇嘛斡旋并表明解放军完

全没有伤害达赖喇嘛的意图，此事才最终平熄。藏方也承诺 15 天之内释放那名士兵返回中国大陆。

紧张的局势日渐升级，最终导向了 1959 年的拉萨暴动。暴动发生的时候平汪已经身处北京。他从报上读到的信息称这次暴动是西藏政府事先策划的有目的的行动。平汪无从判断这个定性的真实性。直到 5 月的一天，平汪的一位好友错果率领西藏的一个代表团进京。错果和平汪见面时对他讲：「平汪，我可以对神灵发誓，这次的起义事件绝对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我在拉萨有一些亲戚和朋友身处其中，所以我对实情非常了解。举例说，沙瑟（拉萨一个很有权势的传统贵族和噶厦政府大臣）是我的近亲。他家由于走难过于匆忙，连一个装着他妻子的名贵金符头饰以及他们所有现金的大箱子都留家里没有带走。如果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暴乱，那么像沙瑟这样显贵的大臣，不会连自家最贵重的财产都来不及带走。政府大臣帕拉在逃离的时候也留下了很多金手表，就连达赖喇嘛出逃也都落下了他的所有金手表和自己的日记本。」错果最后对平汪很肯定地说，他们逃跑的决定一定是临时做出的。

在此之后的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了。中央政府最后做出决定，指示驻拉萨的解放军平暴。直至 1962 年，暴乱才基本被平定下来。藏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的达兰萨拉，并开始了至今仍未结束的政治流亡生涯。其实我们今天回想这段历史，关键的问题并非暴乱是否有组织有计划，

而是其背后的原因——一次没有隔绝机制的一族两制试验。这里姑且不论当时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否有过，如果当初金沙江两岸的制度性差异之下没有形成难民的大量西逃和恐慌蔓延，西藏工委和拉萨政府之间断不会产生这样的猜疑，而未进行民主改革的拉萨也断不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反抗。

原本举足轻重的平汪，在这场暴乱前后的两三年里却无力再对时局有明显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中共及其在中共大陆主导的民主改革势强力猛，而拉萨政府相比之下又长期积弱；更重要的是，其实早在拉萨出事之前，平汪已经先于他的民族出事了。经过了与中共的蜜月期后，平汪比西藏更早地成为了大汉沙文主义的受害者！

大汉沙文主义的亲历者

西藏既已解放，中央也已在 1956 年便许诺西藏自治区六年之内不进行平均主义的合作化改革，按理说西藏上下当时应该会满意这样的制度安排。然而正是藏区「一族两制」的政策失误最终酿成了 1959 年的悲剧。不仅如此，其实中国人的大汉沙文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已开始膨胀，并随着解放军一起入了藏。与「反右」扩大化接踵而至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把大批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平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免去了西藏工作的所有职务，进而锒铛入狱，被隔离监禁达 18 年之久。大汉沙文

主义之盛，甚至令文革过后得到平反的平汪在重新致力于西藏工作的时候，仍遭到和 20 年前一模一样的攻击。为西藏人民争取民族自由和幸福生活，对重获自由的平汪来说，却仍然只是一个理想。

蜜月中的隔阂

直到「十七条协议」签订和解放军开始进藏之前，平汪对中共的认知基本上都是来自书本，和中共的官员在工作上很少直接打过交道。1951 年 8 月，由王其梅率领的先遣部队陪同以阿沛为首的西藏政府代表团向拉萨进发。当跟随这支队伍一同进藏时，平汪开始切身体会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行军路上王其梅的一些表现开始让平汪感到震惊。王其梅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武将，但是却疑心重重，他尤其对阿沛和西藏政府官员不信任。由于阿沛等人骑马，而先遣部队的士兵则步行，双方行进速度不一样，平汪便和阿沛商定每天晚上的会合地点。一日，由于王其梅的马突然病死，部队被迫就地扎营过夜。翌日当部队到达原来商定的会合地点时，阿沛留下字条，称先行跨过前面的一座山，在山的那一边等待大部队。当平汪把字条翻译给王其梅之后，王其梅变得很不安，竟然断言阿沛有意先行从而联系藏军埋伏我方部队，并主张停止前进。平汪认为这个猜测毫无根据，但两人都无法说服对方。最后，由于军中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表示同意平汪的意见，王其梅才勉强同意继续行进。越过了那座山，他们才发

现，阿沛不仅在等他们，还准备了粮草。又有一日，部队经过阿沛的庄园领地，阿沛按照西藏传统礼节在庄园设宴招待同行的官员。王其梅知道后，火冒三丈，称这是阿沛想在食物中下毒，并拒绝出席。为此，平汪又和王其梅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平汪说道：「如果你有这样的担心的话，饭桌上阿沛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嘛。」王其梅最后才不情愿地同意赴宴。

王其梅对藏族官员的不信任自然还殃及到了平汪这条「池鱼」。有一次王其梅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说了这样的话：「平汪虽然工作非常出色，在藏族官员中也很有声望，但是那些藏官几乎全部都听他的，而不是听我们的。由此可见，即便这些藏官全都是共产党员，汉藏之间仍然存在民族矛盾。」平汪面对这些无中生有的猜疑，心中的伤感可想而知。日后回望这些事情，平汪才发现他在其后和中共的冲突，其实从进藏过程中的这些争执就已经开始了。

如果说王其梅表现出来的只是文化差异导致的不信任，那么带领西北军进藏的范明则更为「盛气凌人」。张经武、张国华和平汪作为进藏的西南军领导在拉萨会合之后，范明才带着西北军在年底到达。范明进入拉萨城的时候，不顾西南军方面的劝说，执意在拉萨的八廓区（闹市区）进行隆重的列队行进。当拉萨政府的代表去迎接他并献上「哈达」时，范明还轻蔑地把献上的「哈达」推开。这些都给藏方的官员和百

姓带来了很负面的第一印象。并且据平汪观察，范明和他的士兵在来到拉萨之后，经常对西藏百姓表现得很傲慢。1952年初的一天，范明开着他从青海带来的吉普车在八廓区行驶。由于这辆车是除了达赖喇嘛那辆几乎从来不使用的「座驾」之外拉萨城内唯一一部汽车，范明的出现引起了集市上的混乱。一些藏人的驴被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吓得惊叫蹿跳。于是卖驴的商人便向范明和他的警卫扔石头。范明一气之下就把他们都逮捕了。事后，这些商人被范明定为受拉萨政府的指示向其扔石头，还遭到了范明手下的殴打。最后，在平汪的斡旋下，范明迫于西南军方面的批评才释放了那些藏人。

虽然当时中央已有明确的少数民族政策，即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但是平汪已经慢慢感觉到了领导层中的汉族优越感。他本以为共产党推翻了蒋介石，民国时期的大汉沙文主义也会随之在中国大陆消失。如今平汪发现，原来自己太天真了。

异梦岂可同床

在中央还没有明确指示西藏何时进行民主改革之前，在拉萨已经安顿下来的驻藏领导层内部就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平汪认为改革有两种方法。一是自上而下，由西藏政府在中共的领导下实施改革；二是自下而上，由西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进行改革，中共只是作为建议者。平汪当然是第二个方案的支持者，毕竟靠中央指令进行改革并不符合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范明和他的西北军认

同第一个方案。虽然张经武和张国华没有明确表态，但平汪很担心连他们也会支持第一个方案。而至于改革的时机，范明认为应该越快越好，甚至直到后来毛泽东明示西藏改革应该慎重，范明仍然主张尽快改革。幸好平汪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而范明的坚持最终也没能在西藏工委中获得通过。

其实除了民主改革之外，当时的西藏工委还在很多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比如，1952年初藏方军队中突然出现了「雪山狮子旗」（也就是至今藏独示威人士仍然在使用的那面旗帜）。拉萨政府坚称那不是什国旗，而只是藏方军队的军旗。但是范明对此反应十分强烈，称一定要出手制止「分裂活动」。张经武和张国华却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不利于他们争取拉萨的上层。更大的分歧出现在处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关系上面。自从1924年九世班禅因税收问题和十三世达赖翻脸并逃到了青海之后，两位老活佛就结下了历史恩怨，并随着他们的转世而「遗传」到目前的两位少年活佛之间。「十七条协议」签订时，在北京的要求下达赖方面最终承认了班禅。于是1952年班禅一行终于得以返回西藏。范明此时积极主张班禅喇嘛在羌区（即与达赖的「前藏」相对应的「后藏」）另立政权，并称思想相对「进步」的班禅应该在他的领地首先进行改革。虽然仍然被西藏工委否定了，但是范明挑起的事件已经给这个领导层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分裂。平汪感觉到他和他的汉族同志之间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

然而，还没等平汪设法改变这个局面，他便暂时地离开了西藏三年。而把平汪弄走的，正是与他意见不合的范明。1953年，平汪带领西藏的一个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共佛教协会的成立仪式。仪式结束之后，国家民族委员会的汪锋和刘格平知会平汪，让他留在该委员会的政法司任副司长兼民族出版社的副总编。当时平汪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事后他才发现，这恰是范明政治操控的结果，目的就是让平汪不能再在西藏地方事务上给他带来「障碍」。等到1956年平汪陪同陈毅访藏时，西藏工委的工作与平汪走之前相比，已变得非常激进，范明甚至冒着中央要求西藏暂缓改革的指令，私下展开改革的尝试。

自由离他而去

树大招风，不谙官场规则的平汪很轻易地就在党内斗争中倒下了，随之而去的，正是他毕生为西藏人民追求的东西——自由。1957年夏，平汪从拉萨返京参加当年的人大会议。汪锋在北京约见了她，并对平汪说：「你不但是驻藏官员的核心领导，也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等最高领导人的器重。领导集体的融洽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在驻藏领导层中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作为里面唯一的一个藏族官员，你可以坦诚地把个中情况告诉我，我会把你反映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毫无心计的平汪于是把范明违背中央的指示在西藏特立独行的情况告诉了汪锋。然而不久之后平汪将会发现，这是他一生中

不应该说的话，他为此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人大会议结束之后，平汪还在 7 月份去青海参加了中央召集的少数民族特别会议。在西藏代表团的分组会议上，德格王子建议把当时属于四川德格管辖之下的其中四个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管辖的昌都之下。平汪马上就明白过来，此举意在让这些地方可以躲过民主改革。平汪和阿沛等人对此表示反对，提议也没有获得通过。然而事后平汪居然发现，这次会议的汉族记录员却把事件记成平汪参与提议这个区划调整。这马上引起了中央对平汪的一场误会，并在其后成为了平汪入狱的「罪状」之一。

1958 年的政协会议上，汪锋提出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而此前毛泽东的说法却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沙文主义』」。汪锋这一「变调」之后不久，平汪便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其罪状居然是提议把德格四县划归昌都，以及在随解放军入藏时把列宁的著作《论民族自决权》带到拉萨。这是让平汪完全无法接受的——前者平汪已经向周恩来亲自解释过，而后者却是中共所信奉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58 年 4 月，平汪在北京被就地免去了西藏事务的所有职务，调到社科院民族所任副所长，并被要求进行思想检讨。1960 年 8 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对平汪进行隔离审查，被警卫二十四小时跟随看管。

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平汪终于在无意之间知道了自己被陷害

的真正原因。看守平汪的警卫中有一个是曾经是西北局工作过的党员。一日，恰逢他和平汪两人独处，他便问平汪是否曾经得罪过别的什么官员。平汪于是把在汪锋面前批评范明的事情告诉了他。这个警卫听到之后对平汪说：「你犯了一个大错误了，范明可是汪锋在西北局的干将啊！」平汪这才知道他做了一件多么幼稚的事情。可是为时已晚。8月31日，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带人来到平汪的房间，宣布平汪被怀疑从事反革命活动，当场逮捕。下午四时三十分，38岁的平汪被套上手铐，正式开始了他在北京秦城监狱的单人囚禁牢房里没有自由的18年牢狱生活。

平汪在这个以关押政治犯出名的监狱里的生活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伙食恶劣、不予户外活动和进行没有实质内容的反复审问自然是常规项目了。除此之外，平汪还受到了多种精神上的折磨。他们知道平汪有几个年幼的小孩，于是不时让一个小孩子在他的牢房外面哭；他们知道平汪无法和自己的结发妻子相见，于是不时找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士对平汪说上几句挑逗的话然后离开。看守员或是不时地在送饭时往食物里吐上口痰，或是不定时地在夜里走进牢房对平汪施以拳脚。他们曾经使用过的最重的折磨，居然是在平汪的饮用水中下毒，令他产生尖锐的耳鸣，以及用超声波给他带来难忍的头痛。一次，平汪被折磨得愤怒之至，在一本共产党宣言上血书：「毛主席、周总理、法西斯和大汉沙文主义，是所有西藏人民最大的敌人。」

平汪确实可以算得上在「反右」和「反地方民族主义」期间遭受冤狱的人中坐牢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他的多年革命同伴刀登被迫害致死，昂旺格桑则被强制劳改 16 年；结发妻子紫莉娜被迫害致死，亲弟弟图登旺秋在秦城关押 14 年，而长子平康也被关押了 6 年。以平汪为首追求藏族人民的自由的进步藏人，却在西藏解放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纷纷受到迫害。平汪曾拿自己的经历和坐牢超过 20 年的尼赫鲁和甘地相比，说他们的牢狱不是连续的，并且还可以和其它的囚犯接触；但是自己，却是在一个封闭的牢房里与世隔绝 18 年。

直到 1978 年 4 月末，平汪才被释放。虽然重获了自由，但是平汪当年的罪名仍然未被平反。平汪于是顽强地向中央提出申诉。1979 年，达赖喇嘛的哥哥和班禅喇嘛先后在北京专程和平汪见面也间接为他带来了正面的影响。最终在 1980 年 4 月，平汪才正式被平反。18 年没有自由的日子给平汪上了最重要的一课——自由之真正价值。期间，平汪还潜心苦读了大量哲学和逻辑学的书籍，出狱后还出版了数本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著作。当平汪在 80 岁高龄回忆起这段日子的时候，竟能坦然地说道：「与所经历的苦难相比，我所获得的还要更多一些。」

历史几乎重演

平汪出狱之后，有一件事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1979 年秋，邓小平邀请达赖喇嘛派一个使团访问西藏地区，视察西藏社

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是达赖流亡之后派出的第一个来到西藏土地上的代表团。中央政府为了给代表团留下正面的印象，特意指示当地的官员做好群众工作。统战部认为西藏的民众一定还对旧社会怀恨在心，担心他们会对这些以前的阶级敌人和分裂分子做出不友好的举动。当地官员甚至逐户通知百姓不要向代表团扔石头或吐口痰。谁知当这些代表到达西藏之后，当地的藏民居然热情地向代表团欢呼和表示支持。曾经在 1959 暴乱之后和文革期间参与推翻「剥削阶级」的同一批藏人，如今却把返回西藏的流亡政府代表团视为英雄。几万的藏人在拉萨争相向代表团献「哈达」，一些民众撕下达赖的哥哥洛桑三旦衣服上的布碎以作护身符。部分藏民还当场喊出了「自由西藏」和「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事后代表团的成员告诉平汪，不少的藏族官员和民众还向代表团送去了他们在文革大破坏期间偷偷保留下来的一些佛像和宗教画卷，让代表团带去给身在印度的达赖喇嘛。

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情地表明，过去的中央政府是多么地不理解西藏人民的感情。这也让平汪开始重新思考西藏的政治和民族问题。现在事情已经非常地清楚，西藏的主要问题是民族问题，而非所谓阶级矛盾。平汪认为中共应该重新审视 1959 年之后的西藏历史，并改变过去的民族政策。于是，重新恢复了一切党政职务的平汪毅然地作出决定，再次投身到争取西藏人民的福祉中去。

80 年开始，胡耀邦亲自过问西藏事务。5 月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并发表了六点改革安排——西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减免藏民赋税负担、加快发展西藏经济、恢复西藏的文化和科教发展、西藏的藏族官员予以重用。这些都让平汪看到了改善汉藏关系的希望。其后，平汪多次向胡耀邦进言，建议对 1959 年的叛乱重新评价、反对在少数民族地区用军队来执行治安任务、主张藏族官员应该被赋予实权而非只是响亮的头衔、建议中国大陆对西藏自然资源进行利用所得的经济利益应该让藏族人民享受合理的份额等等。平汪的这些意见得到了胡耀邦的肯定，并且在党内高层也受到了重视。

然而，平汪的手脚才刚刚伸开，20 年前的历史就几乎要重演。平汪向胡耀邦谏言之后不久，指摘平汪追求「大西藏」和试图主宰西藏事务的谣言便平地而起。不久之后，平汪得知一个由时任国家民族委员会主任的杨静仁等 13 名主要官员组成的小组，居然用了五个月的时间，炮制了一份一万字的攻击平汪民族思想的报告，并以当年领导「十七条协议」谈判的李维汉的名义上呈中央。平汪用几个星期写就的 2 万 5 千字的回应，并同时发给李维汉、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习仲勋等主要领导，以防被杨静仁拦截。然而，当以李维汉之名批评平汪的材料被抄送中央委员会和主要的高层领导时，平汪的这份长篇回应却没有被包括其中。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阴法唐还专门召开大会针对这份材料对平汪进行批判，并称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平汪是「三大政治敌人」。

1983 年年中的人大会议，平汪作为人大代表的身份还差一点被杨静仁以平汪陷入民族问题争论为由除名。后来平汪亲自上门找到时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才在他的帮助下恢复了代表的身份。平汪对习仲勋说：「我直至今日从来没有向党提出过一个个人要求。但是，您现在也看得很清楚，那些以前曾经攻击过我的人，现在又卷土重来了…您刚才说会向胡耀邦汇报这件事，我也会向他，甚至向邓小平，汇报这些情况。我一定会为代表西藏人民而斗争。」

虽然现在平汪再次因为他在西藏和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意见而被置于党内大汉沙文主义者的攻击之中，但是 20 年前的历史幸亏没有重演。在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的过问之下，对平汪的攻击最终被平熄下来。阴法唐等官员在 1984 年的 4 月上门向平汪道歉。然而，在民族问题上，汉人当年的沙文主义似乎并没有实质性地转变，这不得不让晚年的平汪伤感万分。

平汪在他的传记的后记中（写于 2002 年）不禁说道：「我常常为西藏民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而忧虑。当胡耀邦总书记在二十年前接见我的时候，我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其中一条是拉萨永远不应该改变。它是雪域藏人几百年来的圣城。拉萨之于藏人，就如麦加之于穆斯林…既然现在中央对西藏人民和他们的历史负有责任，我希望中央能够仔细地考虑这一重责任，废止会带来负面效果的政策。然而，让我十分困扰的是，二十年过去了，情况却毫无寸进。」

后记

不但平汪的传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西藏问题的一个独特角度，阅读平汪的生平更是让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2002年的一天，已完成了书稿的 Goldstein 问平汪，传记的出版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平汪听到后笑了，说：「我不知道你具体写了什么，但是我这几年来对你说过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所以我确信这本书不会有什么问题。要是真的有，即便他们要把我再弄到监狱里，我也不害怕。」

中华大地有民如此，幸也！

奥运·西藏¹

朱进佳

2008 年奥运圣火的传递，因受到关注西藏人权人士阻扰而全球瞩目；中国境内外华人则在狭隘民族主义的呼唤下搞了个什么「护圣火，爱中华」的动员。

自三月以来，中国西藏首府拉萨市爆发僧人和平民抗议后，形成一股席卷境内外的抗议浪潮。奥运圣火也不能「幸免」，四处遭到声援西藏行动的阻扰，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加重的中国意欲借助 2008 奥运粉饰太平的计划，恐怕快要功亏一篑。

奥运的「传统」

国际奥运会委员会（奥委会）以不干预政治为由，企图置身度外。过去奥运不干政的「传统」，其实是在政治上合理化暴政存在，对压迫的现实袖手旁观同时，还百般排挤异议。

惹人争议的奥运已不是第一次，1936 年柏林奥运成为纳粹德国耀武扬威的舞台，那应该是奥委会最不堪回首的一届奥运会吧。

¹ 本文刊载于马来西亚《独立新闻在线》的《左言起行》专栏

40年前，1968年墨西哥市奥运的前戏，是该城市的进步学生遭独裁政府血腥屠杀，奥委会缄默不语。但是，当两名非洲裔美国运动员在同一个奥运会上赢得男子200米冠亚军，站在颁奖台上举起「黑拳」（黑权）敬礼以示对国内民权运动的支持，却被奥委会驱逐出奥运。屠杀抗议学生没当作一回事，一个象征式的、和平的反种族主义手势却是奥运官方不能容忍的「罪恶」。

当然，有人还是希望中国主办奥运可以改善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但是事与愿违，这与奥运传统也可能有着莫大关系。北京市为了迎接奥运而清理市容，不仅清理了多少民房，驱逐了多少穷人，反对强拆的维权分子还遭政府打压。同样的事情不是中国的专利，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当地政府实行了迫害流浪者的法令，将市区内的穷人赶走，让路给盈利丰厚的发展重建。

西方媒体的伪善

西方媒体大事报道西藏问题时，却可以忽略了中国境内维吾尔人同样遭中共打压的事件。新疆维吾尔人反抗中共强权统治的斗争，同样遭中国政府铁腕镇压；不过，由于维吾尔人的抗争以回教为旗帜，所以不符合西方帝国主义的胃口。「恐回教症」是自「反恐战争」发动以来帝国主义的主要宣传手段，旨在取代冷战的反共宣传，以合理化西方对第三世界的侵略。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支持了西藏和新疆的武装分离分子，旨在打击威胁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斯大林主义阵营，以及围堵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现在「反恐战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重要一盘旗子，所以形象「圣洁」的藏独可以继续用来制约中国的同时，东突伊斯兰运动却是华盛顿北京同仇敌忾的「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美国当年支持塔利班这批「自由斗士」对付前苏联，现在「自由斗士」摇身变成「恐怖分子」。

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眷顾，却不见得也同样体现在关于库尔德斯坦、巴斯克、车臣、淡米尔伊拉姆、巴勒斯坦等地解放斗争的报道上。很明显的，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跟帝国主义的利益相左。

西藏的「神话」

西方媒体和政客对西藏的关心，是伴随着冷战时期西方帝国主义编造出来的「神话」，通过象好莱坞明星理查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德基尔这样的热心人士，还有那个戴着诺贝尔和平奖光环的达赖喇嘛来当这个「神话」的宣传大使。这个神话就是被中共解放前的西藏，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精神天堂。

事实上，解放前的西藏社会，是一个由神权贵族支配农奴的极为贫困的社会。什么世外桃源，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意图染指这个处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喜马拉雅山王国所编造出来的

神话。类似的神话，早在发现「新大陆」的时代已经开始用在今天的拉丁美洲。

中国 1949 年革命后，解放军进一步占据西藏，尽管为当地人民带来了经济发展，并将当地人民从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但是粗糙的、由上而下的「解放」，造成了对当地文化、语言和宗教的破坏，无疑跟中共至今仍然奉为教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所倡导的「民族自决」，似乎格格不入。

中国在 1980 年代「改革开放」让资本主义以红色外衣包装复辟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主导经济，这种让少数人富起来先（也就是让更多人穷下去）经济发展，加剧了西藏和新疆的族群紧张关系。中国沿海省份经济迅速成长，新疆和西藏却远远被抛在后头。加上大批汉人向西藏迁移，支配了西藏和新疆两地的经济，让当地的人民更感到歧视和被边缘化。今天西藏人民潜伏着对北京中央的不满情绪，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本身，而是当地人民被排挤在发展之外。加上文化上的压迫，肯定是火上加油。

民族主义两刃剑

反对奥运圣火传递的亲西藏示威，以及西方媒体对西藏课题报道上出现扭曲事实，也激起了海外中国移民和留学生的反示威。海外中国人示威的规模和愤怒的情绪，反映着对西方

媒体偏袒报道、扭曲事实和伪善表现所表达的强烈不满。

中国海外华人，还有中国境内年青人什么「护圣火，爱中华」动员，却充斥着一种令人难以窒息的「大中华」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恐怕跟反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相去有一段大距离。

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当然是具有进步意义。上个世纪二战后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是进步的民族主义。今天中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主要玩家，跟美国形成「浮士德」联盟的时候，在国内呼唤起来的民族主义，恐怕就已经没有这种意义。两次大战期间要「崛起」的日耳曼德国，正是走向了民族主义的另一极端。

因这种大中华狭隘民族主义作祟，而对着被西方大财团控制的媒体摇旗呐喊时，到底多少人蒙蔽了双眼，无视中国境内国家官僚机器无孔不入地钳制媒体自由。当以中国工人利益为出发的网站被关闭时，有多少人可以在中国境内站出来示威抗议？恐怕今天要以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在中国成立一个政党也要被取缔。

一场民族自决的抗争

西藏人希望独立的意愿，反映着西藏人在北京集团统治五十年下的现实，那就是西藏人被贬为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谈到二等公民，马来西亚的华人，又是否会感同身受？

民族自决是西藏人民民主权利，也是世界各地其它被压迫民族的民主权利。

为西方帝国主义效劳的政客和媒体，今天对西藏人民斗争的支持，并不是出于真心结束西藏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就像在冷战时期一样。冷战时期西方企图分裂中国，以打击让第三世界所向往的中国革命，当然它们更希望中国成为欧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后花园的。

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是跟冷战时期不一样了，一条衔接北京拉萨，比万里长城还要长的铁道，正把资本主义输入西藏。通过牺牲无数工农而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

四分五裂的中国，其实对目前脆弱的全球化经济来说并没有好处可言。西方帝国主义者需要一个强权的政府，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强加给中国。不过，西方帝国主义者还是担心正在「崛起」的中国过于强大，所以需要一些课题来制衡中国，确保中国乖乖就范地遵守由华盛顿指挥的全球资本主义游戏规则。西方的西藏代言人达赖喇嘛，也都不讲独立了，正是符合今天西方帝国主义的布局，恐怕西藏境内外期望西方势力可以让西藏脱离北京专政的普通西藏人要扑一场空了。

西方媒体对西藏人支持有加时，却不见得其它的人民的民族

自决民主权利也受到同等重视，抗争多年的巴勒斯坦人民受到西方媒体的待遇可以佐证。西藏精神高尚的僧侣，跟巴勒斯坦自杀式攻击的恐怖分子，都是西方媒体种族主义标签的成品。

西藏人不用期待西方势力可以真的像救世主从天而降来拯救他们。西藏人争取正义的奋斗，其实也跟整个中国工农在资本主义复辟下进行反抗的命运牵连在一起。支持社会正义的人，还是应责无旁贷地支持西藏民族自决的抗争。

2008 年 4 月 30 日

《劳动合同法》风波面面谈

零下

改良还是改恶？双赢还是双输？

2007年6月29日通过、2008年1月1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简称「新法」）成为中国社会瞩目的焦点。有人力捧，有人「忧虑」，有人恨之入骨，立场和角度各各不同，「裁员、重签合同、劳动派遣」一连串「阵痛」更是震撼了社会。

跟《劳动法》相比，新法主要是对劳动合同的签订、解除所做的详细立法，从某些方面减小了老板们钻空子的机会。除了强制性规定需要签订劳动合同之外，其它「亮点」主要有：

◇ 无固定期限合同——《劳动法》的规定是：「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新法大大增加了强制性，第14条规定了三种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情况（主要是连续工龄满10年；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续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要解除劳动合同，需要符合某些条件，如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严重失职、企业发生重大的经营变动，等等（见第39、40、41条），不能像从前那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 ◇ 试用期——规定了试用期限、试用次数、工资标准。
- ◇ 社会保险——规定必须在劳动合同条款中列明。
- ◇ 劳务派遣——规定了劳务派遣中的派遣岗位和人数、派遣期限、报酬、社保数额与支付方式，等等。这一部份是原《劳动法》当中所未涉及的。

《劳动合同法》草案从2005年初重新启动后，经过反复修订。从相关报道看，中国社会发生的劳工问题（如王斌余讨薪杀人事件，劳资纠纷案急增，山西黑砖窑事件）和意识形态纷争（围绕国企私有化、物权法的大辩论，「反思改革」的潮流）都对草案基调、内容和进程有影响。这是一份少有的立法前广泛征集意见的草案。欧美商会、工商联、全国总工会等组织都参与其中。政府在制订自己相当重视的这一改良措施时，力图平衡各方利益。立法时间长、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颁布后留下半年缓冲期。这既是舆论攻势，也是对大小老板们提早知会，让他们有所准备，减轻社会震荡。

《南方人物周刊》称，针对《劳动合同法》草案，国内学界分成了两派：「以常凯为代表的『京派』认为，草案正是为了平衡我国劳动关系中劳方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以董保华为代表的『海派』则认为，草案对劳动者保护『过度』，不符合

实际情况，结果可能适得其反。」¹

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有人认为新法在修订中从劳资双保护变成对劳工的单保护²，有人则认为修订过程已越来越多地向企业利益做了让步。工商联、企联、中国美国商会都很早就被邀请参加讨论草案条文。欧盟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起先态度强硬，声称「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后来则提出详细的意见书。³「（美国）商会对大多数的修改都感到满意。美国商会在 2006 年 4 月草案征求意见时提出的意见有四分之三都在修订稿中得到了解决。」⁴可以说，在反复修订中，「保护和偏袒劳工」的倾向已有所减弱。⁵

尽管如此，新法仍然让老板及其雇佣文人恨恨不已，认定是国家干预劳资关系，违背了市场规律，会妨害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最令他们深恶痛绝的，就是有关「无固定期限合同」

¹ 《董保华：中国将为《劳动合同法》付出代价》，见《南方人物周刊》2007 年 11 月，作者：陈小瑾 陈磊

² 劳动合同法草案一审稿对立法宗旨的表述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最终表决通过时确定为：「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引震荡 企业频出损招劳动者心思重重》，中国青年报 2007 年 12 月 14 日）。

³ 刘涛《劳动合同法：激辩与冲击》，载《中国企业家》（2008 年 2 月）

⁴ 驻北京美国商会主席詹姆斯·吉默曼（James Zimmerman）。见《美国在华公司插足新劳动法：赢利高于人权》（《环球视野》2007 年 6 月）

⁵ 同[1]。「董保华：一审稿、二审稿、三审稿，其实改了不少，国家也按我们这个方向改（即「不能搞铁饭碗铁交椅」）——笔者注），但只能说底子太差了，改不回来了。」

的条款，它使老板解雇员工的自由受到限制。官员和温和改良派通常这样回应：新法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稳定劳资关系，扩大国内消费…最终导致双赢；否则，「只考虑资方利益，而漠视劳方的利益，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真的要毁于一旦了」⁶可惜老板们不吃这一套。

到底新法是改良、改恶？双赢，双输？对谁而言？先拿《劳动法》做个比较。

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

「12年前，同样的欢呼曾经为劳动法的诞生而响起…当时的法学界有人称其为『劳工神圣的卫士』。

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并不小，有些规定甚至走在世界前列。可是多年以后的今天…血汗工厂、黑砖窑、以死讨薪等让人惊心动魄的悲惨事件一次又一次出现，就好像时光突然回到一个世纪前的日本，或是 1850 年的西里西亚、19 世纪初的兰开夏郡。」⁷

1995 年初正式施行的《劳动法》，据有关专家说，是他们研究、参考了其它多数国家的劳动法之后，精心设计出来的。

⁶ 《回应张五常：劳动合同法将促进而不是毁掉中国经济》中国青年报，2008 年 2 月 1 日

⁷ 《劳动合同法：越来越大的冲击波》，南方周末 2007 年 11 月 29 日（肖华邓瑾）

直到今天，还有参与制订劳动法的专家在媒体、网络上发表言论，痛斥这样一部「好法律」在现实中无法兑现——政府部门不执行，老板们不理睬。

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中央政策好，可惜下面不执行」？

但某些国企工人的感受却不同，比如安源煤矿的工人就说：这十几年来，中央颁布的政策和法律，好像总是跟我们过不去...⁸

劳动法就是例子。对本来就毫无保障、备受压榨的农民工来说，它是不起作用的「好法律」。但对 90 年代中后期的国企工人就不同。在旧体制下，工人是有岗位保障和一定福利的，干部不能像资本家那样随意解雇他们。但工人也没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甚至没有自由择业权，一切操纵在「国家」即官僚阶层手中。在走资进程中，官僚通过巧取豪夺的私有化把自己变成资本家，同时需要引进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包括有权解雇工人。《劳动法》的出台，正是为了配合这场针对工人的「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运动⁹。因此，虽然其中某些规定看起来比发达国家「先进」，例如「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36 小时」，但法律本身服务于倒退的目的。问题不在于制订劳动法的专家们意愿如何。不管专家们多么同

⁸ 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 年 3 月）

⁹ 包括「事业单位」员工也开始普遍采取合同制、聘用制。

情工人，他们也不可能把罢工权写进劳动法的条款里。

制订新法的背景则是：中外资本家对中国工人多年的压榨积累起大量的社会矛盾，需要稍加纾解，进行「真正的改良」，前提是——政府对劳工运动施行绝对的控制、禁止、取缔。

基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实，新法会否落空，尚待观察。大企业颇为紧张。如果中小企业动静不大，那只是因为它们一向就惯于违法，地方政府也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保证劳工权利的落实。

在欧美近现代史上，有关劳工权利的立法通常是相当重要的事件，是阶级力量彼此斗争的结果。进步的立法都是靠工人运动、民权运动流血流汗争取来的。「中国国情」则不同，工人阶级虽然备受压迫，却仍幼稚和缺乏力量，立法完全是上层操作。当然不能说法律不起作用。政府建设「法制社会」的意图是严肃认真的，这从它至今不肯恢复「罢工权」可见一斑。劳动法沦为空文，首先缘于官商的联手压迫，但也跟工人的受蒙蔽状态有关。相当部份的工人还缺乏劳工权利意识。因此，通过宣传劳动法规唤起这种意识，仍然重要。

但工人还需要理解到：法律既规定工人的权利，也限制工人的抗争；不论要废除压迫工人的法律条款，还是要兑现劳工权利，归根结底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力量。

中国绝不是特例。90年代以前的南非黑人工人曾经跟中国农民工一样没有「公民权」,经常被警察搜查证件、拘捕和殴打,他们组织工会进行奋勇抗争¹⁰。在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劳工法例对工人也曾是废纸一张。1970年11月,青年工人全泰壹在抗议活动中自焚并高呼:「我们不是机器!」「遵守『劳动标准法』!」。之后二十多年里,韩国工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于1987年掀起震惊世界的大罢工浪潮,建立了大批工会。1997年1月,300万工人发动长达三星期的罢工,迫使政府同意修改新劳动法。因为新法限制工会,让雇主能够容易地解雇工人、雇用临时工和拒绝参加罢工者。

总之,权利不是恩赐来的,是抗争来的。

改良的步子多大? 胜算几何?

不论是为了改善政府在国际上或国民眼中的形象,还是为了让过于残酷的剥削制度能够缓和些,稳固些,总之近年来,中央采取了多种改良行动,包括减免农业税学杂费,建立农村低保系统。我们相信制订新法的本意也是为了让劳动者在某些方面有所保障(尽管改良力度在「充分考虑各方要求、平衡好各方利益」的盘算中减弱了¹¹)。这从新法出台后,老

¹⁰ 中国的自由派大多有意识地把农民工当作农民,理由之一就是「农民工没有公民权」。但「没有公民权」无妨于南非的黑人工人拥有「工人意识」。

¹¹ 刘涛《劳动合同法:激辩与冲击》,载《中国企业家》(2008年2月)

板们的「忧虑」、「震惊」和大小企业「规避新法」风潮以及《七成企业希望修改〈劳动合同法〉》之类的报导可以看出。

但要说新法承担着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现状的重要使命，力求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供过于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工资水平一直没有提高，乃至黑砖窑的出现等等」¹²，那就太夸张了。新法仅针对劳动合同（签订和解除）部份，基本上不涉及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待遇，当然更不可能解决「黑砖窑」、「包身工」或监狱式工厂问题。

不过，新法仍然刺激了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尽管它只涉及劳工权利极狭窄的一个部份，但仍是一个重要部份。不管「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如何赞美利伯维尔场，劳资的「平等契约」，避而不谈金钱、资本之为重要的经济权力，一般受雇的劳工者从切身经验可知：他们在老板和管理层面前是毫无权利的。在老板手下干，你就别提什么劳动法，否则解雇走人，最少给你小鞋穿。工人要想改善工作条件、劳动环境和待遇，除了向劳动部门投诉并且通常无效之外，都只能运用集体抗争手段：怠工、罢工、示威、堵路、集体上访等等，法律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但集体抗争虽在增加，比例毕竟较小。个别工人诉诸法律的最常见原因，是被拖欠了几个月工资、被无理解雇、遇到工伤职业病被企业抛弃，等等。也就是说，在

¹² 《劳动监察执法如何方能拳出有力》法制日报 2008 年 1 月 8 日

仍然受雇的「正常情况下」，个别工人极难抗争，而在被逼上绝路，主动或被迫跟老板决裂，因而没有了「后顾之忧」时，工人才能鼓起勇气，或不得不运用法律来「维权」。

老板们和张五常之流深恶痛绝地攻击「铁饭碗」、「终身制」、「用工成本提高」，声称市场经济你情我愿，老板跟员工可以你炒我我炒你，公平得很。不少老板还抱怨工人尾巴翘得高，爱走就走，不顾企业生产需要订单紧迫。张五常还说：「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跪下来也留不住」¹³。那么，这里更应谈谈媒体较少提到的辞职难问题。

关于珠三角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媒体多有关注。新法出台被称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早在 2006 年中，就有报导：

「尽管工资提高，但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工人特别是女工的流动率非常高。目前，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出现用工不足情况，小厂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为了留住工人，一些企业主要求工人必须抵押身份证或者数百元现金作为保证，工人工资 6 个月或一年结算一次。尽管如此，还是无法阻止工人跳槽的欲望。」¹⁴

¹³ 张五常《新劳动法的困扰》，2008 年 2 月

¹⁴ 《珠三角用工环境再调查 老板工人都活得很痛苦》，第一财经日报 2006 年 6 月 27 日（记者陈婧，发自东莞）

面对「用工不足」，老板们通行的做法不是「跪下来」或提高工资待遇、减轻劳动强度，而是加强对工人的人身自由限制。事实上，抵押身份证、进厂交纳押金、每月扣押工人的部份工资，这类措施早已盛行。不计其数的打工者由于辞职难，或者被迫继续干下去，或者选择自离，忍痛丢掉押金和一两个月以上的工资。多少老板靠着这个，几年下来，就克扣了几万到几百万的血汗钱！「民工荒」之后，工人的待遇提高有限，辞职却更难了。

新法恰巧使工人在这方面更「有法可依」。也就是说，受到侵害并主动或被迫跟老板决裂的劳动者，在「依法维权」时可能有更多胜算¹⁵。胜算大小主要不是取决于法律本身¹⁶——打工者在时间、精力、钱财上也很难耗得起从仲裁到诉讼的马拉松程序——而在于工人利用法律斗争的空间或可能性。假如这种方式有效，它就会对老板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构成威胁，必然招至或者激化对抗，遭到官商或明或暗的打压。而只要工人仍是弱势，胜算将立刻随之减小。

近年来，打工者的权益意识不断提升，对新法非常关注。新

¹⁵ 工人打「维权」官司的获胜比例较高，不是因为法院「偏袒」他们，主要是因为老板的侵权事实过于明显。「企业违法成本低」是中国社会的共识。

¹⁶ 例如 2007 年 12 月 29 日出台、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有可能减轻「维权」劳动者的仲裁负担（取消仲裁收费，用人单位承担更多举证责任），加强仲裁力度（部分案件可「一裁终局」）。

法能否带来希望，至少满足他们部份的急迫要求？假如它根本无用，或不被执行，是否会在打工者之中埋下又一颗失望或愤怒的炸弹？¹⁷...在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的年代，试图通过改良来延长寿命的统治阶级，总要面临类似矛盾。

总之，新法是范围狭窄、有限度的改良，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劳动者提高抗争意识和能力。然而，伴随新法而来的第一个结果，是老板们的疯狂反扑，毫无组织、缺乏力量的中国工人则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未蒙其利，先受其弊——老板重拳出击

老板及其雇佣文人反对新法的理由大致有：无固定期限合同是铁饭碗、铁交椅、终身用工制（董保华）；新法养懒人，政府越要保护工人，结果越是害了工人（张五常）；新法会伤害利润微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中小企业，令其破产，而「没有企业哪有工人」；政府在搞「企业办社会」，把自己应承担的劳动者福利保障的责任转嫁到老板身上；新法妨碍老板多赚钱，「违背了市场规律」；董保华还预言会发生三波裁员潮…

很不幸，现实的发展似乎证明，张五常和董保华之流才是对的：「年前被裁掉的正是新法最想保护的那类人群。在『踩雷』

¹⁷ 「…珠三角劳资矛盾越积越深。受访的专家认为，目前至未来一两年时间内，珠三角将迎来劳资矛盾高发期。」见《劳资演绎新博弈》（《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1月，记者：王勉 徐清扬）

之前，企业老板们提前与他们划清了界限。」¹⁸有电视新闻报道：最近的劳动市场多了很多大龄劳动者来找工作，他们都是公司在年底不续约的，要赶紧出来找工作，还有一个劳动者无奈地说，他工作不少年了，一直以来还算胜任岗位，公司也跟他续约过几次，但这次年底公司明确说不续约了…

工龄越长，越容易成为被炒的对象。一般打工者都深受其害。而由于新法对「试用期」和相应报酬做了较严格的规定，结果是：「企业在招聘大学生时会比以前更谨慎、理性」，「大学生面临的就业竞争会更大」。¹⁹

继华为之后，沃尔玛、泸州老窖、中石化在郑州的分公司以及其它大小公司（甚至中央电视台！）争先恐后地行动起来…就连学校和政府部门也不例外！

总之从南到北，从上到下，各行各业，高端低端，从国企私企外企到银行到事业单位到政府机关，华夏大地处处刮起裁员、重签合同、劳务派遣风潮，乃至「怪招迭出」，一直延续到 2008 年。政府的「善举」迎来的，不是劳动者的小阳春，却是更加狂烈的严寒风雪，是一场由「改良」所点燃，由全体老板发动而劳动者处处挨打的阶级战争！

¹⁸ 《热点聚焦：2007 年底谁让老板「集体恐慌」？》市场报 2007 年 12 月 21 日

¹⁹ 《上海人大称劳动合同法成大学生就业双刃剑》中国青年报，2008 年 1 月 28 日

但这并非先例，早在 1994 年国家颁布《劳动法》的时候，各地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为了避免将来可能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就曾经纷纷裁掉老员工。

这次，老板们——尤其是大老板大企业——更加紧张。这不是因为新法比劳动法更触犯老板的利益，而是因为阶级矛盾本身激化到了一定程度。许多老板派出人力资源部经理，参加种种「劳动合同法培训课程」，务求做到「熟能生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找到应对之道。律师和劳动法专家们自然大发其财²⁰。地方劳动部门也由于接到的打工者咨询和投诉电话激增而颇为烦恼。除了「自愿离职、重签合同」之外，老板们的主要招式有：

- 当前合同到期时，自动解除，另外招聘。
- 减少正式员工，大量使用劳务派遣、租赁员工(后文详述)。
- 用逼迫、给员工「穿小鞋」、更换员工岗位并降薪等办法进行变相裁员。
- 用极具中国特色的惩罚「不让加班」，迫使收入急剧减少的工人自动离职。
- 直接降低工人的工资标准，弥补「损失」。
- 把全日制职工变为「小时工」，以逃避社保福利。

²⁰ 「我不停地飞，不停地飞，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一位要求匿名的劳动法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你看，只要做劳动法的，现在哪个专家哪个律师不是这样忙？」（《劳动合同法：越来越大的冲击波》，见《南方周末》2007.11.29，作者：肖华邓瑾）

- 单方面认定员工的劳动关系由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
- 在合同中列举「员工违约责任」，方便找碴解雇，雇主责任则付诸阙如。
- 强迫员工闭着眼睛签合同，不让了解合同中的具体内容。
- 少报漏报用工人数。
- 将「辅助型、非技术型」工作或部份生产外包。
- 保留少量业务，遣散工人，同时在异地开厂。
- 搬迁；停产倒闭，注销原企业，换个名字重新注册…

紧接着的，或许是有关部门和记者专家律师们估计的「劳资矛盾高发期」。

如果说这样一个几乎不涉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法律，尚且受到老板们如此剧烈的抵制，那么真要大刀阔斧动真格的话，结局会如何？是否劳动者除了「用脚投票」的自由之外，就只有任人宰割的自由？

仍然相信「中央政策是好的」并期待上层改良的劳动者，应当由此看到：问题的核心在于老板和工人赤裸裸相互敌对、不可调和的利益斗争；不论国企、外企、民企，一旦利益受到触犯，对受雇劳动者绝不客气；工人阶级只有自己组织起来斗争，才能改变境遇，捍卫自身利益。

劳务派遣和用工灵活性（劳动弹性化）

老板们纷纷赶在 2007 年底以劳动派遣工代替正式工，有的企业甚至让劳务公司公开竞标。劳务公司意外地加速红火起来：「在新法实施前夜，劳务派遣公司非但没有败象，反而异常火爆，不仅数量激增，连海外资金也都跃跃欲试。」²¹

传统的雇佣形式是直接雇佣、全职工作，员工还可能享有企业发放的福利待遇。劳务派遣则是「非正式雇佣」。「用人单位」有权支配劳动力，却无须订立劳动关系，免除了相应的福利保险，付的工资也少得多。这对老板分化工人、剥夺工人权利很有利。因为在正式工眼里，派遣工是外来「抢饭碗」的；派遣工则自感低人一等：「我干的活不比你少，工资却不到一半」！——劳动者彼此敌视和竞争，老板则满脸微笑，坐收渔翁之利。

谈劳务派遣（又称劳动派遣），要同时讲讲「劳动弹性化」。

劳动弹性化是 1970 年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老板及其国家为了进一步压榨工人、恢复利润而采取的政策，目的是「灵活用工」。比如：通过修改法令，便于老板随时雇工和炒人（雇工弹性化）；让雇主能任意支配员工的劳动时间，

²¹ 《众多企业以劳务派遣方式集体规避新劳动法》，南方周末 2007.12.13，记者：曹海东

使之配合企业需要，且不必额外支付加班费（工时弹性化）；把工作地点从办公室、工厂转移到家庭，按件计酬（工作地点弹性化）。

劳务派遣就是非常弹性化的雇佣模式，因而风行全球。日本早在 1985 年就制订了派遣法，后来加以修订，允许多数工作使用劳务派遣，并延长派遣工作年数。因此，派遣工从 1994 年的 58 万急增至 2004 年的 1555 万人（占全部雇工的 31.5%），其平均工资比一般工人低一半，没有福利和保险²²。不仅蓝领产业工人，连白领和技术人员也越来越多加入了派遣劳动队伍。这给自主工会带来很大困难。保守工会或工会官僚不愿组织派遣工人，则进一步削弱了工会力量。

这种「有劳动没关系，有关系没劳动」的情形往往使工人受侵害时难以「维权」。用人单位和劳务公司很容易相互扯皮，推托责任。

在资本主义复辟进程中，中国的官商总能够把最坏的东西学到最足。劳动派遣就是一例。²³从 1990 年代后，中国的劳务派遣就开始流行：「数据显示，全国公有制企业、事业、机关

²² 以上资料多数援引自台湾劳工团体制作的小册子《劳动派遣害人不浅》（2005.11）。

²³ 职业介绍所和劳务公司的区别是：前者负责联系工作并一次性收取费用；后者与派遣员工有劳务关系，公司每月收取管理费，或按工人的工资收入提成。在中国，前者要行政许可才能开办，后者照一般的公司注册。

单位使用的劳务派遣工约有 2500 万人²⁴，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甚至 1/3-2/3 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而中央电视台在今年夏天的『大清退』前，曾是中国最大的实行劳务派遣制度的事业单位，其派遣员工至少 5000 人，是有正式编制员工的两倍多。」²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劳务派遣公司 26158 家，其中由劳动部门经办或审批的为 18010 家，接近 70%。

各地劳动部门借助自己跟企业关系的便利为自己搞「创收」，或为跟自己有关系的劳务公司牵线搭桥，从中牟利。劳务工比正式工更缺乏培训和保护，据报导，在因工死亡事故中，劳务工占 80%左右²⁶。不难想象，出了这类事情，劳动部门会维护谁的权益。

不止于此。国企和民企的老板们还发明出多种派遣方式。张

²⁴另据中国网《劳动合同法实施在即 「劳务派遣」迎来第二春》（2007.11.23）：「目前全国有 3000 万劳动者的用工形式是劳务派遣」。两者相减，意味着「全国公有制企业、事业、机关单位」之外私企、外企等使用的劳务工约 500 万。数字可能不确。新华网 2007 年 6 月 29 日《劳动合同法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形式 防止用人单位滥用》称：「一项调查显示，江苏无锡市的外企员工占全市企业职工总数的 15.9%，但使用的劳务派遣工却占了全市劳务派遣工总数的 17.7%。有的外企使用的劳务派遣工人数已大大超过企业职工人数。此外，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职工劳动合同到期后被转为劳务派遣工的现象。」可见仅外企使用劳务工的比例就相当大。

²⁵《众多企业以劳务派遣方式集体规避新劳动法》，南方周末 2007.12.13，记者：曹海东

²⁶《〈劳动合同法〉杜绝劳动关系「空心化合同」》，劳动报 2007 年 12 月 5 日

五常说：「因为新劳动法，好些员工众多的机构自设劳务公司，右手与左手交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应对，虽然内有机关，但交易费用还是增加了。」²⁷其实「左右手交易」之类恶毒的剥削方式，早就被精明的老板和经理们付诸实践。除了「自设劳务公司」之外，有的还成立空壳子公司来「寄存员工的劳动关系」。虽然某些专家、律师、官员虚张声势地宣称新法对劳务派遣的限定非常严格，或主张清除资质差、无实力的小机构和小中介，规范劳动派遣市场。但剥削者的经验是丰富的，消息是灵通的，他们的利益永远要占上风——「注册资本不得少于 50 万元」（第 57 条），行，注册完再抽走很难吗？你要「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第 63 条），我把所有工种的工人都变成拿低薪的劳务工，不就同工同酬了么？你要劳务公司给工人订立 2 年以上劳动合同（第 58 条），我出了事关掉再重开一家劳务公司，能拿我怎么办？你要用人单位跟劳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我把业务连工人都「外包」出去，不就与我无关了么？…必要时，还可以破财打点有关部门。至于钻不了空子的部份，大家都不执行，不就「法不责众」了么？

新法的颁布，仅仅是加快了老板们把正式工转为劳务工的步伐。国企在实行时，通常挂上「改制」招牌，改制方式包括尽可能地逼迫工人下岗，再以低薪的临时工、劳务工形式返聘一部份回来。企业、事业单位和银行都是如此。那些整天

²⁷ 张五常《灾难的先兆——三论新劳动法》（2008.1.15）

攻击「垄断企业员工待遇过高」的民间资产阶级的走狗们，总是对此避而不谈。自由派攻击「垄断企业」的潜台词无非是：至少应该让出一部份市场、利润给他们的主子。他们指责「体制内」劳动者待遇太高，而不是努力改善「体制外」工人的待遇处境，他们的目标只是让劳动者「公平地比贱」。

产业结构升级——谁的出路？

近几年，官方和学者都热衷于谈论「产业结构升级」。与此相应的，是「自主产业、自主技术、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做大做强」、「中国要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之类的口号。不少人就辩称《劳动合同法》可以淘汰落后企业，有助产业升级——它可能不利于某些企业，特别是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企业，但对资产阶级整体的发展有利。

新自由主义的论调是：老板赚钱了，企业发达了，蛋糕做大了，劳动者分到的也就多了。「自主产业」论则日益盛行于「左派」当中，并与爱国主义喧嚣彼此呼应。他们指责新自由主义走资道路导致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只能沦为给跨国公司打工的、低利润的血汗工厂，是误国误民之路（官方呢，就圆滑一些，一边肯定自己二十多年来的走资功绩，经济高速增长等等，一边确认目前「中国已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需要「突破瓶颈」）。看起来这似乎是比较新自由主义八股要高明、眼光更长远的见解。在多数「左派」的论述中，工农利益和「民族产业」的利益由此在反帝、反全球化的激

进姿态中完美接轨：「国家富强了，民族工业壮大，人民就跟着沾光了。所以我们要一致对外」。这跟新自由主义的立足点到底有多大不同？还不一样是「企业赚少了，工人就跟着倒霉」？要说左派或自主派爱国，那么张五常之流的右派不也忧国忧民，「对中国的前途很有点戚戚然」²⁸，甚至恬不知耻地声称「有生以来，我永远站在劳苦大众那一边」²⁹！然后转身为不守劳动法的老板们开脱去了。

总之，劳动者的利益，工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企业和老板们的利益。

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困难重重，不仅需要技术水平大跃进，需要技术人才，需要时间，而且在打破现有国际分工格局时，必然加剧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和冲突。但这里只限于谈谈：它是工人阶级的前途或福音吗？

「产业结构升级」的如意算盘，包括从低利润行业向「附加值较高」的行业转移。理论上，这能让老板们有较多空间应付工人提高工资待遇的压力。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两个问题：一、大量资本投入到「高附加值」产业，将迫使该产业利润率降低；二、「高附加值」行业通常是资金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意味着使用更少的工人——用马克思的话说：

²⁸ 张五常《新劳动法的启示》（2008.1.22）

²⁹ 张五常《新劳动法的困扰》，2008年2月

就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从而加剧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并导致利润下降。资本家是不会通过减少工时来增加就业的。某些经济学家为中国大力引进重化工业辩护时，就不假思索念叨着自由派经文：「可以增加就业…」但其实，重化工业正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很有限。

是否「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工厂」利润率一定很低？是否应当努力使民族企业跻身于跨国公司之列，才能让工人分到较多蛋糕？如果是，我们又该怎么看待「血汗工厂」榜上有名、位居产业链末端、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又名列世界五百强的富士康？

至于高端产业，眼前就是大家熟悉的标兵：华为集团——中国名列前茅的民企，所谓自主创新的高科技龙头企业、民族产业的典范，其市场不仅覆盖国内，而且行销世界 100 多个国家（2007 年合同销售额 160 亿美元中，72% 来自国际市场），在海外海外设立了 20 个地区部和 100 多个分支机构、12 个研究所、28 个区域培训中心³⁰，正在「像狼一样」跟跨国公司合作与厮杀。

新法颁布后，首先震动社会的就是「华为辞职门事件」：7000 名员工「自愿辞职」，重新竞聘上岗。中外老板纷纷效尤。因

³⁰ 见华为门户网站（<http://www.huawei.com/cn/>）之「经营业绩」与「全球运营」介绍。

为舆情汹涌，官方被迫介入调查。全国总工会的结论是：「华为裁员有其特殊性」³¹。有网友回应道：「华为裁员有其特殊性，SONY 裁员有其特殊性，松下裁员有其特殊性，夏普裁员有其特殊性，健伍裁员有其特殊性，三菱重工裁员有其特殊性…」

不错，华为的研发人员似乎薪酬不菲。但代价是大量超时加班，且不按劳动法计算加班费。华为老总任正非拿自己当劳模，对员工说：「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2006 年 5 月，华为员工胡新宇过劳死，引发媒体舆论对华为「床垫文化」的激辩。2007 年 7 月、8 月分别有两名华为员工因为受不了工作压力而自杀。据统计，华为创始至今，造就了 36 名这样的牺牲品，都是「青年才俊」。

研发人员占华为集团员工的大部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大量使用从职介中心租赁的生产操作人员，即劳务派遣，此外还向「合作公司」租赁工资低得多的外派人员：

「深圳一些著名企业，如深圳华为、赛格三星、赛格日立、希捷等，都租赁过员工。…深圳鹏劳职介中心主任姜鑫介绍说，像深圳华为这样的外向型企业，订单多时，生产操作人员需要上千人，少时只需 200 人，所以他们很欢迎租赁员工

³¹ 《全国总工会表态「华为辞职门」有其特殊性》，人民网 2007.12.6

业务。」³²

可见，即使是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也需要大量的生产操作人员。华为不仅为了技术上的竞争牺牲研发人员，也通过租赁员工的方式来压低生产成本，也就是牺牲一般工人的利益。假设政府通过法令迫使这些企业提高普通工人（包括派遣工人、租赁员工）的待遇，他们还可以学习欧美的跨国公司，把生产外包，让制造商去承担低利润以及执行压榨工人的任务。

媒体或律师或全总都没讲清楚：为什么「守法的企业家们」要这样搞搞震，多此一举？如果说为了「工龄归零」，华为的做法岂不等于提早依法支付补偿金？看起来老板们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利益（换言之，受雇者也不会因为新法得到多大利益），最多不过在「竞聘上岗」的过程中趁机炒掉一些「不听话」的、或者长远来说会「拖累公司发展」的员工。结论是：现在解雇，将来可以多一次跟员工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机会，从而推迟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老板们要的就是：灵活用工——更自由地雇人、炒人。

华为以「狼文化」、「床垫文化」闻名，但没有少吹「以人为本」的牛皮。自作多情的人们应当静下心，睁大眼，洗耳恭

³² 《鹏城就业新模式：人才租赁》，《鹏城》杂志 2005 年 3 月号（总第 49 期）

听华为总监为劝导员工「自愿离职」时所做的阶级教育：「公司不是我们的家，大家要有打工意识。不要总谈感情…」³³。

小结

《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缓和社会矛盾，结果却激化了社会矛盾，深刻暴露出中国社会的阶级冲突根本不可调和。加之政府从 80 年代就开始鼓励或放任国营企事业单位搞「创收」，也就是从「以服务为目的」转变为「以赢利为目的」，到今天，社会服务已全面商品化：教育、医疗、邮政、水电、交通…统统操纵在官僚资本、民间资本或外资手中。人民的生活费用不断上升，无时无刻不受制于金钱，从而受制于资本家的盈利动机。物价的轮番上涨，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阴影，都迫使形势日益恶化。如果说走资进程不仅锻造出一大批暴发户，而且曾经给部份小资、小店主和知识份子带来上升希望的话，那么到了生产过剩兼资本过剩的今天，所谓「创业」之路早就窄如羊肠。竞争的加剧将迫使更多小资本破产。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建立在极度压榨工农的基础上，在商机萎缩、利润率降低乃至随时面临经济危机的今天，资本家向劳动者妥协的空间只会更小。新法实施前老板们对受雇者发起的攻势表明，任何改善劳工待遇的措施，必然遭到中外资本家的反击。从客观环境和社会发展趋势看，阶级矛盾

³³ 《华为员工讲述离职经历：公司不是我们的家》，广州日报 2007 年 11 月 5 日。

只会不断积累，并以爆炸性的方式释放出来。

批判和抛弃改良主义，不等于束手待毙，相反，应当鼓励工人阶级自己动手，运用各种手段改善自身的处境，包括运用法律武器。尤其在缺乏抗争经验的当前，改良的日常斗争对工人是非常必要的锻炼，尽管成果有限，失败也必不可免。

工人的自发抗争事件在日益增多（官商也大大增加了应付和镇压的经验），这是剥削和压迫不断加深的结果，也是工人意识成长的征兆。当前的任务，就是帮助工人认清现实，思索前途，提出自己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本身是这些要求得以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工人阶级需要一般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作为开展争取自身利益的运动的条件。这里简单谈谈：

运用法律武器——工人应当运用自己的力量和行动来迫使政府执法，甚至影响和参与立法。此外，正如深圳打工者中心负责人黄庆南被袭事件一样，工人及其服务者应当有这样的准备：不管你运用法律或别的武器，只要触犯到老板的利益，就可能遭到攻击。因此，在合法斗争中，自卫也必须提上日程。

公民权——来自农村的工人不仅遭受老板的剥削，而且受到户口制度、暂住证制度的盘剥，并因此受到治安联防人员等

基层暴力组织的敲诈和迫害。在东莞，联防人员的劣迹甚至引发了几次成千上万外来人员的大暴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起着像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一样的分化人民的作用。取消暂住证——作为公民权的一部份——对外来工极为重要。但也应当意识到：仅仅取消户口制度和暂住证，并不能直接改善工人待遇，即便农村人口都拥有了城市居留权，也不等于能够找到好工作，或者老板肯给他们提工资。而普通工人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使他们在城市定居。

罢工权——工人集体抗争的最基本而有力的武器，就是罢工，应当灵活地运用这个武器。出于害怕危及「和谐社会」，罢工权被摒除在法律之外。但工人仍然行使着事实上的罢工权利。地方政府和老板可能会大力镇压，但多数时候为免自己的恶行传播到社会上，会采取息事宁人、封锁消息、「枪打出头鸟」的处理办法。当前的罢工，都是经济斗争，并且多数是由于老板加剧对工人的剥削所致，因此还属于防卫性斗争。

工人组织——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只有官方工会，而农民工又是不成熟的工人阶级，并受制于客观环境，因此很少工人拥有建立自主工会的意识。像深圳友利电工人、烟台澳利威工人通过罢工争取建立工会，还是特例。应当在工人中间提倡「工人的自我组织」，至于「工会」、「独立工会」、「自主工会」的名称本身尚不重要。

目前官方工会正努力掌握「维权」的主动权，以及扩大在国

际工会中的影响，但建立新型黄色工会还处在摸索阶段，有待观察。

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受制于一般的民主自由权利，这又需要靠工人本身的斗争来争取。但是，就像公民权不会自动改善工人的待遇一样，这些民主自由权利也要作为工人运动进一步展开的必要条件来看待。

谁能改变劳动者的境遇？只有靠觉醒的劳动者自己。而单个劳动者在这个权力和金钱通吃的社会上，只会越来越弱小——只有靠集体奋斗，才能开辟前途。

2008年2月

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算算账

陈东

2008 年的北京奥运半年之后就会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下进行。但是一众高官们的世界和梦想是否同平头百姓的世界和梦想一致呢？这是值得探讨的。在北京奥组委的网站上，有文章介绍它们的「五个坚持」的办奥运方针，其中一个即是「坚持节俭办奥运」。节俭？到今天为止，北京奥运为了建造超豪华的场馆，已经花了 38 亿美元，是史上最贵的奥运！而八年前的澳洲悉尼奥运才花了 15 亿美元，是人家的两倍以上。怪不得北京奥运开幕典礼的最高票价要一万元。虽说一些较为普通的比赛的票价是一百元，官方还说这是普通消费者可以负担的价钱。然而这对于月薪只有一千元上下的一亿五千万民工来说，他们还是花不起这个钱的。当然，也不能说官方讲得不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民工，或更准确地说，农民工，本来只被视为纯粹的进城打工机器，并不期望他们的工资会用来支撑城市消费。四千万下岗的国企工人也是这样。所有这些人，他们的世界是赤贫世界，他们的梦想不是去买票进场看奥运、感受奥运的「团结、友谊、进步、和谐」，而是有一份稳定工作，自食其力。

国内需求不足，资本大批外移

今年奥运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卅年。即使是官方传媒，到今天也不得不扭扭捏捏地承认，高速的经济增长牺牲了劳动者和环境。但是到今天他们同样死不承认他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走资本主义，而且是一种高度野蛮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1990年代以来，在官方遮遮掩掩之下，中国经历了三波没有正式宣布的私有化浪潮。首先是把国企（主要是中小型国企）卖光，或者把大型国企改造成股份公司。这波私有化也通过欺骗工人入股和所谓住房改革，把工人的毕生积蓄也顺道私有化了。第二波私有化的对象是城市土地，包括国企的土地。第三波私有化的对象就轮到农民的承包地了。为商业目的而强迫征地一直都有，但是近年和以前不同的是，官商的胃口越来越大，导致农民的反抗也趋于激烈。十年来，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民已达四千万人，预计十一五计划期间每年再增加300万¹。官方也承认，农民从征地受益中仅得5-10%，其余都落在官商口袋²。就这样，工人被掠夺了，农民被掠夺了，而官吏和资本家却发了大财了。只要看看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就可知一二。在下表中，这个比例在1980年的时候才占17%，已经够低，可是，这个比例随着资本主义市场

¹ 新华网，<http://big5.xinhuanet.com>，2006年7月24日。

² 地方政府占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开发商占40-50%，详见南京市国土资源局网站，

<http://www.njgt.gov.cn/erfenju/zhuantibaodao/8805401.htm>。

化改革的全面开展，而不断再下降，到 2004 年只有不到 11%。世界银行在 2007 年 2 月的中国经济季刊中也提到这点。³对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密集产业仍然占主导的国家来说，显得特别不正常。另一个衡量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近年已经达到或者超过 0.5，表示中国从卅年前的低度的贫富悬殊变成现在的很高。钱跑到哪里呢？当然是官商的钱包。事实上同期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⁴。这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梦想。十年前有一首顺口溜最能体现这一点：

一等人，掌实权，批条画圈就来钱；
二等人，是官倒，倒了批文倒指标；
三等人，有后台，弄点名堂就发财；
四等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五等人，交警队，马路旁边吃社会；
六等人，管车船，马达一响就要钱；
七等人，当导游，年年月月吃回扣；

³ <http://www.worldbank.org.cn> 该报告指出，工资占 GDP 比例从 1998 年的 53% 下降到 2005 年的 41.4%，而同期美国高达 57%。这些数字同正文所引的不同，因为世界银行报告所谓「工资占 GDP 比例」，应理解为「工资占 GDP 的增加值的比例」，也是通行的方法。但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只追溯到 1998 年，没有涵盖整个改革开放期。本文为了探讨整个改革开放期的工资占经济比例长期下降的问题，而中国有关 GDP 的增加值中利润与工资的比例的直接统计数据并不完整，所以只好在下表中直接用工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长期下降趋势。

⁴ 2007 年企业蓝皮书指出 1990-2005 年企业利润占 GDP 比例从 21.9% 增加到 29.6%。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7-11-23。

八等人，干个体，宰了老张宰老李；
九等人，当电霸，不给好处就抽闸；
十等人，手术刀，拉开肚皮要红包；

按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工农是那么贫穷，以致私人消费无力，国内市场狭窄（单靠有钱人的消费不足以支撑全国消费）。上述的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国内消费长期下降，可以从工资占经济比例长期下降找到解释。另一方面，累积了巨额财富的官商，除了自己的奢侈消费之外，都把钱花在积累资本上面，所以中国的私人消费占国民收入不断下降，而资本形成率却不断上升，近几年都超过 40%。这个数字要比美国的不足 20% 高一倍多，也冠绝所有主要亚洲国家⁵。积累与消费的不平衡造成了长期的制造业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亦即生产过剩。中国工农买不起，就让老外来买罢。这就是中国二十年来拼命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外贸依赖度近年已经达到 70%，对于一个超级人口大国而言是很不正常的。不止如此。有钱阶级的钱越多，胃口越大，越不能满足于国内市场，这样，光是出口货物已经不够解决资金过剩的问题，更需要出口过剩资本。这就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局部原因了。过去几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都以倍数增长，天文数字的中国资金，通过合法和

⁵ *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y*, He and Kuijs,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Paper No.7

非法的途径跑到境外横冲直撞。1996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还是债务国，净欠1230亿美元外债，等于国内生产总值15%；到了2004年，中国就变成净债权国，在国外有净资产1316亿美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8%。而同期印度始终是净债务国，外债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9%⁶。中国大量对外投资首先冲到香港；香港的股市和房地产没有了大陆资金的支撑，就要大大下跌。澳门也一样。当中国农村由于缺乏资本投入而陷于破产，当中国西北和西南部也有同样问题的时候，中国官商却拼命输出资本。

经济发展到了瓶颈

对于官商而言，这种以压制工农为代价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是过剩资本的出路，也是他们把贪污所得合法地换成国外银行存款和物业的方便之门。但是这种模式的代价，除了人民日益处于水深火热之外，就是一场巨大的经济、社会 and 环境的危机正在酝酿。首先，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由于各种初级产品的供应不足而越来越无法支持；从石油，铜铁一直到许多农产品，现在都日益依靠进口，而进口价格都在飞涨。农业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民以食为天。由于政府的长期忽视，导致农业投资低得惊人，七亿农民只分得2-3%的全国投资。这是农业生产落后，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

⁶ *The External Wealth of china: An Investig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Sheet Perspective*, by Andrew Sheng and Allen Ng, Jan 2008.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Monetar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P.4.

村官和乡官的剥削下的农业小生产，越来越无法支持高速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粮食就是这样。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近年跌破 95% 的警戒线，只剩 91%，其余仰赖进口。以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日益加深依赖进口粮食，对中国、对外国都不是好事，因为中国一年的谷物消费量已经是国际市场一年交易量的两倍。⁷ 中国粮食进口日益增加，难免会造成通胀和国内外粮价的大幅波动。事实上这个情况已经开始。还有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在面临短缺，那就是劳动力。越来越多专家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很快会结束。官方统计一直说农村还有 1.5-2 亿剩余劳动力，但是去年 9 月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季报引述几位专家，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只有 4 千万。劳工短缺是近年名义工资提高较多的主要原因之一⁸。这种状况也增加劳工的维权信心。政府知道危机四伏，然而，在自己的短期利益的诱惑下，官吏们还是笔直地沿着旧路（出口导向、放任官商掠夺式经营）走向危机。世界经济都在冷却，只有中国热火朝天，股市与房地产正在酝酿巨大的泡沫。中央感到危机，不断想冷却经济，但是都没有效果，以致被讥为「政不出中南海」。政府能够控制人民的方方面面，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它越来越控制不了的，那就是它自己。它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官吏的贪污腐败，更无法控制住他们现在要拼命逃资的冲动。过去一段时间，党内部份高官和一些金融龙头大哥一直要中央开放资本管制，去年更企图

⁷ [粮食价工资飙，令通胀持续]，明报，2008 年 1 月 14 日。

⁸ 中国经济季报，2007 年 9 月，17 页，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用既成事实来不断逼迫中南海开放「资金自由行」，让他们可以合法把资产转移到境外，首先是香港。其实，现在的资本管制早已大大松懈了，地下银行天天把数以亿计的钱在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之间非法汇来汇去，投机倒把。如果中南海最终开放「资金自由行」，那么，中国的金融危机要么不爆发，一爆发就会难以控制。而在严重经济危机下，要镇压工农的反抗就不会那么容易了。这也是官方最为恐惧的。现在，在珠江三角洲，民工的罢工无日无之。农民为反征地而「打扁担」也越趋激烈。如果再发生经济危机，而官商企图把危机转嫁给工农，这时候他们更不可能逆来顺受。

新政，何新之有？

中南海是感受到危机的，特别是来自劳工的反抗，所以他们近年来对于过去过份掠夺工农的政策多少有点调整。去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就表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在劳工政策上，当局推行的劳动合同法和提高最低工资，都被认为是维护劳工的措施。在农村政策上，陆续推行的改良有：废除农业税，实行农村义务教育（在纸上作出承诺之后几十年），还有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即国家增加对农村的投资。不过，所有这些措施都只是对原有的发展模式的小修小补，而非根本改革。其次，这些经济改善对于工农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中国的最低工资根本太低。国外的最低工资至少是平均工资的四到六成。美

国是五成，法国是六成。可是，中国的最低工资一般只有平均工资的二成多。⁹所以，即使近年来提高了最低工资，最多只是追上物价（其实仍然追不上），对工人来说谈不上是什么显着改善。就农村投资来说，从以前的二千多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397亿和2007年的3917亿元，当然是较大的增幅，不过平均到农民，其实每人不到600元，占全国投资只有几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究竟中央的政策能否在基层政府得到落实？工农自己心中有数。农民早就有句话：财政支农两千亿，农民受益毛毛雨。由于没有民主监督，农村投资往往不是被贪污，就是被挪用作形象工程。民工呢，也都知道保护劳动的法律再好再多也无用，因为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执行的兴趣。他们只有在法律是限制劳动者的公民权的时候，才有执行的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每当工人再也无法忍受资本家的非法剥削而被迫罢工、游行的时候，政府都迅速派出防暴警察去镇压工人。工农在财富分配中居于绝对劣势，不多不少，要从他们连反抗最残酷的剥削的权利都被剥夺中去找解释。

中央难道不知道这个事实吗？它当然知道。而且是它把压制工农的政治自由始终当成主要国策。人民的公民权，例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等，只是纸上的权利。工人的

⁹ 据南华早报所载（2003年12月8日），1993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四成，但是由于常年没有随物价调整，到了1999年下降到只有23.8%。近年最低工资虽有提高，但它仍然只相当于平均工资的二成多。

罢工权利从 1982 年的宪法中删除之后，连纸上的权利也没有了。工农由于被根本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等于被剥夺了自卫的权利，任由官商鱼肉。即使到了他们忍无可忍而自发反抗的时候，国家机器的铁靴就会重重踏过来。除了硬的铁靴，还有软的制度性歧视。中央在 1958 年通过新户口制来剥夺农民的迁徙自由和平等公民权，到今天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如果中央真的关心工人，关心农民，就请首先恢复他们的平等公民权罢。

个别「新左派」——其实是民族主义者——大力为中南海的「新政」喝彩。但是这个「新政」的局限其实一眼可以看穿。「新政」最多也只是经济利益上的微小改善（落实时还要大打折扣）。工农最迫切需要的政治权利，它始终没有恢复。这种政策叫做什么呢？就叫做胡萝卜加大棒啊。奴隶主可以忽发善心，多给奴隶几片面包，但决不会恢复奴隶的自由。奴隶自由了，奴隶主喝西北风啊？那些为「新政」喝彩的人，其实是因为自己奴性未除，以为人民多吃一片面包，就是德政了，就该山呼万岁了。这些人还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呢。不过，你也不能说他们错，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社会主义，那就是父权社会主义，或叫做包办的社会主义。按照这种社会主义，政府官吏可以为人民服务，但是绝对不能容许人民动手为自己服务。人民只能够乖乖坐着，不要乱说乱动，继续「相信党，相信政府」，静候领导来服务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还是一样，懂吗！

如果领导一时忙于为自己服务，没有为人民服务，你们，人民，闭嘴！坐好！所以这一类社会主义者，可以批评统治者没能多发几片面包给劳动人民，但是很少批评统治者剥夺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政治权利，更少直接主张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运动去拿回自己的权利。那不是简单因为身处国内有口难言，因为这一类社会主义者即使身在国外也犯着同样毛病。

大棒政策下的维权运动

虽然对官吏来说，什么主义，什么时代都一样——一样由他们当权——，但是工农的看法毕竟同从前不一样了。他们相信党相信了几十年，到最后却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自己被剥夺到一无所有，这时还能相信下去吗？然后再到委曲求全才能够找到被老板残酷剥削的机会，再到流尽汗水却被骗工资，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就爆发怒火。他们的确慢慢从消极中苏醒过来。在出口加工区，罢工简直不再是新闻。「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就是工人自己从实际斗争所总结出来的教训。

但是，只要他们无法组织，自发的罢工再多也不会威胁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体制。所以在南方，政府官员现在也不像从前那样恐惧自发的罢工了。没有持久的组织，所有自发罢工都是旋起旋灭。对，只要工人无法组织，官商就不用害怕。可恨的是，总有那么一批狗抓耗子、多管闲事的维权份子，要促进工人搞什么维权组织。所以，对它们必须用上大棒打压。

所以，近年政府对于劳工的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只有升高没有降低。过去两年，广东省已经关掉了好几间劳工服务中心。此外，还有：

1. 中山大学的〔民间〕杂志（同情工人的刊物）被勒令停刊；
2. 北京的〔中国发展简报〕本已非常温和，但是去年中被勒令停刊；
3. 百姓杂志网站和中国诗歌网站被关；
4. 被称为新左派的读书杂志的主编汪晖被撤职。

这个黑暗社会似乎还嫌这一串名单缺少色彩，所以去年底就为一个由香港团体支持的深圳劳工服务中心添加腥风血雨。中心的登记人被来历不明的凶徒斩伤腿。当地警察虽然在场但没有制止。中心职员估计是因为他们积极向工人宣传劳动合同法，教导工人不要被资本家欺骗，而遭到报复。事后他们呼吁当地警察部门公开谴责暴力行为，但是后者毫无反应。

如果政府真的要做到权为民所用，那么就请它恢复工农的起码的公民权和一切政治自由，铲除一切侵害人权的恶法和恶势力，确保工农可以有自卫的公民权力。只恐怕它没有这个打算。但是，没有又怎么样？政府禁止工人罢工，但工人还是罢工罢得起劲。毕竟，卅年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已经走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酝酿着全面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危机的阶段。工农正在觉醒。他们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政府的梦想不是他们的梦想。他们早晚会

明白得靠自己的集体奋斗，自己的运动，在社会平面同资产阶级自由较量，才能扭转目前财富分配完全偏向资产阶级的局面，才能获得一个劳动者不受剥削的世界。工农的经济要求将会和政治自由的要求并驾齐驱。工农要发展巨大社会运动，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它需要时间。但是它在地下的种子已经发芽，早晚要固执地破土而出。套句老话，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08年1月28日

资产阶级统治权的轮回

——谈谈台湾总统大选对劳动者的意义

袁重山

这次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出选总统而大胜民进党，反映了大部份民众，包括一些浅绿群众，对于陈水扁的贪腐的不满，对他那种光搞族群恶斗、罔顾民生的政策的强烈反弹。这种强烈程度，可以从大部份民众连续三次（县市选举、立法院选举以及今次总统选举）投票给国民党、不顾民进党拼命舞动的「避免台湾重回一党独大」纸糊恶魔，而看得出来。民众未必都对执政的国民党的「清廉」有信心，部份人投马更只是一种「抗议票」，但是大部份选民也估计国民党不可能再回戒严时期，所以还是愿意给马英九试试，多少希望他能够摆脱族群恶斗，集中改善民生。如果马英九做得不好，最多到时再撤换他。

不过，如果以为国民党的马英九真的能为劳动群众带来显着的民生改善，带来廉洁的社会，那么，除非发生意想不到的外界因素，或者发生奇迹，否则劳动群众最后多份还是失望收场的。

但是，在发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谈谈有关台湾主体性的

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同上述问题关系密切。

台湾主体性的胜利？

国民党失去政权八年，使它被迫向所谓「台湾主体性」靠拢，不得不像民进党一样，言必「爱台湾」、「台湾主体性」。事实证明，虽然民进党能够在这次大选保住其基本盘（四成选票），但是国民党这次破除外来政权的形象的努力，至少得到大部份台湾民众的支持。马英九在竞选时，无时无刻都在强调自己是台湾人，他学客语、学台语，消除大家对他「不爱台湾」的疑虑。他的当选，也正表明台湾有六成的选民多少认同他会守卫台湾的利益，或至少不比民进党少爱台湾。国民党顶着「外来政权」的原罪，在付过「爱台湾」的赎罪券之后，已经明显减轻了。只要他执政以后继续「爱」下去，那么总有一天他能够消除这个原罪。这样，不管两党怎么敌对，不管国民党仍然叫中国国民党，事实是大家都对台湾主体意识顶礼膜拜。民进党选输了，但是台湾主体意识胜利了。所以连谢营也不得不承认，未来民进党再也不能垄断台湾或本土的论述了。其实这不能说明国民党的高明，只能说明民进党所曾经垄断过的台湾主体性论述，由于只是他们升官发财的踏脚石、幌子，几乎不具有实际的社会改造的内容，所以变成非常庸俗和形式化的口号，是非常廉价，非常易学的掩眼法，以至…以黑金政治、顽固保守出名的国民党都轻易学上手！爱台湾，谁个不爱啊？只有法理台独才是国民党不敢学

的，但是你民进党也不过是口头激进而已，够胆来真的吗？
如果不敢，那么你们的台湾论述还有什么你的敌人不能够抄袭的呢？

台湾人民需要伸张自己的主权，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这个意义上的台湾人共同体和台湾主体意识是完全正义的。但是民进党往往把这个合理内容焊接到粗暴的民族主义和投机主义，再把它变成政治图腾，自己变成祭师，号令全部台湾人在自己面前跪拜磕头。这种意义上的台湾主体意识却是倒退反动的。本来，新国家的建设，关键根本不在国号，而在于实际的社会和经济内容。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说，只有当建设新国家是同时意味对取消剥削阶级的剥削自由或至少大大限制，意味劳动人民真正翻身作主（这才是民主一词的原意），这样的新国家才值得为之奋斗。美国 1860 年的内战，虽然表面上不是建设新国家，实际上却是一场把美国南部奴隶制消灭，令美国社会重生的革命，所以它能够吸引黑人和无数进步白人参军或者支持；1917 的俄国革命建设了苏维埃政府，它能够得到兵士、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是因为新政府退出帝国主义大战，把土地交给农民，工厂交给工人。这样的新国家才具有内容。¹也只有这种社会改造纲领，国民党无论如何不肯学，学不了。可是民进党由于自己也不

¹ 苏联后来的堕落是斯大林篡夺了政权之后才发生的，所以它的堕落，并非一如现在的流行意见那样所认为的、是因为革命的必然和自动的后果。

过是资产阶级党，或准确一点说是资产阶级两翼中比较本土化的一翼的党，当然同样不会真正有兴趣去建设这样的国家，所以它才需要把「新国家」的论述完全抽空其社会经济内容，变成空谈，再将之嫁接到狭隘民族主义，目的只有一个：当权发财。它这个牌越打越过瘾，打到走向自己的反面，民怨沸腾了还懵然不知。可见它已经脱离群众到什么程度！

以前，一边主张法理台独，另一边主张统一，两党当然是针锋相对。八年之后，一切都清楚了。民进党执政八年都没有实践法理台独，说明它的法理台独立场只讲不做，所以它实际已经从法理台独立场后退为无限期维持事实独立（中华民国在台湾）。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国统纲领原本没有时间表，再加上马英九已经从竞选政纲中删除终极统一的立场（所谓不统，不独，不武），所以实际上也一样在维持现状。这样，两党只在遥远而抽象的国家名号的认同上有分别，而在实际维持现状的立场上没有分别。如果有分别，那是其它的分别，就是执政民进党有确确实实的八年贪腐政绩，而马英九还没有。所以许多人都希望「换人做做」，希望从此族群撕裂、蓝绿在国家名号上的恶斗，可以减少，让朝野集中「拼经济」。

两党在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实际立场上趋同，客观上会减少国家名号上的恶斗。这本身对于劳动人民是好事。我们当然要捍卫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民主自决权，但是根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空洞的国号而冒两岸战争的危险。在中期

之内，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法统毕竟利大于弊。当然这不代表两党在国家名号上已经没有分歧。在议会政治中，在资产阶级两党制下面，即使彼此没有认真分歧，也要制造出分歧，何况是台湾。所以民进党当然会继续借国号问题来做文章。但是，既然大家都「爱台湾」，但又不致于进行法理台独，那么这个族群牌就不再那么凑效了。「台湾主体性」确立之日，反而是「台湾共和国」的政治图腾大为贬值之时，所以，除非两岸形势丕变，否则只能用它做小文章，不能做大文章。

可以估计，马当选后，两岸的经济关系会较为密切，但政治关系就不然了。马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大概维持现在那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民进党的历史使它即使向中共抛抛媚眼也不会被骂卖台，但马英九的一言一行则被放在放大镜下观察，所以他反而更容易在两岸政治关系上采取强硬态度。例如投票前几天，爆发了中共暴力镇压西藏乙事，马英九连「不排除抵制北京奥运」都能说出口，态度比民进党更强硬。有人认为民众应该「策略性」投票支持马英九，理由是他上台代表两岸关系缓和，而民进党当选则意味两岸有战争危机。这种估计不符事实。实际情况是，不论哪个党当选都不敢正名制宪，所以不论哪个党当选都不会引发战争；也不论哪个党当选，都不会也不敢促统。至多是国民党当选的话，两岸经贸关系会较为发展，两岸政治关系的紧张较为舒缓而已。所以不存在「选谢长廷意味战争危机，选马英九意味和平」的

选择；因此在这次选举，马英九的国民党，不论是本质上还是「策略上」都没有特别比民进党进步的地方。我们当然应该理解而且同情大部份选民那种「阿扁太差，要惩罚民进党来表达不满！」的心理，但是不需要特别说成马英九比较进步。当然，反过来民进党更不是选择。总之，两岸关系是一个利益纠葛得非常复杂的问题，凡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党都不能真正按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妥善解决。马英九当选最多是把两岸对立情势稍为缓和而已。

谁若以为，从此台湾可以「集中精力拼经济，然后贫富都受惠」，那是注定要失望的。事实将证明，即使有了台湾主体性这个共同图腾，台湾还是继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即使上下都努力拼经济，台湾还是继续撕裂，不过不是沿着族群界线，而是沿着贫富界线撕裂；过去民众以为，民生凋敝是因为国家名号的恶斗掩盖了民生问题，但事实将证明，不论两党中哪个上台都一定继续劫贫济富！台湾劳动者最后多份又一次失望而回。

拼经济就能使劳动者受惠？

只要看看马英九的政纲就不难知道这些。他开出支票说什么要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但是他靠什么政策做到这点呢？总的来说就是刺激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是，台湾经济近年来除了个别年份，基本上都是正增长，可就是创造不出足够的正规就业机会！其实这根本不是台湾独有的

现象，而是所谓全球化时代下的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就是经济成长虽然仍然同老板的利润挂钩，但就越来越同就业成长脱钩。²亚洲发展银行在 2006 年 4 月发表一份名为「亚洲就业创造的挑战」的报告，指出亚洲大部份国家的经济成长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增长，1990 年代比 1980 年代大为下降（见下表）。台湾则是：1980 年代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成长可以带来 0.242 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但是到了 1990 年代就下降到 0.139，减幅达七成。³所以，实在看不到劳动者可以自动从经济发展中得益。

就业弹性系数

	1980s	1990s
孟加拉	0.550	0.495
中华人民共和国	0.330	0.129
印度尼西亚	0.435	0.379
印度	0.384	0.312
南韩	0.223	0.225
马来西亚	0.683	0.406
巴基斯坦	0.406	0.553
菲律宾	0.535	0.731
新加坡	0.375	0.711
泰国	0.315	0.193
台湾	0.242	0.139

原注：就业系数是国民生产总值每成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多少个百分点的就业成长

² 有学者认为现在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没有就业成长的经济成长」(jobless growth)，这个观点又未免太夸大。

³ *The challenge of Job Creation in Asia*, Felipe and Hasan, ADB, ERD Policy Brief Series 44, p.1.

其次，他主张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发展两岸共同市场，其核心精神都是加强资本的自由，特别是流动自由，即所谓松绑。用世贸协议的语言，就是为资本自由破除「贸易障碍」。什么是「贸易障碍」呢？读读世贸组织的协议就知道，所有保护劳工，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环境的法律、措施，统统都可以被世贸看成为「贸易障碍」，都应该推翻！其次，在世贸框架下发展两岸共同市场，其总的后果是大大加强两岸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必然加速台湾经济结构的迅速而巨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一定表示台湾就业机会出现净减少，但是一定意味就业结构的重大改变，低中技术劳工被淘汰，劳动市场更为「弹性化」、即更少保障。民进党批马的两岸共同市场是让大陆劳工来台抢饭碗，把矛头指向大陆劳工。这是放过祸首，即放过世贸和放过两岸的财团，而专门针对对岸的受压迫工人，是可耻的资产阶级伎俩。应该针对的是世贸和世贸框架下的共同市场。它们都不是好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劳工、农民、环保组织出来反对世贸组织。马英九却要拥抱它，民进党也不反对，那么他们究竟是财团的朋友还是劳动者的朋友，不是洞若观火吗？

总之，马英九的政策还是离不开资产阶级的偏见：只要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了，工人就受惠了。其实两者的关系从来就不存在那么自动的联系，到今天更不是那样。

如果劳动者不依靠自己的组织和行动去争取福利，别指望老

板发了财就会自动给你工人送馅饼！台湾共同体的确立也好，台湾上下一致拼经济也好，这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利益同工人阶级利益的必然对立的事实。

破除对选票的迷信，准备斗争

选民用选票和平赶走了贪腐的民进党政权，似乎说明了代议民主的可贵。有人更认为这代表了台湾民主的成熟。继二千年政党轮替后，人民再次尝到了「选票在手，人民作头家」的感受。百万红衫军上街都冲不倒厚脸皮的阿扁和民进党政权，但任期到了，选票叫你非下台不可。台湾人民对选举政治的信心再度增强，甚至大概有更多人相信，投票比上街更有用，更能展现群众的力量与意志。回头看中国大陆，其统治集团的贪腐更胜百倍，但是人民永远也不可能用和平的选票来赶走贪腐的最高统治者。大陆有些人号称左派，但是却对于代议民主和自由选举深仇大恨，认为一概是「资产阶级骗人的玩意儿」。这个意见并非完全荒诞，但是以偏概全。对劳动人民来说，代议制不管有多大的缺陷，它至少还名义上奉行主权在民的原则，赋予人民选举最高统治者的权利，无论如何总比一党专制好些。

问题是，究竟劳动者的那一票虽非完全没用，但是用处也远远不会大到足以令人民做头家，也不会大到可以代替劳动者自己的直接斗争。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努力要人相信，台湾的政治沉沦只是因为台湾某些政党或政客太没品的结果。这

真是肤浅不过。台湾的政治腐败，根本是因为制度性原因，是因为目前的代议制罩上了资本主义的金权力量的拘束衣，所以无法发挥较大作用。谁参选时指天誓日说可以为人们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不仅是捞取选票的空言，而且客观上引导群众放弃自己的斗争而去信仰生神仙——议员、总统。代议制虽然表面上让人们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但那是在几个重大前提下运作的：

1. 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在促进着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这两大阶级的持续分化；富人有非常多的经济与精神资源来有效运用自己的权利，去参选或助选，而穷人没有；
2. 资本家通过自己的财力，用合法（如购买或不购买国家债券）、半合法（如逃资）或径直非法的方式来影响候选人、选情以至执政党；
3. 能够划入民选范围的国家权力，只占全部国家权力的一小部份。国家大部份的行政及司法的高级官吏或法官，以至武装力量的高级将军们，都不实行民选，实际上摆脱了民主监督，成为自主性的反动力量。在重大关头，执政党考虑这些反动力量远多于考虑民意；
4. 代议制的核心精神就是只给公民一种非常间接、无力的选票，对于被选的人民代表没有有效的、及时的罢免权力，结果他们只能选出代表，却不能直接要代表怎么做。美国一个政治家对他的国家的总统选举的评论是，选举总统更像是选举皇帝的游戏——你投票之前是头家，投了票之后是臣民。

由于以上的条件，使得所有代议制最终都是偏袒资本家而歧视了劳动者。外国的代议制的败坏即使在程度上不及台湾，但是败坏的基本趋势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议制越是普及到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越显出无力监督执政党或高级官吏，所以也是它越来越失去民心的时候。当选来选去都是烂苹果的时候，很多人就索性消极不投票了。欧美过去几十年的投票率持续下降，越来越多人根本不愿投票，就是一个明显证据，证明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局限性。⁴至于那些新近独立或者民主化的国家（如南非），或者所谓转轨国家（如俄国），它们的代议制更是纷纷像台湾一样患上速老症，急速朽坏。政党走马灯一样轮流上台，轮流贪腐，而劳动人民却在贫困在线挣扎，致使越来越多人消极不投票。对劳动人民而言是坏事，对于资产阶级却是好事。在他们眼中，选民不去投票，正好让资产阶级的专业政治家放手大干。有些右派学者径直指出投票率低正代表代议制的成功！大概台湾再多几次选举，也会很快「成功」起来。事实上，这次大选的投票率只有 76.33%，比 2004 的 80.28 和 2000 的 82.69 都低，反映有更多人感到两党差别不大，投不投票都无所谓。台湾不少民众早就觉得台湾的选举一直是选烂苹果的活动，只是他们不了解这根本是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内在缺陷。然而，不久将来他们就会通过自己的经验开始认识到这点。工运活

⁴ 2006 年 11-12 月号的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有一篇文章 Ruling the void? The hollowing of Western Democracy 很详细地讨论欧洲人民的政治冷感趋势，值得一看。

动者应该随时根据形势来向群众说明：选票虽然有点用，但是劳动者的实际行动也有用甚至更为有用！没有群众自己独立的斗争，议会选举多份只是花瓶！不要幻想选票或者选出来的总统可以代替自己的斗争，可以为劳动者解决所有生活重担。红衫军街头行动的失败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恰恰在于它自始至终都把斗争目标和行动范围都定得太低太窄，而不是因为群众斗争总不如议会选举及游说。

有人说，国民党上台保持谦虚，民进党下台没有发动街头抗议，绿营群众普遍接受事实，这代表台湾民主的成熟。这个说法，左翼不能照单全收。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次大选结果和后续状况，代表的主要是台湾资产阶级两党制的成熟。为了显出群众的确有选择自由，所以资产阶级最好还是分成两个党；但是，资产阶级又须要时时用金钱力量提醒这两个党：不要假戏真做，搞到两党决裂，酿成大祸，造成群众介入统治权的危机。这种分而不裂，才能确保资产阶级既有政党轮替的假民主外衣，又有和平接班，保持资产阶级社会稳定的保证。所以，这种意义上的「民主成熟」，首先有利于台湾资产阶级。如果说它也多少有利于群众，那么，就只在这个意义上：台独牌的贬值，台湾主体意识为资产阶级两党所共举，有助群众把注意力转移到实际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而不是放到徒具形式的「台湾还是中国」的纷争上。问题不是群众有无行动，而是为何而行动。所以，用劳动人民的尺度去衡量的话，那么，民主制度的成熟程度，

恰恰要以劳动群众能够直接针对阶级不平等，并为此而举行持续不断的直接斗争为标准。

两个政党，一个阶级

民进党本来是打着代表下层民众和建立新国家的旗号的「进步」党。但是它却完全暴露出不过是打着幌子假公济私。这个结果其实也是注定的——是被其资产阶级性质所注定，也被其具体政策所注定。它用建立新国家的号召来收编社会运动，而实际上是用一个抽象空洞的应许之地来帮助资产阶级消融下层民众的具体抗争。它自称是民主战士，却把民主奋斗曲解为「政党轮替」，再简化为「投民进党一票！」，仿佛只要它代替国民党执政，就能够造福民众。世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八年之后，又轮到国民党的政党轮替了。民进党用八年时间不断「退步」，而国民党用八年时间不断「进步」。不管「退步」还是「进步」，都只是在欺骗愚弄劳动人民的伎俩的意义上的演进。事实证明民进党的「新国家」只是画饼充饥；将来的事实也会证明，对劳动者而言，国民党的「拼经济」同样是不能充饥的画饼。两个党越来越相似，越来越一样——一样反动，一样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自由，而劳动者一样受剥削和压迫。总之，第二次政党轮替，不过代表着同一个永恒的资产阶级统治权的灵魂，从上一世的民进党肉身再投胎到国民党肉身而已，并无任何本质改变。政党轮替的背后其实是资产阶级统治权的不断轮回的开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已经演进为资产阶级代议制和两党制的正常化国家，就像美国的两党制一样。不过，台湾的两党制究竟能够有多大稳定作用，还是未知之数。这端赖左翼能否利用一切机会来暴露它的阶级本质。民进党用空洞的正名制宪来捞取选票已经暴露无遗。接下来，就轮到要暴露国民党「拼经济」的虚幻号召了。事实将证明这同样只是骗选票的伎俩。左翼需要利用一切事实来向群众证明这点，并逐步通过他们的实际斗争经验来引导他们发展出劳动者阶级的独立政治意识，引导他们了解到，在这个「台湾人共同体」里面，一样衣分三色，食分九等，资产阶级照样骑在劳动者阶级身上。劳动者如果想打破这种压迫，就需要发展出一个凌驾于「台湾人共同体」的劳动者共同体。否则，劳动者就永远只能为人抬轿，俯仰由人。

2008年3月30日

生态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经济计划¹

迈克尔·洛威 Michael Löwy / 著

太乙 / 译

如果资本主义不能被改革进而让利润服从人类生存的需要，那么取而代之的制度，除了某种国家与全球化的计划经济以外，还有什么呢？解决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问题，需要借助「看得见的手」进行直接的计划调节。…我们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不能自救，除了在经济与环境问题上作出犯系统性错误的、非理性的以及最终——给定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导致全球毁灭的自杀性决策之外，其它一无是处。所以，我们此时除了考虑一种正确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别无选择。

——理查德·史密斯²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尝试替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毁灭过程」的、激进的、文明的制度。³它提出了一种基于非金钱与超经济的社会需求与生态平衡标准之上的经济政

¹ 本文英文版发表在《社会主义年鉴 2007》(Socialist Register 2007, Merlin Press)。

² 理查德·史密斯，「生态崩溃的引擎」，《资本主义、自然与社会主义》，16 (4)，2005，p.35

³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柏林：Dietz Verlag，1960，pp.529-30。对资本破坏逻辑的评论性分析，请见 Joel Kovel 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末日还是世界的末日？》纽约：Zed Books，2002

策。在生态学运动的基本言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基础上，这一辩证综合体——由大批学者提出，包括从 Andre Gorz（在他的早期作品里）到 Elmar Altvater、James O'Connor、Joel Kovel 以及 John Bellamy Foster——同时也是对包容资本主义的「市场生态学」以及忽视自然极限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一种批判。

据 O'Connor 指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基于生态理性、民主控制、社会平等以及使用价值高于交换价值的社会。⁴更进一步，我认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实行：

（a）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指代公共的、合作的或者共同的财产），（b）民主的经济计划，使投资与生产的目标由社会来订定，以及（c）一套贯彻生产力的全新技术结构。换言之，就是一次革命性的社会与经济转变。⁵

在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看来，由大多数绿党所代表的政治生态学主流存在的问题是，他们不能认识到存在于资本主义无限

⁴ James O'Connor, 《自然的动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文集》，纽约：The Guilford Press, 1998, pp.278, 331

⁵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采用了「生态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指出：「全球化的生态主义革命只有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我坚持认为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一部分时，才名副其实。正如马克思强调的，这样的一场革命…需要团结起来的生产者合理的调控人类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这必定受到了威廉·莫里斯（一位最为独创的、卡尔·马克思在生态主义思想上的追随者）、甘地以及其它激进的、革命性的唯物主义者们的启发。其中也包括马克思本人，甚至可溯源到伊壁鸠鲁。」福斯特，《组织生态主义革命》，每月评论，57（5），2005，pp.9-10。

制的资本扩张和利润积累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矛盾。他们的立场能够推论出对相关的生产主义的批判，但不能超越经过「生态改良的市场经济」的界限。结果是许多绿党成为了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派或自由派政府的傀儡。⁶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与由苏联激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接受了生产力现存的体系。前者将自己局限于一个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体系——就是说，最多是凯恩斯主义而已——，而后者则发展成一个独裁的集体主义者——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主义。这两者都忽略了或边缘化了环境问题。

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环境的毁灭性后果；他们在《资本论》以及其它著作里面的若干段落中指出了这一观点。⁷此外，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是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而是让人类有发掘自身潜能的自由时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与「生产主义者」并不相同，比如说后者认为产能无限扩大是一种目的。

然而，在马恩著作里关于社会主义将允许生产力的发展超越

⁶ 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现存生态政策」——绿色经济学、深入生态学、生物地域学等等——的批判，请参见 Kovel《自然的敌人》的第七章。

⁷ 请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主义——唯物主义与自然》，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00

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极限的观点，意味着社会主义变革只考虑了成为现存生产力阻碍（也就是他们常说的「链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全社会共同所有这些生产资料，并为工人阶级服务。我们引用成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论着《反杜林论》的一段话来说明上述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公开而直接占有对现有体系而言已变得太大的生产力」。⁸

苏联的经验揭示出由集体占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具所引发的问题。最开始，关于现存生产力的社会化理论占主导地位。在十月革命后的开始几年，生态主义的思潮确实有所兴起，并且苏联政府采用了某些有限的环境保护政策。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化进程，生产主义者在工业与农业上的办法被用极权主义的方式施行，同时生态主义者被边缘化以及被消灭。切尔诺贝尔核泄漏就是模仿西方生产技术的最后灾难性教训。所有权的改变，若没有随之进行民主管理以及重组生产体系，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其论著里面，对生产主义者的「发展」意识以及「社会主义者」剥削自然的观点展开了批判，如沃尔特·本杰明。但主要是在最近几十年里，生态社会主义才逐渐发展起来，以挑战占据二十世纪左派主流思想中关于「生产力中性」的理

⁸ 恩格斯，《反杜林论》，巴黎：Ed.Sociales,1950, p.318。

论。

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评论中受到了启发：工人阶级不能占有资本主义的国家工具并为自己所用。他们必须「摧毁它」，并取而代之一个本质上不同的、民主的以及非国家主义者形式的政治体制。同样，若对上述说法稍作修订，我们也可以说，生产资料也是非「中性」的，在其结构上就带有为资本积累和市场无限扩张服务的烙印。这与环境保护以及人类健康的需要相矛盾，所以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革新。

当然，许多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成果非常宝贵，但整个生产体系必须改革，并且只有按照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方法来实现；也就是说，对经济实行民主计划，而计划须要考虑生态平衡。这就意味着，某些生产方式要被废止：比如说核工业、某些大规模/产业化的捕鱼方式（这些方式导致了一些海洋鱼种的绝迹）、对热带森林的破坏性砍伐等等，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然而，首先需要变革的是能源系统，用如水、风、阳光等可再生能源替代当今污染及毒害环境的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的问题是决定性的，因为化石能源（石油、煤炭）对许多全球污染以及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负有责任。核能源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不仅因为有发生新的切尔诺贝尔事件的危险，还因为人们不知该如何处理千万吨的放射性废料——其危害可能存在上百年，上千年，甚至上百万年——以及被污染的/荒

废的工厂的垃圾。太阳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它并不「有利可图」或者「竞争性的」），但必须要成为着重研究和发展的对象，并在新的能源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实现所有这一切的必要条件是充分和平衡的就业。这一条件是最为基本的，不仅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平，而且还是为在生产方式结构性变革的过程中确保有工人阶级的支持。如果没有对生产方式的集体控制和计划，这一过程不可能实现。比如说，为了满足社会的共同福利，有关投资和技术变革的决策，须要集体来作出，而不是借助银行和资本家。

但是，让工人来承担这些决策是不够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社会主义社会被定义成一个「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组织他们同自然的交换（Stoffwechsel）」的社会。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采用了一个更广义的视角，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建基于共同占有生产工具的自由人联合体。⁹更为恰当的说，对生产和消费的合理安排不仅是「生产

⁹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柏林：Dietz Verlag, 1968, p.828 以及第一卷，p.92。人们可以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里发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欧内斯特·曼德尔赞成一种「民主的、中央集权的计划，它是在大部分由真正工人组成的工人协会的全国性议会指导下的」（曼德尔，《过渡时期的经济学》，收录在欧内斯特·曼德尔编的《世界革命运动50年》，纽约：Pathfinder Press, 1971, p.286）。在随后的论著中，他甚至提出「生产者/消费者」。我们将经常引用欧内斯特·曼德尔的论著，因为他是关于民主计划的最为多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但必须要说明的

者」的任务，也是消费者的任务；事实上，应该是全社会的任务，无论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还是包括学生、年轻人、家庭主妇（家庭主男），领退休金的人等在内的「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人口。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全社会应该民主地选择哪些生产性行业优先发展，以及投入多少资源到教育、卫生及文化。¹⁰商品的价格不能由供给和需求法则决定，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政治以及生态的标准来决定。起初，这仅包括对某些产品征税以及对另一些产品进行补贴，但理想上，随着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将根据公民的意愿免费派发。

民主计划远非「专制化」，而是全社会的自由决策。如果要从异化和物化的「经济法则」以及资本主义和官僚政治结构的「铁笼」中解放出来，就须要这样做。民主计划，加上劳动时间的减少，是人类走向如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决定性的一步。这是因为休闲时间的显著增加事实上是人们参与民主讨论以及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前提。

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都没有将生态问题纳入在他的经济论述的中心议题内。

¹⁰ 欧内斯特·曼德尔如下定义「计划」：「被计划统辖的经济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相对稀缺资源将不会通过价值规律被盲目的分配（「背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有意识的按照先前制定好的优先权分配。在社会主义民主广泛存在的过渡经济里，劳动大众民主的决定优先权的选择。」曼德尔，《过渡时期的经济学》，p.282

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们将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作为批判任何关于有组织性的经济的论据。姑勿论苏联经验的成败，我们认为它很显然就是一种对需求的独裁主义——套用 Gyorgy Markus 及其布达佩斯学派的朋友的表述，就是一种将所有决策的垄断权力赋予一小撮技术官僚（techno-bureaucrats）的体系。从本质上说，计划不会导致独裁主义，但是在苏联的民主发展日益受到了限制，并且在列宁去世后，极权主义官僚势力的建立导致了越来越不民主以及专制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人和劳动大众对生产的监督，那么斯大林及其后继者就远远脱离了这一标准。

苏联的失败说明了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局限和矛盾，这些都不可能避免的导致无效率及专断。但这不能作为批判民主计划的论据。¹¹社会主义学者关于计划经济的概念无非就是经济实现激进的民主化：如果我们不能容忍政治决策交给少数精英统治者，为什么我们能够容忍在经济决策上这样做？保持计划与市场的特定平衡确实是个很难的问题：在新社会的初步阶段，市场无疑将保持重要的地位，但随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计划将变得越来越占优势，而交换价值法则会逐渐变弱。¹²

¹¹ 「从工人大众的观点来看，官僚专制所带来的牺牲比起盲目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牺牲，都是不可『接受的』。它们只是代表了相同错乱的不同形式而已。」 Ibid., p.285

¹² 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Claudio Katz 在他近期关于社会主义的伟大著作中，强调由人们大众至下而上督导的民主计划「与绝对的中央集权主义、总量主义、战时共产主义或指令经济是不相同的。转轨要求计划

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制衡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¹³」资本主义社会的使用价值只是一种为交换价值和利润服务的手段或伎俩（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今许多社会商品完全无用）。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里，使用价值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唯一标准，而这将对经济、社会与生态产生深远的效果。正如 Joel Kovel 所观察的那样，「使用价值的强化，以及对需求作出相应的结构重整，这时就成为技术的社会调节器，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将时间转化为剩余价值和金钱」。¹⁴

在这里设想的民主计划体系中，计划是指主要的经济抉择，而不是去管理地方性餐厅、杂货店、面包店、小商铺、工艺作坊或服务。值得强调的是，计划也不会同工人对生产单位的自治相矛盾。通过计划体系作出的决策，例如从小汽车厂转变成生产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工厂，要由社会整体作出，并且企业内部的组织和运转要由他们自己的工人民主管

优于市场的地位，但并不是禁止市场变量。两种手段的具体组合要根据每个环境和国家的不同而调整。」然而，「社会主义进程的目标不是保持一成不变的计划与市场的平衡，而是促进市场地位的逐渐消亡」。

C.Katz, 《*El porvenir del Socialismo*》 Buenos Aires: Herramienta / Imago Mundi, 2004, pp.47-8.

¹³ 《反杜林论》，p.349。中文版：马恩选集第三卷 348 页。

¹⁴ Kovel, 《自然的敌人》，p.215

理。关于计划的「集权」或「分权」特征的讨论很热烈，而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怎样使计划在地区、全国、全洲（欧洲、美洲等）的层次上受到民主监督；最好是连全球范围内也这样做，因为诸如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并且只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一命题可以称做「全球性民主计划」。即使在这个层次上，也与通常所说的「中央计划」不同，因为生态与社会的决策不能由某个「中心」作出，而是由相关的人们民主决定。

当然，自治机构、地方政府与广泛的社会团体之间，不可避免的会有张力和冲突。协商机制可以帮助解决许多此类冲突，但最终来说，最为广泛的相关社群，如果他们是多数的话，就该拥有决策权。举个例子：一个自治的工厂决定向河流中排散有毒的废料。整个地区的人们都将受到污染的威胁：那么，可以经过一次民主的辩论，决定停止这个单位的生产，直到有一个满意的方案控制这些废料为止。乐观的讲，在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工厂的工人他们自己就拥有足够的生态意识，从而避免作出危害环境和当地人们健康的决策。然而，正如以上例子所示，保证最为广泛的社会意见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工厂、学校、社区、医院或小镇的层次上实行内部自治。

社会主义的计划在各个决策层次上，必须以民主而多元的讨论为基础。人民以政党、政纲或其它政治运动等形式分别组

织起来，各推举代表参选出任计划委员会，同时也向全体公民提出不同的方案。也就是代议制民主同时必须通过直接民主来完成和纠正，即人们——在地方、全国、以及甚至全球的范围内——直接选择各种不同的主要提案。公共交通是否该免费？拥有私家车的人是否该纳税从而对公共交通进行补贴？是不是该补贴太阳能，以促进它同化石能源竞争？每周工时应否降低到 30 或 25 小时，或更少，即使这将意味着产量的降低？计划的民主本质并不是不能容忍专家的存在：专家的作用不是决策，而是为民主决策的过程提供他们的意见——经常是不同的，如果不是对立的话。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所说：「政府、政党、计划委员会、科学家、技术人员或任何能提出建议的人，都要提出方案，试图影响人们…但在多党制下，这样的方案不可能没有争议，所以要让人们从各个不同的、各有道理的方案中作出选择。决定的权力应该在大多数生产者/消费者/公民手里，而不是其它人手里。这种制度又有什么家长制或专断的成分呢？」¹⁵

有什么东西保证人们作出正确的生态决策呢？尤其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会牺牲他们某些消费习惯？没有这样的「保证」。我们只能这样合理预期：在商品拜物教的势力一旦瓦解，就可以让位于理性的民主决策。当然，大众的选择会犯错，但谁又相信专家不会犯错呢？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的建立，可以不经多数人的斗争、自我教育、社会体验以及提

¹⁵ 曼德尔，《权力与金钱》，伦敦：Verso，1991，p.209

高的社会主义/生态觉悟的努力。因此，有理由相信严重的错误——包括与环境需求不一致的决定——可以被纠正。¹⁶无论如何，不论民主程序有什么局限，但是，其它的选择——盲目的市场或生态主义「专家」独裁——难道不是比民主程序更危险吗？

的确，计划需要行政的及技术的机构将所决定的项目付诸实施，但他们不必然是权威主义的，如果他们是受到永久的、来自下面的民主监督，以及在民主管理进程中包含了工人自治。当然，不可能希望大多数人将所有的自由时间都用于自我管理或参加会议；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所评述的，「自我管理并未意味着代理制的消失，而是将公民的决策与通过选举对代理的严格控制结合起来」。¹⁷

在全球公义运动中，迈科尔·艾伯特的「参与型经济」（parecon）是若干论辩的对象。虽然，它存在着若干严重的局限，比如说它忽略了生态，以及在理解官僚/集权化的苏联

¹⁶曼德尔评论到：「我们不相信「多数总是正确的」…每个人都会犯错。对于大多数公民、大多数生产者、大多数消费者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他们与他们的先辈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不平等权力的体系里…作出关于资源分配的错误决策的人往往不是为他们的错误承担后果的人…存在真实的政治民主、真实的文化选择和信息，很难相信大多数人会乐意看到他们的树木死亡…或者他们的医院人手不足，而不是希望马上的纠正这些错误的配置」。曼德尔，《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新左翼评论，1/159，1986，p.31

¹⁷曼德尔，《权力与金钱》，p.204

模式时将参与型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然而，「参与型经济」与这里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有某些共同之处：反对资本主义市场与官僚主义计划，依靠工人自治，反对专制主义。艾伯特关于参与型计划的模式是基于一个复杂的制度构建：

参与型计划的参与者是工人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及各种反复协调委员会（IFBs）。从概念上讲，计划过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反复协调委员会公布对所有商品、资源、各种劳动以及资本的所谓「指示性价格」。消费者协会用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指示性价格估计提供这些的社会成本，然后提出一个消费计划。工人协会用指示性价格来估计产品的社会效益和投入的真实机会成本，也提出一个生产计划作出回应，列出他们愿意生产的产品以及他们所需用于生产的投入。反复协调委员会随后计算出每种商品上过剩的需求或供给，并根据这些，按照社会遵循的计算法则调高或调低指示性价格。根据这些新的指示性价格，消费者和工人协会修改并重新提交他们的计划…参与型经济取代了工人被资本家或协调者的驾驭，促进了公平、团结、多样性以及自治，是一种工人和消费者合作制定他们的经济选择并从此受益的经济。¹⁸

这一概念——不是「非常简单」，而是极其精细，并有时候非

¹⁸ 迈克尔·艾伯特，《参与型经济——资本主义以后的生活》，伦敦：Verso，2003，p.154

常模糊——主要问题是它将「计划」缩减为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价格、投入和产出、供给和需求这些问题上的协商。比如，汽车工业的工人协会将同消费者协会会晤，讨论价格，并根据需求调整供给。这里所忽视的正是生态社会主义计划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对交通系统进行重新组织，根本上减少私家车的比例。因为生态社会主义要求某些行业整体消失——比如核工业——以及对一些小的或基本上不存在的部门（比如太阳能）进行大规模投资，那么，这些又如何能由现存的生产和消费者协会通过对「投入」和「指示性价格」的「合作协商」来实现呢？

艾伯特的模型反映了现存的技术和生产结构，但太「经济」了，从而不能考虑到人们在全球、社会政治以及社会生态上的利益——个人利益应该是作为公民和人类的利益，不能简化为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他忽视的不仅仅是国家作为一种制度——虽然这个看法本身是可敬的——还忽视了政治本身，忽视了政治就是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以及文明上的各种主张的对抗，这种对抗，从地方、全国一直发展到全球各个层次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进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是对社会、文化及精神的一次不断的革命性的转变——从这点意义上来说，刚才定义的政治不能不成为这一进程的核心。值得强调，这一进程如

果要开始，不可能不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的革命性改造开始，而且还须要有一个得到最广泛群众支持的生态社会主义纲领。社会主义觉悟与生态意识的觉悟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自身的集体斗争的经验，从地方性和局部性的斗争一直到社会改造的斗争。

这一转变不仅能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模式以及一个平等的与民主的社会，还能导致一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一种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文明，它超越了金钱的范围，超越了由广告人为催化的消费习惯，以及超越了无限制地生产无用与/或对环境有害的商品。一些生态学者认为，生产主义的唯一替代就是全面停止增长，或者用负增长取而代之——即法语中所谓的 *decroissance*——并且彻底地减少人们过高层次的消费，从而缩减一半能源的耗费，取消个人家庭住房，抛弃中央供暖、洗碗机等等。因为这些或类似的严酷的方法不是那么受欢迎，一些 *decroissance* 的支持者夹杂者「生态主义专制」的思想。¹⁹与这些消极观点想法相反，社会主义的乐观者相信技术进步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实现无限制的增长和富饶，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按照其需求」取得消费。

¹⁹关于「负增长」的选文，请参见 Majid Rahnema（与 Victoria Vawtree）编的《*The Post-Development Reader*》，Atlantic Highlands, N.J. : Zed Books, 1997，以及麦科尔·伯纳德等编的《*Objectif Decroissance: vers une société harmonieuse*》，Lyon : Editions Parangon, 2004。关于「*decroissance*」法国的主要理论家是 Serge Latour，他著有《*La planète des naufrages, essai sur l'après-développement*》巴黎：La Découverte, 1991

在我看来，这两个学派在谈到增长及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都只考虑纯数量概念——不论是正的或负的。然而，在我看来，还有更为恰当的第三点：发展的质量转变。这就意味着结束资本主义对资源的大量耗费以及无用的与/或有害的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军事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占据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很大部分，而它所带有的荒谬性是固有的；它除了为大公司创造利润外，其它一无是处。这一问题不是抽象的「过量的消费」，而是这样一种普遍流行的消费模式：它建基于明目张胆的侵吞、大量的浪费、商业社会的异化、强迫性的商品堆积，以及为「时尚」所逼迫而不断地购买流行商品。新社会的生产应该以满足真实需求为导向，从所谓的「神圣」东西——水、食物、衣服、房屋——开始，也包含基本的服务：健康、教育、交通、文化。

显而易见，南方国家的需求远远没有被满足，所以，比起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它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有更高程度的「发展」——修建铁路、医院、排水系统以及其它的基础设施。然而，这没有理由不能通过环保的和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体系来完成。这些国家需要生产大量的食物来哺育他们饥饿的人们，但这可以通过基于家庭、生产队与合作农场的生物农业来得到更好的实现。这就是「农民之路」国际网络（Via Campesina）多年来一直在全球范围推动的增长方式，而不是通过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使用基因改造技术等破坏性的与反社会的工商业化方法来实现增长。南方国家当今的有如山积的债务，

以及工业化国家对南方国家资源的帝国主义式的掠夺，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废除。同时，北方国家应该对南方国家提供技术和经济上的援助。这并不需要像一些苦行的生态主义者所信奉的那样，要欧洲或北美的人们降低他们的生活的绝对标准才能做到。相反，这只需要他们放弃强迫性消费那些无用商品；他们这种消费习惯根本同真正的需要无关。这也须要社会重新把生活标准定义为：一种真正富足的、同时消费更少的生活。

如何将真正的需要同人造的、虚妄的、可有可无的需求区分开来呢？广告产业用操弄人类心智来制造后一种需求。广告已经侵入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食品和服装，还有运动、文化、宗教以及政治都是按照这样的规则形成。广告通过持久的、咄咄逼人的以及阴险的方式，充斥着我们的街道、信箱、电视机屏幕、报纸、风景，并且它肯定促成了一些显着的、强迫性消费习惯。并且，它作为一种「产业」，不仅从人类的观点看来是无用的，而且还直接与真实的社会需求相违背。它浪费了大量的石油、电力、劳动时间、纸张、化学品以及其它的原料——这些全部由消费者来支付。虽然广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在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后，它将无地容身，并被消费者协会提供的关于商品和服务的信息取代。在广告消亡后，区分真实与虚假需求的标准，就看它在广告消亡之后，是否还长期存在。当然，在一段时间里，老的消费习惯仍然存在，

并且无人有权告诉别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消费模式的变迁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同时也给教育带来了挑战。

一些商品，比如说私人汽车，引发了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私人汽车在公众看来是很讨厌的，它在世界范围内每年使成百上千的人死亡或残疾，并且污染大城市的空气——导致了对小孩或老人健康不利影响。但是，从当今资本主义的现状来看，它反映了实在的需求。在欧洲若干具有生态管理意识的城镇，做过地方性实验，这些实验表明，日益限制私家车和提倡巴士和有轨电车，是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的，因此是可行的。在向生态社会主义转轨的过程中，公共交通——无论是地上或地下的——都将大量增加并免费提供，步行者和自行车都将有被保护的单独行道。在新的社会里，私家车将扮演比在虚荣的资产阶级社会更少的角色。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告持久地、积极地鼓动人们购买私家车，使私家车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美国，驾照是公认的身份证），并且是个人、社会、奢靡生活的中心。²⁰在向新社会转轨中，

²⁰ 欧内斯特·曼德尔怀疑消费者的习惯会迅速的变化，比如说私家车：「如果他们（生产者和消费者）想要保持私家车的优势地位并继续污染他们的城市，不管任何环境或其它的言论，那么这是他们的权力。一般说来，长期的消费者导向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少人会相信美国的工人将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放弃对汽车的依赖。」曼德尔，《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p.30。曼德尔认为消费模式的改变不能强迫，这是正确的，但他严重的低估了大范围的免费公交体系带来的影响，以及大多数公民的赞同——现今，在若干欧洲大城市已经如此——限制汽车流通的方案。

要大量减少用卡车运输货物；它要对严重的交通事故及污染负责。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用铁路运输或法国人所称的 *ferroutage*（把卡车放在火车中从一个镇运送到另一个镇）。在新社会里，这变得容易。只有资本主义荒谬的「竞争」逻辑才能解释卡车的危险的增长。

的确，悲观主义者将要说，人们受到无限的渴望和欲望的驱动，但若要对此加以控制、规限和压抑甚至要压制，却又变成对民主的限制。但生态社会主义是基于一个已经由马克思提出来的合理预期：在一个无阶级和从资本主义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里，「体验生命」凌驾于「拥有」。比如说人们希望有进行个人文化、运动、娱乐、科学、性爱、艺术与政治活动的休闲时间，而不是无限制的拥有产品。强迫性的占有是根源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商品拜物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意思形态和广告导致的。没有什么能证明这是「人类永恒本性」的一部分。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所强调的：「对越来越多商品的不断积累（伴随着下降的「边际效用」）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普遍的甚至占支配地位的人类行为的特征。培养个人才能及爱好；保障健康及生命；养育小孩；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这些才是一旦基本物质满足之后的主要动机。」²¹

正如我们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环保要求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不意味着在生态规则与发展基本的基础设

²¹ 曼德尔，《权力与金钱》，p.206

施的需要之间（特别是在穷国）不会发生矛盾。同样，流行的消费习惯同资源的稀缺性之间也有冲突，特别是在转轨过程中。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不意味着一个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这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从生态社会主义者来看，民主计划的任务是从资本和追逐利润的规则中解放出来，运用多数决的原则和公开讨论解决这些矛盾，达成社会本身的决策。这样一种立足草根的、参与型的民主是唯一的途径；这不是说它可以避免犯错，而是说它能够通过社会集体来纠正错误。

这是乌托邦吗？从语源上讲是，因为乌托邦就是指「不存在的事物」。然而，任何一个想向现有秩序挑战的运动，都会提出自己对于另一个理想社会的设想或蓝图。这难道不是这些运动的必要特征吗？难道这些不是乌托邦吗？正如丹尼尔·辛格在它的文学和政治遗作《谁的千年？》中的一章《现实的乌托邦》阐述的那样，

…如果建制现在看起来很坚固，不管一时的环境如何，又如果工人运动或者泛左翼太跛足，太残缺，这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够提出一套激进的替代方案，因为它们接受了这样的游戏规则：既不质疑建制派的基本原则，也不质疑它的社会基础。我们只有提出全面的替代方案，只有同无所作为和投降精神决裂，才能为解放运动创造空间。²²

²² 丹尼尔·辛格，《谁的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纽约：每月评论出

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的乌托邦只是一种客观的可能，不是反抗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或「历史上铁的规律」。人们不能预见未来，除非是给出相应条件：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没有生态社会主义的变迁，没有对文明范式的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将导致严重的生态灾难，危害上百万人的健康和生活，可能甚至威胁我们的生存。

设想并为之奋斗一个绿色的社会主义，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的「太阳能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人们不需要努力开展具体的和紧迫的改革。如果对「洁净的资本主义」不再抱有幻想的话，人们就必须争取时间，并试图影响权力当局开展初步的改革：禁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 HCFC，延期推行转基因生物，大量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对捕鱼业以及工农业生产中的杀虫剂和化肥进行严格管制，对产生污染的汽车课税，更大程度的发展公共交通业，积极的用火车替代卡车。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是 global 公义运动和世界社会论坛的中心议程。从 1999 年的西雅图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崭新的政治发展，这使得社会和环境运动能够结合起来，共同斗争。

这些迫切的社会生态要求能够引发激进的斗争，只要它们不让自己迁就所谓「竞争力」的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过渡纲领」，每次小的成功、每次局部的进步都马上导致一个更高的需要，一个更为激进的目标。围绕具体问题展开

的斗争是很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局部胜利本身鼓舞人心，还在于它们提高了人们对生态的和社会主义的认知，以及促进了自下而上的行动与自主组织。这两者都是必需的，并且确实是激进或革命性的改造世界的决定性的前提。

地方性的实验是有局限的，但却有趣的社会/生态改革例子，比如，若干欧洲小镇划出特别区域、禁止汽车行驶的免费搭车区域；由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发起的有机农业合作社；或在波尔图（Porto Alegre）的参与式财政预算，这种实验也在巴西的 Rio Grande do Sul 州开展了几年（在工人党州长 Olivio Dutra 的管理下）。通过允许地方集会决定预算的优先权，波尔图——直到左翼在 2002 年市政选举中失利——可能是最为诱人的「自下而上的经济计划」的例子，虽然它有局限。²³然而，必须承认，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即使采取了少数的进步政策，但整体上欧洲、拉丁美洲的中心偏左或「左翼/绿色」联盟的经验很让人失望，还是严格的属于适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政策。

除非致力于激进的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运动的力量，能够壮大到具有文化霸权——套用葛兰西的话——，否则，激进的革命不会出现。从一个方面看，随着我们致力于变革，时间在我们这边，因为全球的环境状况越来越恶化，威胁越来越临近。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若干年

²³ 见 S.Baierle, 《The Porto Alegre Thermidor》，社会主义年鉴 2003

后——没人可以预见是多少年——会变得不可逆转。我们没有理由乐观：现有体系的统治者是非常强大的，同时激进的反对力量仍然很弱小。然而，他们是阻止资本主义「毁灭过程」的唯一希望。正如沃尔特·本杰明所定义的那样，革命不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是人类对火车的紧急刹车，在它跌入深渊之前...²⁴

²⁴ 沃尔特·本杰明,《Gesammelte Schriften》第 1/3 卷,法兰克福:Suhrkamp, 1980, p.1232

产权制度、人性、与经济发展之互动

——记异议经济学家萨缪·鲍尔斯的一场演讲

李俊奔

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是英语世界中知名的异议经济学家，是少数能与主流经济学界的顶尖学者分庭抗礼的人物。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出席他的公开讲座，当天不少出席者兴许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

演讲主持人在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便是对鲍尔斯的正式介绍。

原来，牛津、剑桥、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出版社，均有出版他的著作！他已经不单纯是个经济学家了，他同时是个人类学家，生物学家！他近年关于人性演化的论文，便有好几篇刊登在《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这两本顶尖的科学学报上！他是罗伯特·甘乃迪（Robert Kennedy）竞选美国总统时的经济顾问，那时他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青人！他曾任三个很不寻常的国家——古巴、南非、希腊政府——的经济顾问！他小时候在印度生活过好几年，又曾经以少年音乐家的身份去苏联巡回演出，几乎到过每个加盟共和国！

古语云：幸运背后没有另一个幸运，不幸后面往往是另一个不幸。这时候听众的感觉却是：每个惊讶之后总是另一个惊讶。

主持人最后这样带出主题：

「…他在进大学之前当过水手。他对所见所闻，都要研究玩味一番，最近对一种叫古杜（Kudu）的东西尤其感到兴趣。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正好是：『产权制度的未来：在无重经济（Weightless Economy）下的古杜经济学（Kudunomics）』。事不宜迟，我们欢迎鲍尔斯教授！」

鲍尔斯在热烈的掌声中踏上讲台，他不负众望，果然给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下面综述一下他演讲的内容，然后谈谈与他的思想和经历有关的看法、见闻、与感受。

采摘狩猎部落中的共有制度

近年来，经济学实验大行其道，鲍尔斯是最早把经济学实验推广到至今尚存的采摘狩猎部落的学者，他与人类学者进行研究，比较不同经济体系、不同文化之下人类行为的异同（经济学实验与心理学实验有很不同的方法论，这里撇过不说）。由于这个缘故，他有很多机会在这些部落生活，近距离观察

他们的行为。

有一次他在一家作客的时候，那家的主人刚好打猎回来，垂头丧气地说：「今天很倒霉，甚么东西都打不到！」他的儿子留意到父亲身上的血迹，便飞奔出去，很快便拿回来了一只野味。主人说：「我只打了这一点丁儿，我看连开火都不大化算！」其实这只野味也有十来公斤重，并不是像主人所说的那样不值得开火。鲍尔斯指出，这个猎人的谦卑态度在采摘狩猎部落中是非常普遍的，那里没有人会夸耀自己的成就，就算有了了不起的成就，他们仍然会认为自己的贡献微不足道。（据我当时听到的是，主人所指不化算，是指把所有人叫到家里，但是猎物太小，不经济也不体面。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自家人独吃，最终还是升火煮熟然后所有人一起吃。）

鲍尔斯也曾参与这些部落的打猎活动，当地有一种猎物叫古杜，一只成年古杜可以为一百人提供一天的热量，是今天在非洲尚存的采摘狩猎部落可以打到的最大的一种猎物。鲍尔斯那次打围，并没有打到古杜，但是据他所知，当人们打到古杜的时候，并没有把牠据为己有，相反他们会把所有人叫来——包括完全没有参与打猎的人——然后一起大快朵颐一番。古杜并不是容易得到的东西，一旦你打到了，不与其它人分享是很浪费的事情。

鲍尔斯认为，总的来说，在采摘狩猎部落中，人们是极其谦卑的，他们过着平等的生活，对于重大的收获，他们并没有

采取现代人的私有财产制度，即把它当成是仅仅是参与打猎的猎手的私有财产。这些存在于今天的采摘狩猎部落的财产制度，也是农业文明出现之前的人类社会的财产制度。

无重经济

农耕文明的出现产生了私有财产制，而在过去五百年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历史中，人类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则是私有财产制度符合经济发展的表现。鲍尔斯指出，情况越来越不一样了，我们以往所了解的私有财产制度越来越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表现。

他首先指出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过去尚算行之有效的理由。一直以来的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生产可以称为「谷物钢铁经济」(Grain and Steel Economy)，而这种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1) 产品易于计量，产物的大小，数量质量易于事先描述和事后鉴别，(2) 生产一般具备规模报酬不变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的特点，或者是规模报酬递增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不算很严重的特点。¹第一个条件令买卖双方易于订定能够执行的合约；第二个条件令产业

¹ 简单而言，一个企业具备经济规模不变的条件，是指其产品平均成本基本固定，不会因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或者上升。一个企业具备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是指其产品平均成本会因生产的规模扩大而下降。后者的例子包括公共运输系统、电话网络系统、等等。显而易见，只行走一条路线的巴士公司载运乘客的平均成本较高，行走多条路线的巴士公司载运每个乘客的平均成本较低。

部门内部出现近似完全竞争，或者相对稳定的寡头市场，以至商品价格同边际成本²相差不太远，效率损耗（Deadweight Loss）不太大（效率损耗的明确定义下面举出）。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由阿罗（Kenneth Arrow）和迪波尔（Gerald Debreu）³证明了可以称为「看不见的手」定理（即第一普遍福利定理），严格证明了市场要有效率地运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完全市场（即对于每种产品——包括还没有给发明出来的产品——买卖双方都能签订可以执行的巨细无遗的合同），和（2）经济规模不变；不然的话，市场就会没有效率，产生浪费。鲍尔斯指出，由于上面提及的「谷物钢铁经济」正好大致具备这两个条件，这就是为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尚算行之有效。

但是，鲍尔斯接着指出，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无重经济（Weightless Economy）。无重经济是著名经济学家 Danny Quan（马来西亚人，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大约十年前提出的一个概念，它表示今天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资源投放在一些不容易量化、不容易描述的东西的生产上面。对一个流行病疫苗、一个计算机程序、一支音乐，这些东西在成功出现前往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成败也带有运气的成份，由于在成功之前是很难描述和界定的，以上第一个条件不再成

² 一个产品的边际成本是指多生产一个单位产量的额外成本。

³ 迪波尔因此而取得 1983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阿罗则在 1973 年因另一项贡献而更早就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立；此外，如果蓝图一旦成功产生，则之后的边际成本往往为零，即这些东西的生产是有强烈的规模报酬递增存在，因此以上第二个条件也不成立。

一个 CD 产品的边际成本是一块钱，而售价是一百四十元。这有两个明显的坏处。第一，这造成经济学所说的效率损耗（Deadweight Loss）。举例说，我愿意最高付出五十块钱买那张 CD，由于生产它只需要额外的一块钱，显而易见，生产它可以令买卖双方都得益，而不会令任何其它人受害，但这个客观上对社会有利的行为并没有出现，这当然是一种浪费，经济学家称这为效率损耗。事实上，经济学原理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产品应该以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否则便会出现效率损耗；而降低效率损耗则是主流经济学家赞成市场和私有财产的主要理由（如果不是唯一的理由的话），但在无重经济之下，连这个支持理由都越来越难成立了。

第二，社会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来维持这个制度。生产商和政府要招聘更多的人手来打击盗版活动，而这些人手本来是可以从事于有意义的生产性活动的。⁴同时，要维持这个制度

⁴ 在别的研究中，鲍尔斯把劳动分为两大类：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r）和警卫劳动（guard labor）。后者包括警察、私人保安队伍、军事人员、以至所有保证社会和企业的运作和财产关系的那部份劳动。他与合作者在一篇实证研究中发现，美国今天劳动力人口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属于警卫劳动，从 1890 年到现在，它的警卫劳动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三倍之多。此外，今天瑞典的警卫劳动比例是美国的一半而已，其它收入不平等的国家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作者们表示，他

，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又会千方百计地在技术上防止侵权的活动，而这些成本对社会来说是一种纯粹的浪费。鲍尔斯举出了一个最夸张的例子。杂交玉米（Hybrid Corn）是一种在一百年前发明的改良种子，但是它要六十多年之后才获得商业推广。原来的改良种子之没有获得推广，原因很简单：农夫只要买一粒种子，以后便可以种出成千上万粒这样的种子，而毋需买第二粒。事实上，这家公司其后花了大量的研究经费，就是要让原本已经制成的改良种子变成不可生产下一代种子的不育种子，即大量的金钱竟花在令产品倒退的技术上！

鲍尔斯这时提到海耶克。海耶克指出过，到底中央指令计划和市场经济之间孰优孰劣时，就把哪个制度能更好地利用信息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条件：

「哪种经济制度[中央计划还是竞争]更有效率，取决于哪个经济制度能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这个问题也就变成以下的问题：现有分散为各人所知道的知识，是把它传递给需要作出生产决定的中央机关容易呢？还是把它传递给那些需要作出决定的[市场上的]个人然后让他们调整自己的计划容易

们所用的具体的定义其实是很严格的（举例说，他们没有把律师和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学教授当是警卫劳动的一份子，等等），因此实际情况应更为严重。见 Samuel Bowles and Arjun Jayadev（March, 2007）「Garrison America,」 Economists' Voice。

呢？」⁵

鲍尔斯很称颂海耶克在重视运用知识方面的先见之明，但他指出，正好出于对知识方面的重视（无重经济下最重要的生产就是知识的生产），传统的对知识的私有财产的处理方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上面已经指出了价格严重高于边际成本所造成的浪费。如果把需求外部性（Demand Externality）也考虑进去，则浪费的情况就更严重了。有些产品，使用者使用它不仅为自己带来好处，也为其它人带来好处；电话就是一个例子，越多人家里有电话，那么我家里的那具电话为我带来的好处就越大。但是，当某个人在决定是否购买一项这样的东西时，他只考虑自己的得益，而不会考虑到社会其它人的间接的得益，这因而造成了货品需求过少——即基于私人利益的购买量是低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理想购买量。由于知识生产大都具备这样的外部性的特点（一个新的计算机软件不但令使用者受惠，还会加速知识的更新；一种新药不但令使用者受惠，也会减少病人家属的痛苦与政府的负担），上面指出的购买量过低的问题在无重经济下尤其严重。如果海耶克在生，他也许会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产生怀疑！

⁵ 见 F.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45.

鲍尔斯提出的看法，并不是他个人独有的看法。阿罗——即那个在五十年代试图弄清楚市场有效的条件的那个经济学大师——最近也就私有产权问题提出忧虑：「…信息是游走不定的资源…我们现在刚刚开始面对[一方面是]私有财产制度与[另一方面是]信息获得和传播的制度两者之间的矛盾…法律关系与基本经济因素的日益增加的紧张。」⁶

阿罗不是马克思，但他的言论却与马克思的言论何其相似！⁷

人性与经济的互动

对于人类未来的财产制度会是怎么样的，鲍尔斯认为我们也许可以从现存采摘狩猎部落得到启发。事实上，一个流行病疫苗、一个有用的计算机程序、一个优美的音乐集子，它们都是不容易获得的，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和有很大的运气成

⁶ Kenneth Arrow, 「Technical In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arrol Glenn and David Teece, eds. *Firms,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56-163.

⁷ 我们在此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对于目下的知识产权制度一直有所垢病，见 Stiglitz, Joseph (2006)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Norton。在 2007 年因机制设计研究而取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马斯金 (Eric Maskin)，在近期一篇的理论文章中指出，如果发明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 (即新的发明依赖前一个发明的一些重要部份)，则专利权保护并不是鼓励创新的好方法，对于整个社会以至那些发明家本人来说，完全没有专利保护甚至可能是更好的安排。见 James Bessen and Eric Maskin (2006), 「Sequential Innovation, patents, and Imitation,」 mimeo, Boston University and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份，而获得之后可以同时让很多人使用而不减每个现存使用者从中取得的好处，它们不就是今天的古杜吗？

「在这个文化里，大人物和部落元老必须在每个转折点上温柔地幽默地自我挖苦才能保持其地位…[在这个文化中的人]必须自觉地怀疑和看扁自我中心及其行为；自我吹嘘是会受到无情的批评的。」⁸

这并非对采摘狩猎部落的描述，而是对当下计算机软件行业中的开放源运动的文化中人的描述！（开放源运动是一个自由参加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下产生的软件不设版权、容许自由使用，最有名的成功软件例子是 **Linux**。另一个例子是万维百科全书（**Wikipedia**），尽管它不属于计算机软件。）开放源运动采取了同传统不一样的财产权制度，就像采摘狩猎部落中不把直接打到古杜的猎人当成是那猎物的拥有者一样。

今天，人们经常讨论市场与国家在调节人类经济活动的角色，到底是大市场好还是大国家好，等等。但是，在市场和国家之外，其实还有社区（**Community**）。而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和在社区中的行为就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市场上的消费者，我们一般不会考虑卖方的福祉，我们不会作出损己利人的行为，但是，在一个社区之中，我们彼此关心，我们会作出

⁸ Eric Raymond, *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Sebastopol, Calif: O' Reilly, 2001) p.88

损己利人的行为。在无重经济之下，长远来说，到底市场、政府、社区三者的关系会怎么变化呢？社区的角色会不会变得越来越重呢？会变得怎么重要呢？（这是个非常革命性的问题，毕竟，社区（Community）和共产主义（Communism）两个英文字是来自于同一个字源，尽管鲍尔斯并没有如此鲜明地指点出来。）

鲍尔斯近年来展开了一个叫「人工历史」（Artificial History）的研究领域，这有助于我们认识未来的产权制度的变化。

鲍尔斯的出发点是：（1）人们对公平的态度、利他行为等等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并不是自有永有的、或一成不变的。（2）社会规范在决定人们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这不仅由于社会规范对违规者予惩罚，使人不敢违规；社会规范更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使违规者感到良心的责备，即使其违规没有受到发现。换言之，社会规范对人性的塑造有巨大影响力。（3）社会规范一方面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同时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受到挑战，产生改变。

那么，经济发展怎么影响社会规范和人性的变化呢？鲍尔斯采取了一个适者生存的演化论的观点，当服从社会规范比不服从时带来更大的收益的话，服从者就更容易得到繁殖，强化原来的社会规范。相反，如果不服从社会规范比服从时带来更大的受益的话，那么不服从者就更容易得到繁殖，进一步破坏原来的社会规范，因而导致新的社会规范的出现。

鲍尔斯指出：当私有财产越来越难界定，就会使服从共有财产制度的人得到比服从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人得到更大的收入，因此共有财产制度看起来越来越合理，支持共有财产制度的人越来越多。这不仅是人们理性计算选择的结果（即基于个人利害计算的结果），也是向往平等的那种人性随着经济发展之下的续渐获得认同的结果。对于这种人，他们向往平等的制度并不是首先考虑到自己从中得到的好处。为了说明这一点，鲍尔斯给出了一个数学模型。

关于人性变化的数学模型

我将鲍尔斯的数学模型简化如下：人群中有三「类型」个体：逆来顺受者、平等主义者、私有者；他们在人群中的比例分别为 a , b , 和 $1-a-b$ 。在每个阶段，每个人随机地与另外某人配对（举例说明，对于任意给定的某个人来说，他遇到一个逆来顺受者的机会是 a ，遇到一个平等主义者的机会是 b ，遇到一个私有者的机会是 $1-a-b$ ）。每一次相遇时，其中一人（以相等机会）得到一个发明，可带来等于 v 的收入。假设他们有可能搞错到底是谁发现那个发明，记这个机会为 m ($0 < m < 1$ ； m 越大，产权越难明晰；在谷物钢铁经济中这个 m 很小，在无重经济中这个 m 很大)。三类型个体的行为如下：

- 逆来顺受者总愿意与对方平均分享成果 v ；倘若另一人要独占那个发明的成果，他的反应是逆来顺受、拱手相让。

- 平等主义者和逆来顺受者一样，总愿意与对方平均分享成果；但倘若另一人要独占那个发明的成果，他会与其它平等主义者一起联手与那人大打一场，他获胜的话可取得整个发明的成果（并与其它平等主义者分享），而获胜的机会则与他们在群中的多寡成正比例。
- 对于私有者来说，倘若他觉得发明是他发现的话，他会予以独占，此时若对方要来分享，他将不惜与对方大打一场。倘若他觉得发明不是他发现的话，他不会要求分享（当然他不会反对逆来顺受者或平等主义者与他分享成果）。

鲍尔斯假定人们在享受成果之后便繁衍下一代，下一代的数目同他们这一代的收入相关，收入最高的类型的人口增加，收入最低的类型的人口减少，如此类推。由于这里研究的兴趣是在无重经济下，汰弱留强的过程是否会令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支持共有财产制度的人性，因此这里假设这三类型的个体的行为是预早确定（即好象是给计算机程序预早确定了一样），而不是自由思考、认真计较的结果。

静态均衡分析

首先注意到，一个只有逆来顺受者和平等主义者的社会是一个均衡，此时人们过着相对平等的生活，对不愿与人分享成果的人予以制裁，由于这里没有人主动独占财产，平等主义者并没有机会去惩罚别人，因此他们与逆来顺受者在行为上

是分不出来的，而且两者都得到相同的收入（由于本来就没有私有者，我们无须考虑私有者的收入）。这两类人的人口比例会世代保持不变，这就是我们称这种状态为「均衡」的结果。

现在我们考虑「文化基因」的突变（**Mutation**），即由于不明原因，个别人的类型改变了。基因突变在物种演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考虑「文化基因」的突变是顺理成章的。

显而易见，逆来顺受者变成平等主义者，或者平等主义者变成逆来顺受者，这样的突变是无关宏旨的：在只有逆来顺受者和平等主义者的时候，没有人会尝试独占发明的成果，因此这样的突变并没有为突变者带来好处。

如果突变的结果是变成私有者的话，答案就不是一概而论了。容易证明：如果（1）平等主义者的比例足够大（**b** 足够大），而（2）私有产权的模糊性充份大（**m** 充份大）的话，这样突变产生的私有者并不能繁殖下去。私有者能够欺负逆来顺受者，而不能欺负平等主义者。第一个条件保证了，私有者遇到他的克星平等主义者的机会很大，而平等主义能成功惩罚前者的独占行为也很大（因为他们人多势众）。第二个条件保证了私有者很可能会与对方就发明权谁属的问题产生争议，因而受到对方的反对（如果对方是平等主义者的话）。因此，私有者的预期收入，将不如平等主义者和逆来顺受者的预期收入高，这样的「文化基因」的突变就得不到繁殖，

反而受到淘汰。

此时我们注意到 b 和 m 在保证私有者不会繁殖下去时的互补性作用。要是 b 足够大, m 并不需很大, 就可以防止私有者繁殖下去; 同样道理, 要是 m 足够大, b 并不需要很大, 就可以防止私有者繁殖下去。这样的结果可以用比较严格的数学语言表达:

定理: 给定初始条件 $a+b=1$ (即开头私有者的比例为零)。存在一个临界点 $b(m)$ ($0,1$) 有以下特性 ($b(m)$, 即 b 是 m 的函数的意思)。

- 如果 $b > b(m)$, 私有者就不能通过突变而繁殖下去; 相反, 如果 $b < b(m)$, 则私有者就能通过突变而繁殖下去。
- $b(m)$ 是 m 的递减函数, 即 $b(m)$ 随 m 增加而减少。

上述的研究表明, 一旦有足够的人的人性变成了平等主义 ($b > b(m)$), 那么无须外力的强制, 平等主义的人性便会繁衍下去, 而原来的私有者和突变产生的私有者均不成气候。相对于谷物钢铁经济, 在无重经济之下, 由于 m 更大, 这样的条件更容易满足。

非均衡动态分析

以上的分析只告诉我们, 一旦人群的比例达到什么条件之下

，无须外力的强制，私有者的人性便不会繁衍下去。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在充满私有者的现实条件下，人类是否或者是如何过渡到这样的均衡。⁹

对此，鲍尔斯进一步运用了计算机仿真的方法（Agent-Based Method）。他假设每组人为若干人，而开始的时候每组人中三类人的比例是随机给定的，谁的收入更高就有较高的繁衍下一代的概率，每人有向其它类别的「文化基因」突变的可能性，概率为事先给定的参数；同时有许多的这些小组，容许人们向邻近的组迁移，而小组与小组之间有竞争，即平均收入较高的小组人口得以扩大，较低的收缩。这个跟实际历史接近得多，而且并不假设首先已经在没有私有者的均衡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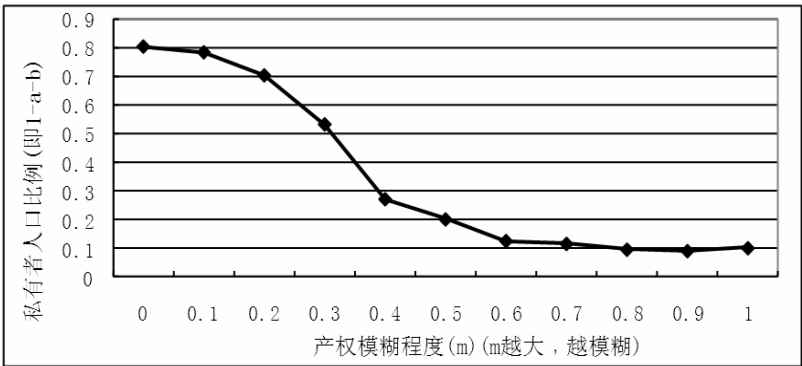
显而易见，每一代中三类型口的比例是在不断地变动的，但是如果不是看唯一一代的人口比例，而是看在很长的时间里平均的比例，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些规律性出来了。鲍尔斯和他的合作者在一篇论文¹⁰中报告了研究结果，他让以上的博弈进行一万代，并重复这个的计算机仿真练习 20 次

⁹ 此外也有另外两个缺点。第一：以上也假设那群人很大，因而在考虑突变可否繁殖下去时，我们可以单单使用预期收益，而毋须用实际受益来计算。第二：没有考虑一个群与另一些群之间的冲突，包括一群人淘汰另一群人的可能性。

¹⁰ 见 Samuel Bowles and Jung-Kyoo Choi 「The First Property Rights Revolution,」 October 2002 和萨缪·鲍尔斯（2006）《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人民出版社。（第十一章）

，图一报告了私有者在每一代中出现的平均比例与产权易于明晰的关系。

结果显示，产权越容易搞清楚（ m 越小），私有者的比例越多，私有财产制成为社会主流，而平等主义者只占少数，他们的平等主义行为往往被看成是违反社会规范的侵权行为。相反，产权越难搞清楚（ m 越大），私有者的比例就越少，尽管有小部份人有独占收获的行为，但这类人出现得不是很普遍。以上分析说明，尽管目前社会中拥有私有者心态的人很多，要是产权很难搞清楚，假以时日，私有者的比例长远来说是会减少的。由于初始条件中有为数不少的私有者，这令私有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不会完全消失，这说明了前面的静态分析中的那个均衡点不可能在有限的时期内达到，但这并没有影响上面刚刚作出的结论。



图一：私有者在人口中的长期平均比例

鲍尔斯指出了在这个动态分析中，三种类型的人口比例都是在变化的，各种力量一直是在交织交战，经常出现反复的情况，即使在很长时间之后也是如此。他认为经济现象中的均衡，应该是这样的动态的描述，是一种物理学和自然科学里面讨论的均衡概念，而不是那种自有永有、一成不变的、为主流经济学家所常用的那种静态均衡的概念。

上面介绍了鲍尔斯一场演讲的内容，由于只有一个半小时，他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说清楚。但是，在引起人们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怀疑这一点上，他显然是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而事实上，整个过程气氛融合，保守的听众都没有丝毫反感，那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

鲍尔斯在分析未来的财产制度时，并没有把国家政权的作用、觉醒的平等主义者的集体行动、和拥护现制度的私有者的反对行动等等考虑进去。但是，读者不难从中自行得出有积极意义的结论，我在这里就不需画蛇添足了。

最后补充一下，他对未来产权制度的思考，其实是来源于他对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权革命」——即人类从农业文明前的平等公有制度到伴随农业文明兴起而来的私有制的变化——的思考。为何采摘狩猎者的公有制度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为何这种制度又在农业文明兴起的时候被私有制所取代？文章的基本观点如下：在农业文明出现之前，人类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平等公有制的社会模式，在足够长时间里产生了

足够多的无关宏旨的「文化基因」的突变（从平等主义者变成逆来顺受者或相反的改变），使得当地球气候在一万一千年前出现的有利于成功家养的条件时（ m 下降），私有财产就在某些地方出现（在 $b(m)$ 比较小的部落），并和农业文明一起发展起来，并陆续扩大。当然，这并不都是单向发展的，也有采摘狩猎社会步入农业社会和私有财产制度之后，又回到采摘狩猎社会和公有财产制度的。（见注释 10 中的文献）

赫伯特·金迪斯

谈到鲍尔斯就不能不谈到他的挚友、长期合作伙伴、同年出生的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他们两人于 1968 年受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所托，为他准备「穷人的游行」（Poor People's March）的演讲而写了一系列的背景文章。两人从此展开了长达四十年毫不间断的合作。1974 年，哈佛大学经济系内五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教授，其中四位同时离开（第五个人是在取得终生教席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所以毋须离开），鲍尔斯和金迪斯到了麻省大学建立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异议经济学系，开创了一番事业。

除了共同发表了不下数十篇的学术论文之外，他们两人在 1976 年出版了第一部合作名著：《美国资本主义中的学校制

度：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¹¹，这部著作是大学教育学常用的指定教材和参考书。他们在 1986 年出版另一部名著：《民主与资本主义：财产、社区、与现代社会思想的矛盾》¹²，是涵盖经济学与政治哲学之作，在台湾有出版中译本。他们正在合写的巨著《一个合作性物种》(*A Cooperative Species: 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 计划在 2008 年完成，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合作作品之外，他们各自都有独当一面的贡献。公司理论是现代经济理论中的核心部分，鲍尔斯 1985 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中发表了他自己一套的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公司理论。组织学大师米尔格龙 (Milgrom) 和罗伯茨 (Roberts) 就在他们 1992 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中作出批判性的首肯：

「鲍尔斯的分析确实证明了马克思的一个判断…而这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确实有其根据。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分析开启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现代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话。」¹³

¹¹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 (Basic Books, N.Y., 1976) .

¹²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

¹³ Paul Milgrom and John Roberts, *Economic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Prentice Hill, 1992) pp256-257.

金迪斯在 2000 年出版了一本很有特色的博弈论高等教材，里面包含有强烈的演化论思想，并对利他行为以至其它人类行为予以充份的重视，据说这部著作的中文版正在翻译中，而金迪斯更是已经在大刀阔斧地修改原书，准备出版第二版，对博弈论的框架试图做出重构。¹⁴

鲍尔斯在 2004 出版的微观经济学专著普遍被看成是划时代之作，那时尚未取得诺贝尔奖的马士金（Eric Maskin）在《科学》中的书评写到：

「鲍尔斯不仅给出关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元素，他还提供了大量最前缘的研究材料…他的理论简洁、激发思考、又具高度原创性—正如他这本最不寻常的微观经济学专着的许多其它地方一样。」

这部名为《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的专著在 2006 年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了，这被视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译者在序言这样写道：

「2006 年对于中国的 NIE（新制度经济学）¹⁵研究是一个不

¹⁴Herbert Gintis, *Game Theory Evolving: A Problem-Central Introduction to Modeling Strategic Intera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¹⁵NIE 即新制度学派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对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的泛称，由于是个十分笼统的分类，被包括进去的人不一定接受这个名称（举例说，张五常和鲍尔斯这两个在政治观点上南辕北辙的人都可以包括进去）。

同寻常的年份…国内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在经过多年的陈旧文献的煎熬之后，终于能够走出科斯等人的影子，看到 NIE 已经存在的另一片蓝天。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就是能够独撑这一片天空的巨著。」（页一、二）

鲍尔斯在这部名著中充份肯定金迪斯的贡献：「与赫伯特 30 多年来的合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微观经济学各个领域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其实是这本书的合著者」。

鲍尔斯和金迪斯在数年前离开了他们任教三十多年的麻省大学，仍然保留荣休教授之职。前者现任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行为科学部主任，同时在意大利西安娜大学（University of Siena）任职教授，金迪斯则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任教。

尽管合作无间，他们性格却很不相同。金迪斯说话非常直率、毫不客气，我们可以从他近年在阿马逊网站上的书评看到这一点。这里我只举出一个例子。大约十年前从法国经济学学生开始，出现了一个「后自闭症运动」（Post-Autistic Movement），它很快便扩展到英国和美国，这个运动批评主流经济学自我封闭、不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分支交流、过份使用数学、基本假设不合理（指经济人的假设）、不把经济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研究、等等。

你也许认为，作为一个知名的异议经济学家，金迪斯会很同

情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那怕是很幼稚的地方表现的很包容，事实并非如此，他看到这个运动中的保守性，容易变成一帮缺乏竞争力的人自我陶醉的地方。这个运动出版的一本文集，其中有篇文章主张在研究生课程中阅读包括马克思、凯恩斯等人的原著，金迪斯批评道：你们为甚么不在家里自己读，要老师在课堂中教你读！有你们这样的敌人，他们[主流经济学]连帮手都不用找了！（With such enemies, they need no friends!）

古杜的命运

之前与他素未平生，在我争取之下，鲍尔斯还是愿意和我作那怕是很简短而直接的交流。

我问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回答说：「从前有一段时间，我的文章是专门写给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看的，现在不同了，我的文章是写给所有人看的，不过我的想法并没有改变。」

我又问他对芝加哥大学的看法和如何同不同政见的学者交往的经历。他认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是产生最多精妙思想的经济系，那是真正尊重思想的地方，他又补充说，当然，它也出产了不少坏思想。他说他有一个很要好的人类学家朋友，他们两人对什么是问题所在抱持共同的想法，但对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却南辕北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两人的交

流。这也许是鲍尔斯为何能够从保守经济学家（如海耶克、科斯等人）身上吸收思想养份的原因。

他问我中国共产党自行推行民主化的前景，他补充说，他的夫人（**Elisabeth Wood**）是政治学家，出版过研究南非和萨尔瓦多的民主化的著作，这是他对中国民主化感到兴趣的一个原因。我们还简短地交流了一些其它问题，此时电话铃声响起来。

「**XXX**，是你嘛…你担心非洲古杜的生存问题？…古杜活得挺好的，我想我们还是多关心一下人类的前途吧！」鲍尔斯对来电者说。

○八年三月四日（五月五日修改）

为纪念切格瓦拉牺牲四十周年（1967-2007）而作

共产主义的阶级战士应该是怎么样的： 试比较切格瓦拉与雷锋¹

黔进派

2007 年 10 月 9 日，是国际主义革命战士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热带丛林里遇害 40 周年纪念日。不过我却没有及时写上一篇纪念文章，这不能说明我对这位战士不敏感。约一年多前我曾在继圣学社论坛上发表过一篇由衷盛赞切格瓦拉为理想献身的文章，虽说当时我看人看事有过分道德化的问题，但这样的文章无疑表达了我对切格瓦拉的推崇。后来很长时间我在天益社区和我学校论坛的会员头像都采用了切格瓦拉头像，这也能表明我的志趣。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拓深对切格瓦拉的追悼，尤其是，我并不把切格瓦拉作为一个不羁的革命浪漫主义者，而是还原他作为无数平凡而光荣的阶级战士之一员的形象。

大概在今年春天左右，我在西西弗书店里看到一些关于雷锋的书，这些书的包装很漂亮，从出版时间上看很新。突然间

¹ 本文原载国内网站「天益社区——马克思主义讨论版」
（<http://bbs.tecn.cn/forumdisplay.php?fid=149>）

我想起了切格瓦拉，因为曾经在网上意外搜索到一些只言片语，似乎有人把切格瓦拉说成是「外国的雷锋」。于是紧接着我脑袋里冒出一个问题：切格瓦拉与雷锋有什么共性和区别吗？这想法促使我拿起书翻阅起来。我似乎若有所思，但一时说不上来，心想趁今年是切遇害 40 周年，年内什么时候整理下思绪写篇别具一格的文章。可这样的想法却被我这个健忘的人忘了。不过到了前天，我从图书馆借到六年前的一本书《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看到了其中有这么一段问答——话剧《切格瓦拉》的一观众问该剧导演张广天「谈谈你对保尔、雷锋和格瓦拉的看法」，张广天答曰「从我个人而言，并不喜欢保尔、雷锋、焦裕禄式的人物，因为宣扬他们，更多地是为了培养服从体制和规范的老黄牛。但是，如果体制出了问题怎么办？我更欣赏另一类人，他们勇于改造世界，富有造反精神。格瓦拉就是这种人」。我顿时感到与这位张同志发生了振奋人心的共鸣。也直接因为此，我提起了笔。写这篇文章，名则为纪念在天之灵，实则为探讨今天有志青年应该做怎样的共产主义者。

忠于什么？追求什么？

在我看来，雷锋的许多品格是值得共产主义者赞赏的。例如雷锋具有艰苦朴素、奉献牺牲、乐于助人、迎难而上、忘我劳动、先人后己等精神，是值得提倡的，其中一些品质正好也是雷锋与切格瓦拉的共性所在（不过这道德层面还是有些

微妙的差别，待后评析)。但我们在继承这些品格时，不得不注意到，雷锋的中心追求是什么。读者你可能会说雷锋当然是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官方宣传部门也是这么说的，甚至不喜欢雷锋的人也想当然地这么认为。然而，你只要稍微看看篇幅不长的《雷锋日记》（网上可轻易搜索到），就会发现雷锋实际上是忠于党，而不是忠于什么无产阶级或共产主义。是为人民服务吗？他如是说：「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听党的话，就会开放出事业的花朵！」人民真的与党平起平坐？或许更是党高于人民吧？雷锋如是说：「加强修养，努力学习团纲、团章和有关团员修养的书籍，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要能够为党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个人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反过来说，如果不为党的利益，那就是个人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了。可是如果按雷锋的说法，切格瓦拉恰恰就是个人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因为切格瓦拉没有像雷锋那样乖乖地无条件地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他生前不但公开批评过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老大哥，而且还扔下党政领导职务跑非洲去闹革命了。我这样类比是适当的，因为当年的古巴共产党、俄国共产党和当年的中国共产党都一样，是工人国家的官僚阶层，有可比性。今天中国有很多左派（不止是托派）都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之所以卷土重来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复辟前的官僚特权阶层已播下社会不平等的种子，同时又剥夺了劳动阶级的一切民主自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雷锋之忠于党，用马列语言翻译出来就是：要忠于官僚特权阶层。

雷锋，虽然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官僚，而只是普通群众的一热忱分子，但也无论如何算不上共产主义战士。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雷锋日记里还有这么一段话：「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和工作，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其中一些字眼，比如「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连我这样的青年人在上小学时，也还在教科书里见过这样的话以及关于雷锋的事迹。当我曾经是一个毛派时，甚至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引用过这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于是我继续写下去（同时也是反思）：一个阶级解放奋斗者是否合适说要去做某君的好战士？从思想层面上「红卫兵」又该如何看待？我认为，首先是无论什么情况下共产主义者都必须做独立思考、自觉选择，而不是盲目服从。红卫兵实际上和雷锋一样都做了工人国家官僚极权制度的牺牲品，红卫兵怀抱着对社会平等理想的热切追求，然而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至始至终不曾怀疑过毛泽东思想这个如日中天的「共产主义运动终极真理」。1967 年底湖南「省无联」的杨小凯只是提出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异端理论（还没法脱下毛泽东思想外衣），就被「中央保守派」和「中央造反派」联手镇压于无形了。从表面上看，1966 年的红卫兵似乎比 1960 年的雷锋要更「激进」更「富有造反精神」，但与其说这是个人精神气质不同使然，不

如说是时代条件不同使然。21 岁的雷锋如果活在 1966 年，或许正是当时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雷锋与红卫兵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他们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毛泽东这个头号官僚独裁者，首先是连自己的独立精神也出卖给了官僚统治者。

那么切格瓦拉忠于什么？追求什么呢？我认为切是一个彻底追求无产阶级解放利益的奋斗者，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当然，我并不认为切真的像法国哲人萨特说的那样是个「完人」，即便在他长成为一个革命者时，他仍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例如他后来一直信赖官僚化的古巴共产党，而没有认识到必须重建阶级先锋队；例如他对当时工人国家的官僚特点有种种不满，但却不能提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替代方案；又例如他的游击中心论实质上是乡村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方式（这当然不是说他本人是小资产阶级）。但我仍然认定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仅仅因为且正是因为他真正将无产大众的解放利益作为自己至高无上的追求（这种追求的纯粹性表现在没有任何「党」或「伟大领袖」能作为代名词）。因此，你能看到这位阿根廷医生，投入危地马拉革命，而后又领导古巴革命，做了部长还不安分，批评这批评那甚至批评苏联，跑去刚果闹革命，最后在玻利维亚打游击，直至壮烈牺牲。这似乎很自由不羁，很理想主义，无视任何权威，似乎还有点罗曼蒂克的小资情调。其实这其中贯穿着一条始终不渝的革命红线：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利益而斗争（纯粹、

彻底、真正意义上的)。后人们喜欢把切格瓦拉塑造成神话史诗般的人物，但是只要你真的像切一样追求成为阶级战士并从阶级战士的角度来审视自己，就会发现切绝对不是空前绝后盖世无双的绝代巨人，而是历史上、现实中千千万万阶级战士的一员。

历史上不乏这种革命者，他奔走四方，浪迹天涯，实质上始终以世界革命——天下普罗大众之解放为己任。19世纪闯荡欧洲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正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无产阶级独立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的忠诚模范。也许知道的人不多，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战士们之所以发动十月革命直接为了促进世界革命尤其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在1917年8月莫斯科地区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干部别林斯基阐述了一个当时党内根本没人会怀疑的道理：「如果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出路。索柯尔尼柯夫说得对，俄国革命只有作为一种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欧洲开始了革命，我们就要跟着西欧走」。几乎与此同时基辅代表会议上，得票最多的著名革命领袖皮达可夫则说：「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强调说过，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不断革命的阶段…唯一可能拯救俄国革命的道路是世界革命，它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基础」。（参见托洛茨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回过头来看切格瓦拉，他的形象之所以被突出、

被追颂不是偶然的，这种现象表明了人们对斯大林式「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民族保守主义罪恶和官僚化堕落过于长久沉闷后出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激赏。在这种意义上能够与切相提并论的，只有 1920 年代起就开始与苏联官僚集团进行独立的不屈斗争的托洛茨基以及他的几千名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和其它刑场上的革命战友（他们其实已构成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我看来，切既不是空前的，更不是绝后的。与切同时代的第四国际活动家埃·曼德尔也是一位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有兴趣可看看对曼德尔的悼念文章）。上文中所有这些革命者其实有非常大的具体差别，他们有无政府主义者，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切这样的游击中心论者（他的追随者们早已被称为「切格瓦拉主义者」）；他们有的活跃于讲坛、从事著述论战和宣传，有的拿起了枪杆子成为一个普通战士，有的直接参与领导革命，或者这些斗争方式兼有之。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忠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利益，他们心中容不下任何无可置疑的现实权威。仅此一点，我们可以衡量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真伪高下。

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自己服务自己！

在中国说起「学雷锋」，人们很可能首先理解为「学雷锋就是要多做好事，乐于助人，为人民服务！」的确，自从 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四十多年来，每年的 3 月 5 日成了全民学习雷锋、效仿雷锋为别人做好事的纪

念日。学雷锋运动成为一种政治运动。不过在我童年记忆中，学雷锋就是义务扫大街、去孤儿院敬老院打扫卫生，就我来说还是比较自觉乐意的，因为做这些事总还对社会有所益处。但是，不妨把话说得尖锐点，这种雷锋精神的具体实行并不比比尔·盖茨设立慈善基金济贫扶困进行社会改良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都是强调一个由人民的外在之手去服务、帮助人民，而人民只负责感恩戴德、拥护支持，而并不帮助群众发展自己批判的自主个性和独立的觉悟以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互助（在雷锋时代的中国，要在共产党的监狱之外提出独立的异议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你要做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下场就是失去人身自由二十多年的中国托派共产主义者，即使他们出狱后也没有被人民中国的当权者认可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直至人民中国被新民国取代）。在我看来，对于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来说乐于助人还不如在社会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群众的集体主义的自助。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他从抽象意义上否定劳动民主政权的必要性，而无产阶级不用自己的方式掌握国家机器就根本无法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但他的互助论正是基于群众组织的自由发展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社会合作，这不知比单方面的「乐于助人」高明多少倍，因为这种方式不是孽生人民的奴性，而是增长广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

为人民做好事，这种单向度的倡议恰合官僚阶层自身改良的

本位价值观。官僚阶层本身就是一个表面上独立于并且高高凌驾于人民群众的一个社会阶层，但实质上官僚阶层无法独立，它必须靠一定的阶级关系来标定自身立场，它不是被无产阶级国家的公有制经济逼着前进，就是被有产阶级拉进怀里。应该说 20 世纪所有那些斯大林主义式的工人国家都具有自身改良的倾向，包括某些人（特别是像保罗·斯威齐那样的崇毛派左翼分子和今天中国许多所谓新左派毛左派）所想当然以为刻板僵化的苏联。早在被一些人神圣化了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十年前，托洛茨基就在其不朽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指出：「在苏联的政治文件之中，你常常可以看到攻击「官僚主义」的话，说它是一种坏的思想习惯或一种坏的工作方法。（这种攻击常常是从上至下的，这正是上层自卫的一种方法。）但是你在任何文件中都看不到把官僚当作一个统治阶层来考察的文字——你看不到它的数目和结构，它的血和肉，它的特权和贪欲，也看不到它从国民收入中吞掉多大一部份。」据说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曾提过一次「官僚主义阶级」，不过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过；即使在文革中，他也只是说要对付的是 5% 的干部，其余 95% 是好的，1969 年甚至更早开始毛泽东就一直试图使绝大多数干部恢复工作，包括 1973 年令「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毛泽东似乎是工人国家官僚层中最激进的分子，然而他却证实了托洛茨基的批判：即使是毛泽东也从来不把官僚作为一个统治阶层而进行一种要作为战略行动基础的考察。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对于他所效忠的官僚特权阶层来说是相当明智的，就他自己来说也是必

然的。

自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党内那场大分裂以来，毛泽东就拒绝了共产主义左派的纲领，而投靠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路线（虽然这并不妨碍他反对斯大林及其羽翼的亲自指挥），1952年为向莫斯科献媚而对托派的镇压及其后一系列思想政治文艺方面的一元化清洗则彻底斩断了他倾向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任何可能性。毛泽东的追随者习惯以毛泽东的清廉俭朴来说明毛泽东不是一个官僚。这种说明是非常表面的。杰出的俄国共产主义者亚·米·柯仑泰用一句十分简洁的话指出：**「由某个第三者决定你的命运：官僚主义的全部实质就是这样的。」**（见其著作《工人反对派》，1921年）毛泽东不可能不理解这个实质，因为他曾在文革中一度鼓吹过群众自我解放这样的话，但群众从来没被批准过摆脱毛泽东思想这个绝对权威。毛泽东及其同僚们按自己的意志推崇雷锋，宣传喇叭特别注重雷锋说过的「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就这样，毛及其所属官僚特权阶层领导着万千精神奴才组成了官僚主义的统一战线，共产主义成了不折不扣的宗教，用激进的辞藻来麻痹瓦解独立的阶级觉悟。当毛时代的全部实践落下帷幕时，我们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是个狡猾的骗子，他非常明白必须遏止无产阶级的觉醒，否则官僚阶层就不能安全地实现有限改良（1967年1月当争取「上海人民公社」的合同工运动出现「打倒张春桥」的口号时，毛毫不犹豫地指示解放军前去「指导」，美名其曰

「支左、支工、支农」，其实真正有的只是「军管、军训」，那是解放军第一次正式介入文革）。官方主导的学雷锋运动的全部内容都是指向这个本质——改良官僚阶层自身（首先是在人民心目中改善党政军官僚的形象），保证人民驯服于统治秩序、政治权威和各种强迫性的义务。

然而，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普通劳动群众，例如雷锋以及许多学雷锋的群众，他在劳动奉献（义务）中客观上也是为了自己——作为劳动大众的一分子——服务。从这个现实性出发，着眼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利益，我们不如丢掉「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而借鉴 1968 年 5 月运动时写在法国巴黎的墙上的一句话：

「我不是人民的一个仆人（也不是他们自作主张的领导）。让人民自己服务自己。」

从这种觉悟性来看，切格瓦拉真正是比雷锋要高大得多。雷锋的「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些极端奴颜媚骨的话，切是绝对不可能说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浪漫主义或什么自由主义气质，而恰恰是因为他坚强不屈的阶级觉悟。切不会盲从任何伟人，尽管他十分尊敬卡斯特罗，但以他的品格绝对不可能号召古巴人民「永远跟党走，做卡主席的好战士」。相反，切说，群众「并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批同属一个

范畴(而且是被一个硬建立起来的制度拉平到同一范畴之中)的分子的总和，像一群驯服的羊们。的确，他们毫不动摇地追随自己的领导人，主要是追随菲德尔·卡斯特罗，但是他所取得的信任，其程度是与他充分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相符合的，与他为了履行自己作的诺言而进行的真诚斗争相符合的」(《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1965 年，如不特别说明，以下切的言论均出自该文)。我保留对卡斯特的异议不在此做阐述，只需注意切自己的理解。就他们各自理解来看，我们就能看出雷锋远远不及切的阶级觉悟。如果连独立的思想和个性发展都没有，那么就不可能有撞出火花的争鸣，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立场更是谈不上的。看看《雷锋日记》(虽然我早就见过类似的言论)，有时想起来仍是很可怕的：「党和领导叫怎样去做，就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指示去做。这样，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有办法克服；再艰巨的任务，也能完成，相反，如果脱离了领导，不听党的话，光凭个人的心愿去做事情，是很难做好的，甚至要犯错误。」然而切格瓦拉是完全另一种态度：「倡议一般来自菲德尔或是革命的最高司令员，然后向群众解释，由群众加以接受。另外一些时候，党和政府吸收一些局部的经验，通过同样的程度加以推广。但是有时国家是会犯错误的。当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由于组成集体的每一个分子热情的减低，整个集体的热情也减低了，工作就停顿，一直缩小到举足轻重的程度；这就到了要纠正的时候了」。尽管切格瓦拉似乎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民主作为一个纲领要素或原则问题提出来，而且他与雷锋一

样有一种道德化理想主义化的不良倾向（过分的理想主义有时会促进反民主的精英主义），但他决然不像雷锋之类的极权主义顺民那样完全无视作为有独立意志及自身动力的无产阶级群众。他始终强调在客观因素和外因因素之外，必须使群众「由自觉的行动来完成」解放运动。在切格瓦拉留下的文献中尤其值得珍视的是这样的话：「**虽然还缺乏制度（这是应该逐步克服的），现在群众已经作为许多为同一事业而斗争的个人组成的觉悟的集体，而在创造着历史。**在社会主义下，人虽然表面看来是标准划一的，但却是更加完全的；尽管缺少完善的一套办法来保证，但人有了无限的大得多的可能来**表现自己**，使自己在社会机关当中能被人感觉到。**这必须使他进一步自觉地以单独或集体的方式参加一切领导与生产的机构**，而且使他把这一点同对技术与思想教育的必要性的认识联系起来，从而使他感觉到这几件事是密切相关的，是齐头并进的，这样，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等于说；他把异化的枷锁打破了，他作为人来说，是充分完成了。」总之，我们在切的思想中看到了完全不同于「为人民服务」这样简单可疑的教条，切格瓦拉追求的是——尽管因为理想主义化以及无产阶级民主的缺席而显得有些无力——人民自我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但这一点恰恰是把自己命运完全托付给党国伟人的雷锋们想都不可能想的。

雷锋精神（不论按其本意还是按宣传出来的形象）的核心实质是极权主义，强调对秩序的盲目服从和任劳任怨的奴才精

神，因而它能够被官僚堕落的人民中国捧上天，也能被复辟后的新民国的有产权贵们以新的形式继续鼓吹。而切格瓦拉这个站在底层立场上的造反者，这个以阶级解放为己任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个高贵的奴隶角斗士！），在毛时代却被钦定为修正主义而遭遇批判（之所以大加批判不是因为官僚集团真的很重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因为它的特权利益决定了它无法容忍任何超出它控制权和解释权的异端，哪怕同是共运阵营的），在今天则继续受到和谐资产阶级主流的冷眼旁观。以敌人的态度为尖锐的反光镜，照出了切格瓦拉与雷锋的鲜明待遇差别，这一点就足够令人长久思考了。

2007-10-18 晚间至 10-19，写于家中。

10-27 略作修订。

17 位俄罗斯著名中左学者的声明

十月革命对于我们 ——俄罗斯和全世界的意义¹

林艳梅 译

2007 年 6 月 1 日,《莫斯科新闻》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巴加图利亚、布兹加林、斯拉文等 17 位俄罗斯著名中左翼学者以「21 世纪社会主义」国际网络研究所的名义共同发表的纪念俄国十月革命 90 周年的声明,题为《十月革命对于我们——俄罗斯和全世界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声明对十月革命的成因、性质、地位及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价,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命题和思想观点。全文如下。

行将到来的俄国十月革命 90 周年之所以能够引起普遍关注,这并不是偶然的。1917 年的十月,的确震撼了整个世界,改变了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根基。

对于这一世界历史性现象,很多媒体只是将其当作一次普通的政变,一次在西方情报机关帮助下,由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所完成的政变来看待。为了混淆视听,这些媒体动用了一切手段:赤裸裸的谎言,捏造的事实,包括对伟大革命的

¹ 本文摘自 2007 年第 11 期《国外理论动态》。

参加者进行造谣和诽谤。那些早已被不同国家的知名学者所批驳和否定的捏造，依然不断在重复，似乎这是一次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间谍托洛茨基所策划的「十月政变」。在这样一种说法和背景下，俄国人民就被描绘成了「革命激进主义者」手中意志薄弱的玩偶。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俄国人民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这一革命就既不能开始，也无法取得胜利。

不是阴谋，而是社会革命

十月革命的爆发，并不是由外国的阴谋家或者奸细所引起的，它是一场无论何人、无论如何号召都无法引发的一次社会地震、飓风和海啸。十月革命，作为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当人民不满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为一条足可毁灭一切的社会洪流之时而发生的。因此，将它仅仅解释为阴谋的产物，至少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如果事情真的如一些人所说，是阴谋所致，那么则很难解释，为何只经过短短的一段时间，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之内，就迅速完成了新政权对旧政权的替代？为何俄国人民并不仅仅是支持这一政权，而且还在国内战争期间手持武器来捍卫这一政权？「十月政变」的批评家，不知为何「忘记」了那一深重的危机，即由沙皇专制制度及其后继者临时政府将俄国社会拖入的危机。当时，在「战争必将取得胜利」口号的蛊惑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人民的现实需要漠不关心。这些批评家还忘记了革命前夕专制制度

的自我崩溃。关于这一点，能够对其进行直接证实的事实有：沙皇宫廷内部无休止的倾轧与纷争，前线上的军事失败，最后，是尼古拉二世对专制君主权力及俄军总司令权力的直接放弃。之后，取代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由于未能解决当时社会最主要的两大问题——停止战争和为农民提供土地，最后也只能落得无果而终。

十月革命是 20 世纪俄国社会革命的顶点。那些最早意识到普通俄国人的需求与愿望，意识到世纪之交的俄国亟需解决的尖锐问题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为了十月革命的领袖。当然，他们当中，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及其最亲密的战友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十月革命领袖之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但无论是将他们奉为神明，还是将他们妖魔化，都是不对的。对他们所进行的恶意污蔑，都缺乏现实依据。除了自身的革命理想，他们不为任何人而效力。任何世俗的诱惑，例如金钱、安逸、富足等等，对他们来讲都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以最高标准——为被压迫者和劳苦大众的自由和幸福而忘我工作，来衡量自己的生活。

革命不能归结为暴力

十月革命常被称之为「暴力政变」，但彼得堡「政变」的发生，几乎没有什么人员的牺牲。我们并不是暴力的支持者，但同

时我们也意识到，在与阶级和民族对抗相联系的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暴力的发生具有其不可避免性。是的，革命在许多方面都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这种暴力在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当中获得了明显的表现。此外，众所周知，美国对奴隶制的抛弃，是经过了 19 世纪的国内战争；而俄国封建制度的覆灭，也伴随着接连不断的战争和革命。

由此可见，这些类似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政治阴谋家的阴谋所引起的，而是由过去体制的危机，以及无法通过演进道路来加以解决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所导致的。暴力革命方式的采取，只是在特殊的条件之下发生，例如当统治阶级只顾及自身的发财欲望，只注重自身特权的享有，而无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之时。这时，社会的穷苦阶级，除了亲手改变自己的命运，已不再有任何其它的出路。这便是 20 世纪俄国革命的主要教训。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社会革命归结为暴力，尤其是武装暴力：它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新世界，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不只是为社会的上层，而且是为所有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革命确实是加速历史进步的火车头。

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

在不同国家的历史当中，都可见到大量劳动者反抗资本主义

的行动，但只有在俄国，这些行动才具有了如此长期持续的性质，这使 20 世纪的俄国成为了世界发展的震中，当时世界的全部主要问题在那里交织，并为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病症——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提供了出路。只有俄国工人才具备足够的意志和决心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不只是推翻资本主义，而且着手向更为进步的制度——社会主义过渡。

在继巴黎公社之后，十月革命使社会的底层——工人、农民和表达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政权；它将苏维埃确立为政治权力的民主形式，这一形式为饱受战争折磨的人民带来了和平、土地以及民族自决的可能性。在鼓动起千百万人的社会创造力之后，它向人们鲜明地昭示出，并非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缔造者。

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制度，这两大制度，在很多方面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后续发展进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身变革；在俄国革命的作用下，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体系发生分裂，早已过时的专制制度彻底覆灭。

十月革命提出了具有超民族和超宗教性质的导向统一的思想——社会解放和公正的思想。以这一思想为基础，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平等民族的自愿联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十月革命的理念及其所开创的事业，同众多科学和艺术巨擎——季米里亚捷夫和维尔纳茨基、普拉东诺夫和

马雅科夫斯基、肖洛霍夫和爱森斯坦的生活目的和生活意义是相一致的；由十月革命所奠定的朝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历史运动轨迹，在当时受到了 20 世纪的杰出活动家肖伯纳和毕加索、爱因斯坦和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支持。

苏联历史具有不同的内容

十月革命确定了苏联历史的开端，但这一历史并非如涅瓦大街一样平坦，其中既有伟大的成就，也有痛苦的悲剧。大家都知道，在实现政权向劳动者的和平过渡之后，在俄国的大多数省份都开始了流血的，伴随有外部武装干涉和「白色」「红色」恐怖的国内战争。

由于不具备相应的历史经验，苏联政权，自然，做了很多错事，特别是实施了曾引起全国性危机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布尔什维克的功绩则在于，果断地抛弃了这一政策，并自觉地转向了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成功地结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则的历史模式，其诸多特征后来在一些欧洲国家以及当代中国的框架内获得了再现。新经济政策使在短期内医治战争伤痛成为可能，并使俄国经济提高到了战前的水平。

依靠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和效用，列宁研究了苏维埃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计划，包括对国家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造。这些改造，首先是以动力、文化和教育这些领域的发展为突

破口的，这些领域，不仅在 20 世纪，而且在 21 世纪也依然作为社会的主要领域而存在。这些改造通过吸收工人管理国家、更新党，包括将当时已经表现出缺乏礼貌、粗暴和滥用权力的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从而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化。

遗憾的是，这些意向并没有得到实现。列宁去世之后所形成的权力体制，虽然依然承认社会主义为自己的目的，但却做了许多与这一目的相违背的事情。的确如此。由十月革命所宣告的公民政治自由，在这一体制下被完全地破坏；为工业化的实施以及强制集体化的推行，我们支付了过度的发展代价。其结果是，革命初期所形成的民主政治退化为了官僚制度及其领袖斯大林的统治。我们认为，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对于人权及苏联全体人民权利的破坏，就其性质来讲，是一种犯罪。所有这一切都损害了革命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信誉。

虽然注意到了以上的这些事实，但与此同时，在如何看待全部苏联史这一问题上，我们却并不接受那些貌似科学的谎言，或者那些片面的、混淆是非的宣传。这一历史是有不同内容的：其中民主主义的趋向与官僚主义的趋向既相互替代，又相互斗争：代替新经济政策的自由的，是斯大林的极权政治；而斯大林的极权政治，又依次地被赫鲁晓夫的「解冻」所取代；之后，是勃列日涅夫的威权主义，被宣扬建设人道的、

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所代替。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不是没有争议的。英法的殖民战争是残酷的，美国的奴隶占有制未必就好于苏联的古拉格，不过这并不能抹杀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成就。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否定苏联人民的建设成就呢？正是苏联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和文学，建立了惠及人人的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并第一个开辟了通往宇宙的道路。不应忘记，是十月革命激发了人们大规模建设新社会的空前创造潜能，并使国际主义的理念融入人们的具体生活，使过去俄国社会的底层，获得了登上民族和世界文化顶峰的可能。不应将群众在掌握最新科学技术成果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从苏联历史中一笔抹去。正是在这一热情当中，千百万苏联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获得了鲜明的彰显和体现。

苏联模式为什么垮台

应当指出，对于苏联时期所形成的社会制度的性质，我们在观点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我们一致认为和主张：轻视或者放弃由十月革命所产生的民主政治、国际主义、公正和人道主义原则，或迟或早地，将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引入到灾难上去。苏联所发生的正是这样。

极权主义制度条件下对人们主动创造精神的束缚，极大地限

制了苏联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商品匮乏是其典型的特征。结果，我们没有能够成功地将劳动者的福利提高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上，这构成了苏联体制崩溃的原因之一。第二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缺乏现实的经济和政治民主。这一缺乏，在世界工艺和信息技术革命大幅展开的条件下，尤其成为不能容忍的。这一切，导致了官僚权力与劳动者的完全异化。改革进程当中，试图克服这一异化的尝试，并没有带来人们所需要的成果。由于以上原因，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瓦解变为了现实。这种现实被那样一些政治力量所利用，这些政治力量拆剪了苏联，并将俄罗斯引向了伴有大量失业、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严重分化、民族主义猖獗和犯罪现象增长的野蛮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道路。

苏联模式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十月革命的理想是虚假的。正像基督教的理念并不需要为宗教裁判所的实践负责一样，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也并不能破坏革命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性事业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已经出现了不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来接受的新一代青年。有全部理由指望，这一代人能够使十月革命的理想焕发新的生机。

当代俄罗斯的伟大取决于什么

十月革命理念所团结的，不只是那些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还包括那些赞同俄国巩固和发展的人。它为那些想使俄国民族文化走出国界、传播至其它国家的人，为那些怀有爱国主

义情感并随时准备捍卫苏联避免可能侵略的人，打开了一条通路。在伟大的、捍卫了苏联主权及十月革命成果的卫国战争当中，这一情感的力量，曾获得过明显的体现。

十月革命向人们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伟大，提出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将十月革命作为极端主义力量的阴谋来加以看待，其所以是危险的，还因为，它将助长反俄罗斯的历史解释。按照这一解释，俄罗斯以自身的不可预测性，仿佛包含着对于世界的不变威胁。一些知名人士甚至断言，应当预料到，俄罗斯将产生一些麻烦事。因此，应当监督并利用俄罗斯的自然资源、能源和智力资源，对其始终加以严厉地对待。

对于这种挑衅性的声明，当代俄罗斯应当冷静地予以评价，并坚定地按照自己的航向前行。俄罗斯的伟大，并不在于盲目地复制外国的模式，尤其不在于高傲地对待其它的民族。俄罗斯的伟大，在于依托本民族的才华和创造力量，在于通晓世界文明和文化的知识与经验。

只有克服了贫穷及俄罗斯人严重的社会分化，高质量地改善本国公民的生活，实际地扩大他们的社会和民主权利，保存自身历史当中一切好的东西，俄罗斯才能重新成为强大的、其对手不得不尊重的国家。

重新评价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其正面的

影响非常明显。沿着它所开辟的主干道，人类的三分之一走过了自身发展的部分道路。今天，很多国家在汲取过去失败和悲剧教训的同时，仍在继续着这一运动。十月革命向人们证明了，另一种更为公正的世界是可能的。今天，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国家和人民，正在为这一更为公正世界的实现而努力着。这一点，已经为新的、尤其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国家中获得有力体现的革命性变革所说明。

十月革命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与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拒绝它作为俄国史最为重要的部分。错误总是会有，即使从前的一些伟大革命也不能幸免。只是，在所有国家，包括以国家一级的名义，都在纪念这些革命的日子，只有俄罗斯没有这样做。在俄罗斯仍在继续诋毁自己过去的革命。

在十月革命 90 周年前夕，我们大声反对这样的做法。应当将人民的革命纪念日以及关于十月革命的真相还给人民。不应忘记，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有自己的伟大革命。我们可以并应当为之而骄傲。

阿尔斯拉诺夫（Арсланов ВГ），艺术理论博士，教授；

巴加图利亚（Багатурия ГА），哲学博士，教授；

布兹加林（Бузгалин АВ），经济学博士，教授；

沃耶伊科夫（Воейков МИ），经济学博士，教授；

沃洛比耶夫（Воробьев），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加尔金（Галкин АА），历史学博士，教授；

扎拉索夫 (Дзарасов СС), 经济学博士, 教授;

伊斯嘉根 (Истягин ЛГ), 历史学博士;

凯列 (Келле ВЖ), 哲学博士, 教授;

科尔加诺夫 (Колганов АИ), 经济学博士;

洛基诺夫 (Логинов ВТ), 历史学博士, 教授;

麦德维杰夫 (Медведев РА), 历史学博士;

鲁德克 (Рудык ЭН), 经济学博士, 教授;

谢列勃里亚科娃 (Серебрякова ЗЛ), 历史学博士;

斯拉文 (Славин БФ), 哲学博士, 教授;

斯莫林 (Смолин ОН), 哲学博士, 国家杜马议员;

沙特罗夫 (Шатров МФ), 剧作家。

大同丛刊第一辑

编辑：大同丛刊编辑委员会

出版：新苗出版社

电邮：xinmiaopress@hotmail.com

电话：(852) 9219 5150

邮箱：香港/香港仔邮政局 24286 号信箱

2008 年 6 月出版

定价：人民币 50 元 港币 50 元